

实践绘就最美青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科大青年服务国家实践风采录

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组 编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内 容 简 介

北京科技大学坚持发挥社会实践活动在“青年服务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北科大青年服务国家实践风采录，本书汇集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课程化”建设过程中大学生优秀活动成果。

本书共三篇：第一篇是求知·理论探索，第二篇是进发·青春力量，第三篇是体悟·时代精神，分别收录了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学术论文、基层服务事迹、精品媒体报道等内容。此外书中还附有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实践掠影，记录了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重点专题行动的珍贵图像资料。

本书不仅可以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转化提供参考范例，也可为高校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提供相关工作经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绘就最美青春：党的十八大以来北科大青年服务国家实践风采录 / 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组编.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121-33014-8

． 实... ． 北... ． 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概况 ． G6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7080 号

策划编辑：关雅莉 张 广

责任编辑：裴 杰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87×1 092 1/16 印张：12.25 字数：313.6 千字 彩插：10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88254617，luomn@phei.com.cn。

序

“社会是个大课堂。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社会实践、社会活动以及校内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对拓展学生眼界和能力、充实学生社会体验和丰富学生生活十分有益。许多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中树立了对人民的感情、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社会实践对于引领和塑造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矢志艰苦奋斗的重要作用。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实现途径，是服务学生素质教育、学生就业创业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举措，是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必需环节。北京科技大学历来十分重视实践教育工作，在“求实鼎新”的校训精神指引下，积淀并形成了“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光荣传统。建校伊始，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北京钢铁学院作为钢铁冶金行业特色高校，定期组织学生奔赴全国各大钢铁生产企业，把理论知识应用于生产第一线，积累实践经验，这一实习实践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学校也积极倡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到 1990 年亚运会、2008 年奥运会等高标准体育赛事，以及国庆 60 周年等重要节庆宣传活动中，让青年学生在服务社会中彰显自己的青春风采。


2005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的精神，根据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 号），北京科技大学将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密切结合，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大学生社会实践为重点，探索建立实践育人长效机制，于当年研究下发《关于把暑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的通知》，将社会实践作为独立的本科生必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制定了教学大纲和一系列教学管理办法，规定全校本科生在大一、大二年级参加“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学习，分数记入学生成绩单，实现了社会实践由“一项活动”向“一门课程”的转变，从而开始了社会实践的“课程化”建设。

十二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构建了“严谨求实”的课程机制，取得专家同仁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课程曾获得王兆国、陈至立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9 年获得国家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3 年获得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 年第 21 期《求是》杂志专门刊载文章，

介绍了“社会实践的北科大模式”。此外，陈希、袁贵仁、杜玉波、李卫红、傅振邦等领导同志都对我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工作机制给予肯定。学校先后出版《大学生社会实践教程》、《大学生社会实践理论与实务》2部教材，整理编制了《暑期社会实践操作指南》，研发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信息系统”，依托微信公众平台设计了“实践微足迹”过程管理系统，推出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形象大使——“实践小博士”，健全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宣传渠道和微视频教学资源，使社会实践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实现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科学化、制度化、过程化管理，促进了多元媒体形式的渠道融合，发挥网上网下协同优势，合力营造“求实、崇实、务实”的实践育人文化氛围，有效引领学生“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

“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社会实践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作用。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把学习同思考、观察同思考、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实践中书写自己的青春华章。

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



编 委 会

主 任：李 磊

副主任：于林民 于宝库 马 聪 王海波

王 鹂 邢朝国 闫奎铭 苏 栋

苏 烜 陈 凯 崔 睿

编 委：王秉域 王 亮 孙翎童 杨凤琦

张 洋 陈栋帆 陈禹舟 陈美欣

胡鹏凯 浦绍韬 彭 聪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不分先后）

前言

“求实鼎新”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校训，“学风严谨、崇尚实践”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优良传统，学校历来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在 2005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北京科技大学加强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探索建立实践育人长效机制，并研究下发了《关于把暑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的通知》，将社会实践作为独立的本科生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和一系列教学管理办法。2005 年也成为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课程化的元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基本要求，扎实开展工作探索，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教程》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经验，整理编纂《大学生社会实践理论与实务》教材，推动社会实践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五年来，学校共组织 1813 支社会实践团队、约 1.8 万名师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体悟国家发展、调研民生需求、聚焦精准扶贫、开展社会服务，不仅撰写出一批有思考、有特色、有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涌现出一批勇于扎根基层、贡献青春力量的优秀基层服务事迹，其中的很多优秀社会实践事迹也受到了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为更好地宣传学校实践育人成效，探索学校未来实践育人工作方向，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的大潮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组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在社会实践中取得的突出成果进行汇总梳理，以 2012 - 2017 年间社会实践优秀学术论文、优秀基层服务事迹和典型媒体报道为基础，编写了本书。

本书共三篇。第一篇是“求知·理论探索”，第二篇是“进发·青春力量”，第三篇是“体悟·时代精神”。第一篇选取了 10 篇近年来在国家“挑战杯”竞赛、首都思政课学生社会实践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中获奖的优秀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体现着科大学子对社会发展、基层民生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为下一阶段科大学子依托社会实践开展基层调研提供了理论参考。第二篇选取了 30 项近年来科大学子在社会实践中开展志愿服务、帮扶弱

势群体等方面涌现出的优秀基层服务事迹，对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牢记青年使命，勇担时代重任，贡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篇选取了 19 篇近年来受到各级新闻媒体报道的社会实践项目，彰显了北科大社会实践的良好社会影响，激励更多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锤炼自身本领。

希望通过本书对以往社会实践成果的整理，为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专业化发展，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知社会实践，参与社会实践贡献绵薄之力。

在此特别感谢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组全体成员为本书的出版做出的努力。本书部分内容参考了媒体报道、北京科技大学多年来社会实践课程化工作成果及《大学生社会实践理论与实务》一书。

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编 者

2017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篇 求知·理论探索

大师·店主·摊贩·爱好者	
——北京地区面塑艺人的结构分层与行业生态	3
“医漂”群体医患信任问题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基于对外地人员来京就医情况的调查	17
史密斯模型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问题探究	
——以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为例	28
基于高校公益社团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研究	
——以北京部分高校为例	39
失独者如何老有所依？	
——以北京模式为例	49
关于工业遗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探究	
——以 798 艺术区为例	64
关于建立留守儿童援助实效性体系的研究	
——以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镇为例	73
“棒棒军”的生存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以重庆市渝中区为例	83
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的角色困惑与定位	
——以心路实践团云南苗族村精准扶贫实践活动为例	96
就业多元化下听障青少年“人在囧途”？	
——基于首都部分地区听障群体就业情况的调查	107

第二篇 进发·青春力量

从泉水里流淌出来的精灵	119
携心行动走进来，把微梦想带出来	120
聆听底层呼唤，用心传递真情	122
六载同行，浇铸北科苏州情	123
“爱在武安”山东精准扶贫	124
研发报警器保障妇女和儿童出行安全	125
文化交流带来别样改变	126
两年宣威梦，守望公益行	127
为自闭症儿童打开一扇窗	129
小小的图书馆，大大的梦	130
从修筑出村土路到疏通意识觉醒的心路	131
用大学的光，照亮留守儿童的心窗	132



全面助力秦安发展的“有为”之旅	133
以志愿支教服务西部基础教育	134
给你一双“眼睛”	135
用“互联网+”促进密云水库“不老农家”生态旅游发展	136
促动“宇宙中心”不再拥堵	137
以孤老牵线模式创新公共养老机制	138
“结石病的防与治”科普宣讲行动	139
情系“淮河水”，爱聚“癌症村”	140
新媒体技术助力新农村发展，二维码成为农产品种子的“新名片”	141
以专业知识服务农村发展的“无线网络”筹建行动	142
携手公益组织，筑梦留守儿童	143
志愿解庄，与农同乐的志愿服务行动	144
关爱麻风病人，为麻风病正名的“微尘”行动	145
寻访长征精神，砥砺青年前行	146
宣讲“降农药危害”的环保科普行动	147
公益创业新形式帮扶无业妇女再就业	148
关爱帮扶留守人群的“晨夕共护”行动	149
深入农村普及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	150

第三篇 体悟·时代脉搏

大学生重走长征路	153
京港青年伙伴，携手探索北京	154
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开展关爱帮扶“暖阳”行动	155
北京 18 名大学生重庆拜师棒棒	156
北京科技大学学子与大山里孩子的“心路”之旅	158
暑期社会实践拒绝“老三样”	160
大学生组团下乡，寻找失落的山西古建	162
我的中国梦，我的蓝天梦！	
——中国生态城市绿色经济“双赢模式”社会实践之厦门	164
让导盲犬拉近盲人与世界的距离	165
被援助学子带领 6 名同学回家乡支教传递爱心	168
暑期实践大学生掀起丝路热	170
大学生研发智能盲杖：遇障可震动报警	172
追寻中国梦，聆听最真实的声音	
——一群大学生走进我市 16 所学校，访谈 60 多位乡村教师	175
北京科技大学燃烧的心火关爱抗战老兵社会实践活动	177
走进无人机科技实践团登上央视《越战越勇》	178
山村孩子们的思念	179
“小禾欣”走进中建三局工地感受万丈高楼平地起	180
大学生拍微电影讲科技下乡	181
城市生存联合实践团	183

第一篇

求知·理论探索



基于实践成果转化的

优秀学术论文

论文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对实践内容的梳理，是实践队员们的思考和感悟。本部分收录了获得国家级“挑战杯”竞赛一等奖、首都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论文特等奖等的 10 篇社会实践成果转化的优秀学术论文。

大师·店主·摊贩·爱好者

——北京地区面塑艺人的结构分层与行业生态

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作者：毛东升 张旗 洪礼滨 张文涛 祝天航 赵宇潇 韩秀艳

指导教师：邢朝国

【摘要】在文化自信的当下，如何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看，媒体和学界较多地关注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实践，较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的内部结构分层与行业生态问题。本研究以面塑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探讨面塑艺人的结构分层及其行业生态，以期理解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理解。研究发现，面塑艺人在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和未来发展上出现了巨大的分层。本文在对北京地区面塑艺人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将面塑艺人分为大师、店主、小摊贩和爱好者四类，分析了不同面塑艺人的访谈实录，并结合自己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分析了行业分层的内因和外因，并进一步对行业分层的危害进行了论述。研究发现，行业内部分层的加剧可能导致面塑行业出现许多不良后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几个角度对面塑行业的发展保护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塑 艺人结构分层 行业生态

1 引言

在文化自信的当下，如何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看，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面塑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代表思想有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面塑行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让面塑进入市场经济以检验它的创新性以及面塑发展与当地旅游业结合；面塑艺术的保护问题，主要分为国家立法保护和社会保护；作为面塑艺术传承者的艺人发展与保护问题，包括保护方式、社会地位研究等。媒体和学界较多地关注政府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实践，较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的内部结构分层与行业生态问题。因此，本研究以面塑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探讨面塑艺人的结构分层及其行业生态，以期理解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理解。

基于此，来自 A 大学的 7 名学生组成了北京地区面塑艺人行业结构分层调查团。在 2014 年 7 月 2~20 日期间，前往北京南锣鼓巷、后海、前门、王府井、琉璃厂、国子监街和许多老胡同，对北京地区的 17 位面塑艺人或与面塑相关的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和参与观察。我们发现面塑艺人在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和未来发展上出现了巨大的分层，大体



上可分为大师、店主、摊贩和爱好者四类。我们通过分析不同面塑艺人的访谈实录和自己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分析了行业分层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方面主要是艺人间技术的差异、创新力的不同、经济实力与从业心态的不同和行业间的不良竞争；外因方面主要是时代变化的影响、政策扶持力度差异化以及不同行业层次社会资源的不同。

我们进一步对行业分层的危害进行了论述，研究发现，行业内部分层的加剧可能导致同行业内部缺乏交流，进而导致整个面塑行业进步缓慢、行业内分层加剧，整个行业的稳定性降低以及从业人员减少，传统面塑手工艺后继无人等不良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几个角度对面塑行业的发展保护提出了建议，包括面塑行业 4 个层次的具体发展建议以及国家政府如何给予面塑行业更多保护与支持的具体建议。

2 面塑行业的结构分层

2.1 名扬国内外的大师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技艺高超的面塑艺人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作为面塑艺术的继承者和弘扬者，面塑大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1.1 类别特征：师从名家，独具一格

很多面塑大师出身名门，从小就跟着有名的师傅学习或是直接继承父辈的衣钵，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在我们采访的艺人中，面人由就是其中之一，由师傅是在爷爷的熏陶下开始学习面塑的，是北京面人由第二代传人。同时也不乏自学成才的大师，如面人彭，彭师傅出生于北京，他从小就对橡皮泥特别感兴趣，经常用橡皮泥捏泥人玩。“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书可念的彭师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捏面人上，凭着过硬的绘画功底和通晓人体构造的父亲的指点，吸取了百家精华的彭师傅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面人风格。

2.1.2 行为模式：静心创作，兼顾经营

面塑大师在经营与创作方面，与其他层次的面塑艺人迥然不同。面塑大师在经营方面，由于顾客的需求量很大，一般会雇用很多工人来制作面人，大师们有时可能会根据顾客的需要捏一些做工较为复杂的面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则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创作那些自己构思许久、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认真琢磨才能呈现的大作品。

面塑大师在物质上并没有过多的追求，因此自身也不会过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从我们的实地调查采访中，我们发现许多面塑大师只是雇用他人或者由自己的亲属经营自己的店面，大师们自己则是在工作室中进行自己的创作活动。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在整个面塑行业的名誉和地位，自己对于面塑行业发展的带头和推动作用，以及整个面塑行业应当何去何从。



2.1.3 利益格局：名声响、收入高、待遇好

面塑大师在声望、收入、享受待遇等方面都居于面塑行业的上层，始终以泰斗、专家的形象活跃于面塑行业。

在声望方面，面塑大师代表的是面塑行业，是面塑的符号。他们以精湛的手法获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通常代表国家参加国外的展览、宣传等活动，代表面塑行业向国外展示面塑技艺。据面人彭的妻子介绍，前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曾去美国经贸会谈时送给希拉里一个面人，希拉里非常喜欢，她来北京经贸会谈时，外交部长还特意邀请了面人彭师傅。

在收入方面，面塑大师收入较高，居于行业顶层。大师们收入较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受众对象的广泛性，包括面塑收藏者、高端消费者及海外消费者；第二，经营方式作坊化，他们通过雇用其他面塑艺人或者收徒，以及平时对这些人进行面塑技艺的指导，使面塑产品可以大规模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第三，面塑商品定价较高，大师们由于制作面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以及根据客户需要承接专门订单，因而其商品定价很高。

2.1.4 面临困境：行业内部不正当竞争与收徒困难。

面人彭的妻子向我们介绍道，在面塑行业，很多人是靠污蔑别人来竞争的。甚至有的人为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谎称自己祖孙三代都是做面人的，因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三代以上传承。同时，虽然大师们的收入较高，但是并不固定。我们在面人由的店面了解到他们的压力，在我们进入他的店面时，发现这里没有一个顾客，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一件件面塑作品。

面人彭的妻子还向我们介绍，现在国内对面塑的重视程度太低，希望社会支持这种艺术，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手艺人保障工资，以便让他们能够传授技艺给下一代来传承。

同时大师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收徒困境。行业要发展，就离不开传承，作为面塑大师，选择好的徒弟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名号传承下去，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贡献给下一代面塑艺人。面人由的传人是他的儿子，面人由的儿子从小就喜欢面塑，同时他也是面人由的第三代传人，是国家级大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面人由那样有一个心仪的传人，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面人彭现在没有徒弟，一方面是因为培养一个徒弟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的经济投入是较大的；另一方面，徒弟需要去街边摆摊，但是他们制作的面塑是比较粗糙的。

2.1.5 行业希望：弘扬面塑手工艺术，创作热情永不熄灭。

“面人彭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看到希望，并希望能成立专门的艺术学校，能通过国家认证并不断晋级，不同级别的待遇不同，能有一个标准工资，让工匠能够生存，从而使他们能够静下心来研究这项艺术。”

尽管对现实处境十分担忧，但各位大师对待面塑的热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他们依然奋斗在面塑创作的最前线。面人彭最大的心愿就是制作《三国演义》的场景，如三英战吕布、空城计。



许多面塑大师尽管年事已高，但是仍放不下对面塑的热爱，他们前往高校演讲、表演，将这项北京传统民间艺术介绍给大学生；参加海外艺术品展览，向世界展示我们绚烂多彩的面塑文化，为面塑发展贡献着他们的一生。

2.2 开店艺人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难找到街头艺人了，取而代之的是旅游区内一家家专门卖面塑的店铺，我们统计发现，现在开店的艺人已经占到面塑艺人的绝大部分了。

2.2.1 类别特征：旅游区内的“小店风景”

我们在旅游纪念物的小店中不难发现面塑的店铺。相比其他的分层，这一层面的开店艺人显得正式稳定些。面塑由一开始的走街串巷发展到了现在的面塑艺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店面，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较为稳定的收入和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这让他们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过去他们是不敢想象自己能有一个店面来卖面塑的，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在一个地方扎根，还可以塑造自己的名气。

2.2.2 行为模式：变化不少，人像为主

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所有的开店艺人都是以捏人像为主，经师傅们介绍，现在古代造型的人像的销量不大，因为古代人像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艺人一般都把店面开在旅游区，游客一般没有时间去等待。另外，在旅游区，大家也都希望能够捏一个人像来做纪念。

对于现在的艺人来说，网络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便利，在我们采访的开店艺人当中，所有人都会将自己的作品放到网络上去宣传，同时也会接受网上预订，我们在许多艺人的店面里都发现有人通过网络将图片发给师傅，作为捏面人的参考，这也是面塑发展到现在的变化。

2.2.3 利益格局：尴尬的行业地位，稳定的收益情况

经营方式是影响店面收益的重要因素。相对稳定的经营方式，使得店主的收益较为稳定。但是他们没有大师的名声，在技术上也难与之媲美，所以他们面向的消费人群有限，局限于游客以及想要捏人像的消费者。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开店艺人面塑作品的价格基本都有一个固定的价位，每个店面相差不多，并且造型相似，所以他们的销售情况也大致相同。我们访谈的几个艺人都表示每天可以做几个作品，价格也都在 200 元左右，但这仅仅是在旅游旺季，在淡季他们的收入也会发生变化。

对于利益来分配来说，店主和面塑艺人有特定的分成方式。这要因店而异，倘若店主也从事面塑制作，那得到的利益比例会更大，若店主不参与制作，那么为店主工作的面塑艺人得到的收益比例会更大。

2.2.4 面临困境：房价、空间、徒弟3座大山

第一，房价成本过高导致生存压力大。在北京这座房价极高的城市里，想租一间店铺并不容易。以蔡师傅为例，他现在的店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在前门的老北京艺术馆刚开业而无偿给他们提供的，但是，当艺术馆运作起来以后，昂贵的店面费用还是让他很头疼，就像蔡师傅所说：“捏传统人物是面塑的精髓，但是现在市场不允许你这样做，要跟随市场的变化，就要捏人像，这样才有人买，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第二，师傅们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国家对面塑行业的保护。徐师傅认为面塑行业在我国正在衰落，而主要原因就是国家没有给手艺人好的发展空间，手艺人多是代代相传，生存空间小了，利润少了就没人学了。蔡师傅介绍说，在利益至上的市场上，店铺向来都是价高者得。

在与开店艺人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很注重自己的名气，就像徐师傅说的：“如果能像大师那样打出自己的招牌，有自己的主推，那么包含的价值高了，面人也会涨价。”而蔡师傅和彭师傅则称自己为“萧派”传人，目的就是借师傅的名气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第三，徒弟难选造成传承困难。提到传承问题，在选徒弟这件事上，艺人的看法各不相同。蔡师傅对我们说：“好的师傅想找好的徒弟很难，要找一个真正有兴趣的，能踏实学习的徒弟很难，有的人学习了一点就不想学了，有的人很想学却找不到师傅，有的艺人很保守，不一定会传给外人。”杨师傅也说：“师徒也是一种缘分，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也不是谁都能学好的，要有天赋，有耐心，如果刚开始学就想着赚钱，就肯定学不好了。”徐师傅则认为现在徒弟想学艺的目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他们多是为了赚钱，而且手艺不精还会坏了师名。

2.2.5 行业希望：支持、推广与发扬

首先，对国家的希望，面塑艺人更多的还是希望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蔡师傅希望可以将面塑推广到学校，因为面塑虽然掺了一些化学原料，但是相对于橡皮泥要环保，可以在幼儿园和小学开办兴趣班，可以聘请面人师傅去教孩子们，不管他们以后是否要从事这个行业，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杨师傅也认为应该多扶持民间艺人。

另外，他们还希望国家可以给他们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师傅们提到了行业环境和创作环境对面塑艺人的影响很大，彭师傅说：“艺术家没有好的创作环境，没有好的条件，怎么保护面塑呢？有些国外的艺术家，国家给他很好的待遇去创作，这样创作出来作品就会非常棒，因为在一个好的物质条件下，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

其次，对社会的希望，面塑艺人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去关注面塑这一传统手工艺，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让面塑在社会中得到重视，这样也有利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

提到对未来的打算，蔡师傅说，争取建立一个免费的面塑博物馆，将自己优秀的作品放进去。自己未来会更加努力，推陈出新，既要继承了祖传的技艺，还要大胆创新，把现代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融合到面塑艺术中去，拓展面塑的表现形式，升华自己的技艺技术，将面塑行业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2.3 摆摊艺人

我们关于面塑的记忆大多数可以追溯到孩童时期，走在街上，穿梭在胡同中，随处可见的就是摆摊捏面人的老师傅。可如今，在街上发现那些摆摊的面人师傅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2.3.1 类别特征：流动的艺术小摊

这类摆摊艺人大多数是处于生活底端的弱势群体，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靠着这门手艺，以极低的工具成本游走在每一个可能会有传统手工艺术消费需求的地方。

这类摆摊艺人基本没有固定的地点，也许早上还在城市的东边，晚上就在城市的西边了，而导致这一流动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的变化。相比于其他分层，这类面塑艺人的工具简陋，设备简单，用料较为粗糙，造型也单一、缺乏表现力，收入也较少。

2.3.2 行为模式：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

摆摊艺人的从业方式和原来相比并没有差别，都是将材料带在身上，走到哪捏到哪，延续了传统的售卖方式，他们边捏边卖，有人需要他们就按照要求捏，其余时间都是在做自己拿手的一些小作品。

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摆摊艺人所捏的面人基本都是关羽、孙悟空、猪八戒这类传统人物，也有机器猫这类的卡通人物，在造型上，逼真度较低，较为粗糙，在颜色上，与原角色相差较为明显，缺乏表现力。从制作的速度上来看，这类艺人对所要制作的面人造型十分熟练，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制作出一个成型的作品。部分摆摊艺人也接受制作人像这类活，但是制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质量与其他分层的艺人的作品有一定差距。在用料上，摆摊艺人由于经济原因，所用材料相较于其他分层来说保存期限短。在价格上，也远低于其他分层。

2.3.3 利益格局：弱势群体

对于摆摊艺人来说，影响他们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环境因素，因为天气、城管等具体的原因使其需求受众极不稳定，在下雨天，他们无法出来摆摊进行买卖。在冬天，外面气温低，他们也难以在室外进行制作，同时对他们的材料也有极大的影响。在一些旅游区或者商业区，由于城管对道路管制的原因，他们不得不与城管打起游击战，面临其他分层的压力，他们只占有着这一行业中最廉价的市场。甚至在面临营生手段难以解决温饱问题时，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手艺活，改行转业。

2.3.4 面临困境：生活与自尊的烦忧

摆摊的面塑艺人由于没有经济能力租店面，所以他们只能摆摊，而摆摊给他们带来的是无法预测的困难。以我们在后海采访的李师傅为例，李师傅有时候每天卖一两个，有时候四五个，有时候甚至几天都卖不了一个。平时李师傅在北海附近摆摊。当春节来临时，如果春节期间店铺便宜，李师傅会租一个店铺，这样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后海这个市场只

有夏天存在，冬天就没有了，城管管制很严，李师傅经常会受到影响，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捏面人所带来的收入也是有限的。李师傅的收入有时甚至解决不了他的温饱问题。王师傅更是无奈地表示租房子也只能租那种租金便宜的，距离北京城区较远的，而且做生意不能强买强卖，做出的面人只能由顾客决定买或不买。

由于摆摊捏面人带来的收入不稳定，许多当时一起学习的同行很多都选择了改行，坚持到现在的只是一小部分。当时李师傅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学习捏面人，可是坚持到现在的就只有李师傅和他的五弟。王师傅谈及同行发展的问题时说道，做面人需要耐心，很多人都都不做了。在这样一种经济与自尊的双重压迫下，许多摆摊艺人的心态开始出现改变，文化自我认同意识开始动摇，产生文化自卑心理，对于坚守传承岗位的热情日益消减。

对于收徒弟这一问题，摆摊师傅的经历颇为相似。很多师傅曾经收过徒弟，但徒弟都基本放弃了以捏面人为生的计划，大多数人选择了改行。不同于面塑大师和有店面的面塑师傅的回答，摆摊的面塑师傅对于是否有意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捏面人的问题的回答让人比较吃惊。有的师傅说自己的子女不愿意学习捏面人，不感兴趣，觉得捏面人太累了；有的师傅表示不愿让自己的子女从事面塑这一行业，因为这一行业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回答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又在我们的意料之内。因为这些师傅是摆摊的，面塑在他们子女的眼中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职业。

2.3.5 行业希望：对于现状的无奈、对于面塑的坚持

摆摊的面塑艺人对于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了解较少，他们希望国家能对他们进行扶持。由于是摆摊进行生意的，面塑师傅对于自己的定位比较低。他们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分人的，如果能有艺术家证，那么他还有可能得到补贴。他们是被忽略掉的对象，国家对他们的保护较少，他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事情，即使有，他们也没有途径知道，这就是摆摊艺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谈及自己未来的发展问题时，摆摊的面塑师傅们表示自己还会在捏面人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原因可以大致分为3点：第一，多数摆摊的面塑艺人表示自己只会捏面人这一门手艺；第二，部分师傅表示自己对面塑感情深厚，不想放弃自己学了多年的手艺；第三，部分师傅的年龄较大，身体不便，不能适应其他工作。

2.4 兴趣爱好者

还有一类人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他们就是面塑爱好者。打开微信刷新朋友圈，会发现那些并不以面塑为业的人在晒自己的作品。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职业，做面塑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

2.4.1 类别特征：不以面塑为主业，只因兴趣爱好

面塑爱好者作为面塑艺术传承和发扬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面塑圈内起着非常微妙的作用。之所以称其为“爱好者圈子”，是因为面塑爱好者进行面塑作品创作时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别于我们上面所论述的以面塑行业为生的大师、店主、摊贩。面塑爱好者最



显著的特征是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在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后，他们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进行面塑创作来消遣娱乐，有时也能以此赚点外快。但挣钱不是他们学习面塑的主要动力，相反，有钱才是他们学习面塑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2.4.2 行为模式：陶冶情操，网络宣传

面塑爱好者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由居住地到工作地，而面塑则是他们平时规律而又单调生活中的点缀。每当下班、节假日时，他们便会饶有兴致地拿起面团和刻刀，创作属于自己的面塑作品。爱好者中的佼佼者也会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出售甚至接受一些定制作品的订单，让面塑为自己带来一些收益。他们在面塑上的收入显然不能与大师、店主和摊贩相提并论，出售自己作品所得的收入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自己的面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和喜爱。

由于没有自己的店面、地摊，面塑爱好者的作品往往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不过，我们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位面塑爱好者郭女士。她是一位西点面点师，工作之余喜欢钻研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面塑。郭女士善于利用一些网络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信息，吸引一些顾客来认可、购买或是定制自己的作品。独特的模式为面塑的传承与发展另辟出一条蹊径。

2.4.3 利益格局：不以盈利为目的，赚点外快也可以

面塑爱好者游离于面塑“行业”之外，由于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大师、店主、摊贩那样的“同行是冤家”的说法。爱好者本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他们并不存在竞争，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这利于交流经验技术，促进自身面塑技艺水平的提高。由于爱好者们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和收入，面塑为他们所带来的外快或许不算太多，但对于他们两点一线的生活来说无疑增添了一点乐趣。可以说，爱好者进行面塑创作的动力只有对这项中国传统艺术最纯真的热爱。

2.4.4 面临困境：技术粗糙，缺乏创新，传承困难

若没有生存的压力，爱好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来发展自己的爱好。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谋生的紧迫感可能会使他们的创作动力不足。就我们目前所采访到的面塑爱好者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作品水平与专业面塑艺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当工作紧张和家中事务较为繁多和集中时，他们会暂时将面塑这个爱好抛之脑后，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面塑爱好者主要是自娱自乐。当下掌握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需要有人招收学徒，将它传授给更多的人以避免其失传。但是爱好者们由于自身技艺水平所限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还未能达到传道授业的高度。面塑爱好者虽然分布零散，但是他们确实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2.4.5 行业希望：挑起传承的重任

比起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旅游景点摆地摊的那些面塑艺人艰难谋生的辛酸场面，这些

爱好者们要幸运得多。他们没有生存压力，可以坐在家，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或许是很多摊贩所梦寐以求的。所以，爱好者有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让爱好者担当传承面塑技艺的重任，是否是在走非专业化的道路？其实不然。这种情况下，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加强引导，组织讲习培训、研讨交流活动，在这些爱好者身上多下功夫，把他们培养成传承发扬面塑技艺的中坚力量，让这个群体在自己的爱好上有所建树，开花结果。

3 行业分层的原因

在将面塑艺人大致分层后，我们对他们的访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理分析，总结了行业分层的几点原因。

3.1 内因

3.1.1 技术上的明显差距

面塑是一项纯手工制作的艺术品，技术是评判艺人面塑手艺的最主要依据。以大师来说，他们的作品多以古代人物为主，技法精准，在面人由的店面里，大到70厘米，小到在花生壳里的创作，人物形象生动鲜明，面部表情惟妙惟肖。在旅游区开店的艺人大多以现场捏像为主，人物大小相差不多，没有太多技巧的变化。而与其对比最为鲜明就是街头摆摊的艺人，他们以简单的卡通形象和动物为主，造型简单，一成不变，且做工粗糙，而业余面塑玩家的作品质量不能与大师甚至街边摊贩相提并论。

3.1.2 艺人之间创新力的不同

面塑作品的存放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而大师们在继承老一辈艺人的优秀传统制作技法的同时，改良了以前的面塑作品不能长期存放的弊端。举例来说，张师傅的代表作《千手千眼佛》有翡翠质感，是因为他在制作过程中在其表面上涂了一层指甲油。在旅游区开店的艺人，他们将面塑与西方的雕塑相结合，进行人像的捏制，这也迎合了现代人的口味，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历史风貌，不能丢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应当努力使面塑艺术既有民族特色、艺术个性，又富有时代精神。摆摊艺人也会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不过相较于以上两种阶层，他们的创新力有限，李师傅表示只要有图片他就可以捏流行的东西，但他不会主动上网去寻找流行的东西。

3.1.3 经济实力与从业心态

通过调查走访我们发现，大师们不管是在他们接触学习面塑的时候还是现在，家庭经济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而从该调查结果来看，大师们一般都有自己的退休金，因此他们



并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压力，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面塑创作上来。开店艺人承担着巨大的房租负担，蔡师傅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过去他学艺时可以更好地学习而少吃几顿甚至去借钱，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他要顾及家人。对于摆摊艺人，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有时候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这句话道出了李师傅的无奈。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将面塑与生存联系到一起，因此从业心态自然与大师相差甚远。而面塑兴趣爱好者，他们并不以面塑作为自己的主业，而是将它作为一种爱好，所以他们对于面塑产品的质量要求并不严格。

3.1.4 行业内的竞争

面塑艺人也向我们诉说了行业内部的不良竞争，这也是造成行业内部分层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许多艺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同行是冤家”这句话，生意好做，伙计难搁，造假和污蔑他人的大有人在。面塑艺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牵涉的代表性传承人自身以及与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关系冲突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使行业内部的信任度降低，艺人不敢相互合作。

3.2 外因

3.2.1 时代背景

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渗透，以往的民风民俗已不再适应新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生活的要求，面塑作品要适应社会新的要求就必须随着民风、民俗的转变而转变。对于这点，不同的艺人对现代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大师们的文化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使由街头艺人制作的“面人”玩具，逐渐发展演变成具有较高观赏和收藏价值的“面人”艺术品。

而摆摊艺人还有许多停留在走街串巷的阶段，他们带着原料，走到哪里捏到哪里，沿袭着旧时的传统。

3.2.2 扶持力度

众所周知，积极的政策扶持能让面塑这种传统民间手工艺行业锦上添花。但是我们走访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艺人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政策支持。大师们作为面塑行业的领头羊，得到更多展示的机会，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民间艺术大师”的荣誉证书和奖励。但是据我们了解，摆摊的艺人并没有得到政策支持，他们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生活条件都不满足，何谈更加积极地研究高精尖的面塑艺术？对他们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更为优先，一味追求利益，就会造成作品的精而无内涵，不再能展现面塑曾经具有的文化韵味，就更难登上大雅之堂，这样恶性循环，只能造成行业分层越来越明显。扶持仅仅向少数代表性传承人倾斜，这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会越来越薄弱。



3.2.3 不同层次社会资源的不同

大师级的人会获得许多关于面塑的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由于层次较高，这一层次的面塑师傅们也经常获得一些外出访问、观摩学习、出席活动、举办讲座与展览的机会，能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收益，因此也使强者更强。

处于面塑行业底层的面塑艺人们，由于生活的压力和资金的缺乏，在信息与资源的获取方面最被动，由于生存压迫缺乏充足的创作时间与精力，也很难更上一层楼。

处于面塑这一行业中层的人，他们的交往圈层也局限于同层次的人，所以他们想获得高一级别的称号依然很有难度。

于是，高层次的面塑艺人走向更高的层次，低层次的面塑艺人找不到翻身之路，中间层次的面塑艺人苦苦寻觅却总是不温不火。各层次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差距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严重的分化。

4 行业分层导致的现状

在面塑界，面塑从艺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是一种正常显现，是行业发展的产物，但以上诸多的原因导致面塑行业内面塑艺人的分层状况也愈加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层状况确实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后果。

4.1 同行是冤家，内部缺乏交流，面塑行业进步缓慢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在面塑这个行业内，几乎每个面塑艺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自己在从业道路上仔细琢磨出来的闪光点，而这些独特之处则是他们用来吸引买者，博人眼球的东西，也是推动整个面塑行业进步的关键点。然而，他们却都不希望将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工艺技术或者独特的面料配方公诸于世，哪怕只是分享给业内的好友。这样就导致面塑行业内部缺乏交流，大家无法相互学习，造成行业发展十分缓慢。

4.2 行业内分层加剧，整个行业的稳定性必然降低

尽管任何一种分层体系都可能分成上、中、下 3 个层次，但是其形状结构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般都分为金字塔形、哑铃形和橄榄形 3 种类型。现在面塑行业内的分层情况已经呈现出金字塔状，低层的面塑手工艺者占相当一部分，在所调查的群体里，还有很大一部分面塑艺人处于行业底层，在北京这座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里，他们仅靠面塑获得相当不稳定的收益，甚至已经无法满足自己正常的生活需求，再加上政策的缺失，城管的压力、无暇精进手艺等诸多因素，生存状况十分糟糕，发展状况也堪忧。由此可见，面塑行业内部结构已遭到破坏，稳定性降低，面塑艺术的传承面临重大瓶颈。



4.3 从业人员减少，传统面塑手工艺后继无人

面塑这一传统手工艺主要是以一代传一代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我们同样针对不同阶层的手工艺人提出了是否有继承人的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发现，在处于上层的面塑艺人中，多数人的下一代承袭了这门手艺，如面人由的传人就是他的儿子，面人由的儿子从小就喜欢面塑，在十几岁时就可以捏出非常精美的作品，同时，他也是面人由的第三代传人，是国家级大师；处于中层的面塑艺人中，多数人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传承他们的手艺；处于下层的面塑艺人中，由于自己的生存状况十分糟糕，他们大部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面塑行业，他们认为这一行业没有发展前途。随着面塑艺人分层的不断拉大，底层艺人的生活变得十分窘困，也导致年轻人不愿加入传承行列。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老去，面塑行业将日渐衰弱。

5 对北京地区面塑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过对北京地区面塑艺人的走访调查，我们将面塑艺人分成了大师、开店艺人、摆摊艺人和兴趣爱好者四类，并得出了面塑行业出现结构分层的行业生态。针对这种行业生态，我们分析了不同面塑艺人的访谈实录，并结合自己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总结了行业分层的原因及行业分层差距拉大的危害。

对于不同层次的面塑艺人，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对此，我们对每一层次的面塑艺人提出了建议。

大师：主动寻求政府帮助，要公众化、平台化地去扩大政府保护传统艺术措施的社会关注，学会引导群众力量，这就需要借助新兴媒体手段扩大认知度，让人们了解这一行业的生存困难之处。可以通过大学生这一新生力量来推动政府的措施启动与落实。在文化传承方面，在徒弟的工资机制中要有法律的改善，充分保障双方的利益，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面塑行业的学习中来。

开店艺人：寻求订单，走大销量销售途径。可以通过接收订单来寻求同为面塑制作者的帮助，形成作坊，这也是寻求徒弟的方式，可以通过初步传授技艺来让徒弟进行分工制作，既传承技艺又获取利润。同时也可以借此来帮助第一层次的面塑艺人获取收入。他们也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创作。再者，我们建议他们借助新生传媒手段，如团购、微信平台等新兴推销手段，扩大网上销量。争取向更高层次的面塑艺术家发展，形成品牌效应。

摆摊艺人：首先，流动经营不是长久之计，是最大的隐患。理当寻求固定场所，寻求合伙经营人，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同时减少意外因素，也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天气因素的影响。其次，要注重面塑作品的质量，高质量才能保证回头客。同时，我们还建议这类艺人寻求表演的机会，与需要传统艺术演出的酒店联系，为他们进行商业表演，不仅能获得演出报酬，同时还可借机推销作品，形成长久的销售渠道和收入来源。

兴趣爱好者：他们并不打算将面塑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并没有面对过多的生存压力，相反，他们可以发挥自身的力量，让更多喜欢面塑的人加入到这一层次来，这对于面塑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 4 个层次的面塑艺人来说，他们的力量始终是薄弱的，不论哪个层次，都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措施，想要保护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有能够直切基层的措施保障。

日本作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先行一步的国家，长期以来在其文化遗产行政中积累了很多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坚持文化遗产是全体国民珍贵的文化财产这一基本理念，通过法律明确地规范所有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当事各方，包括政府、地方公共团体、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及管理者、普通国民的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举国体制”，便是其中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之一。

政府：需要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深入基层。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使拥有面塑技术的工艺家有工作、有收入，避免这类手艺人脱离面塑这一行业，导致人才凋零。政府还可以建立类似百工坊这样的机构，以展览馆形式为手艺人提供展示场所，同时也有利于艺人之间相互交流借鉴。

行业内部：首先要摒弃“同行是冤家”这一想法，要寻求合作机遇，低层次的人可以为更高层次的手艺人工作，赚取工资，既保证收入又学习到技术，改善自己技术上的不足。同时要完成从制作到创作的转变，只有创作，才能更好体现文化价值。大师们要学会申请专利，并能够传授技艺给面塑行业的新手。既要利用媒体手段来提高民众对面塑行业的认识，又要起好行业领头羊的作用，将自己技艺的独到之处申请专利后分享给他人。而兴趣爱好者要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以撒网之势向社会宣传面塑，这对于保护这一传统手工业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只有 4 个层次的面塑艺人齐心协力，互相交流，互相竞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才能迸发最大的力量，缩小整个行业的差距，使引擎提供最大的能量。

参考文献

- [1] 陈秀梅.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J]. 福建艺术, 2008, (5): 1-3.
- [2] 郭早早. 指尖上的旋律[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02-26 (4).
- [3] 黄巧立. 面塑艺术的审美特征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J]. 艺术科技, 2014, (4): 1-1.
- [4] 李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类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结合研究——以大连艺术学院“非遗进校园”项目为例[J]. 今日中国论坛, 2013, (19).
- [5] 罗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6] 鲁汉. 关于民间手工艺传承的当代性思考——以菏泽“捏面人儿”手工艺为例[Z]. 中国会议: 鲁汉, 2006.
- [7] 南长全. 从“面花”到“面人”——论我国民间面塑艺术从乡村到城市的传承演变[J]. 美与时代(上), 2012, (4): 1-3.
- [8] 乔方辉. 张启龙. 从“百年面塑村”的发展谈民间艺术传承保护及开发的意义[C]. 乔方辉, 2007.1.

周星. 周超.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举国体制[J]. 文化遗产, 2008, (1): 1-1.



- [9] 钱永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艺人——以祁县农村“跑事筵”艺人为例[J]. 文化遗产, 2014, (5): 1-7.
- [10] 王江. 中国民间面塑艺术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06.
- [11] 魏文静. 许卫. 沈向阳. 家传面塑工艺, 借助网络提升光大[N]. 常州日报, 2010 (3).
- [12] 萧放.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 文化遗产, 2008, (1): 1-6.
- [13] 徐梅. 面塑的市场突围之路[N]. 中国旅游报, 2012-12-12 (15).
- [14] 许轶璐. 浅谈非遗项目“走出去”活动的组织[J]. 大众文艺, 2013, (22): 3-4.
- [15] 曾平.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理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理解读[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 (3): 68-74.
- [16] 张西昌.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 西安: 西安美术学院, 2013.
- [17] 周星. 周超.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举国体制[J]. 文化遗产, 2008, (1): 1-1.

“医漂”群体医患信任问题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基于对外地人员来京就医情况的调查

第九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特等奖

作者：李世晨 刘晓

指导教师：邢朝国

【摘要】“十三五”期间，我国医疗改革的脚步逐渐加快，实现建设“健康中国”这一宏伟战略成为国家人民的“中国梦”。近年来，医患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影响医患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医患信任问题。北京作为全国医疗中心，吸引了大批外地患者进京就医，“医漂”即指这些专门从各地前往北京就医的患者及家属群体。北京科技大学暑期“医漂”社会实践团运用访谈调查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外地人员进京就医情况展开调查研究。本文将就“医漂”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医漂 医患信任 刻板印象 “差序格局”信任模式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医患关系是患者与医务工作者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相关关系，目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影响医患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医患信任问题。医患关系的核心就是为实现双方的相互期望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医患之间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内涵是影响医患交往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3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是目前中国社会不信任中较为严重的部分。《中国青年报》2011 年对 6744 人的调查显示，82.4% 的人认为目前人际信任度低，其中医患信任度最低，仅 9.5% 的人认为双方存在信任。一些大型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医患信任关系正在持续恶化，具体表现在医患纠纷与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频次快速上升、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显著增加，医患对彼此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医患的不信任关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重构当前脆弱的医患信任成为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目标。

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存在差异，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地域发展十分不平衡，北京因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成为“全国看病中心”。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6 年北京市总就医人数达 2.2 亿人次，其中外来就医人口日均 70 万左右，我们



把这些专门从外地来北京求医的人群称为“医漂”。目前北京看病难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三级医院，庞大的“医漂”群体给医院带来沉重的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医患矛盾中医患信任问题也显得尤为突出。

新时期社会转型背景下，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提上重要日程，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医学更强调“以患者为中心”，医生不仅要了解疾病，还要了解患者的心理，与病人建立真诚互信的医患关系，保持医患和谐、平等，最终达到治疗目的。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应当更加重视患者诉求，从患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对医患关系中医患信任这一重要方面更深的理解与追求，我们以访谈的形式与“医漂”进行了深入交谈，以求更加真实地表达患者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2 文献综述

医患信任关系研究是医学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之一，关于医患信任问题，多数学者在既往的文献研究中主要从伦理学、法学等理论视野以及政治制度层面进行了讨论和阐述。

2.1 理论视野

医患关系是人们在医疗实践中所结成的医学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确定构建医患信任的道德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不少专家学者从医学伦理学视角深入分析了医患信任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龚莎（2013）试图根据德性论的原理阐明医患信任概念的内涵，分析医患危机现象产生的根源，揭示危机的症结，寻求解决医患信任危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可行之路。

法律在处理医患纠纷，重建医患信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通过法学视角对于法律在解决医患信任问题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石悦等（2010）鉴于医患信任机制与医事法律的互动关系，认为医患信任支撑医事法制的整个运行过程，健全的医事法制能够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同时也认为只有“在人文关怀下，人们才能知法守法，促进医事法律的运行”。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王兴龙（1998）认为，医疗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医学诊疗过程中相互对应的医患个体之间，医生拥有而患者不拥有或少量拥有诊疗信息，并由此形成在医疗活动和医患关系中信息分布、掌握不均衡的状态。

2.2 政治制度层面

医患信任问题的存在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和曲折性存在直接的客观联系，因此制度性因素是分析医患信任问题不可忽略的背景。杨阳（2009）认为中国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主要源于无序、扭曲的市场竞争中医疗行业的集体性逐利，从而诱发高昂和过度的医疗费用，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和经济利益。



医患矛盾不断恶化，医患信任持续滑坡，解决医患信任危机早已刻不容缓，针对如何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学者们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医患信任问题的结局思路。张亮（2012）认为应改变“以药养医”的医疗机构补偿模式，以医疗机构服务范围为基础科学构建医疗机构投入模型，通过政府投入解决医疗机构发展过程中设备、设施、人才等经济需求，使医疗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质上来，解决医疗机构运行中经济负担过重、与民争利的现状。

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资料来源

根据研究课题的目的，鉴于患者的代表性和规模，“医漂”社会实践团队选择于2016年7月23日~8月5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日友好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等多所北京市三甲医院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社会调查实践。在此期间访谈并记录下103例实际有效的访谈案例，并根据案例记录制作了基本情况统计表供研究使用。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调查法。本研究采用自编访谈提纲，通过经统一培训的实践成员充当调查员与被调查者面对面交流，收集与“医漂”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调查采用Excel进行图表绘制、百分比描述、数据透视。

4 理论假设

医患关系不和谐是医疗改革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医患信任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访谈调查法近距离接触患者力求深入了解医患信任问题出现的原因。本文将通过社会学方面的社会人口学、刻板印象以及费孝通“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等维度阐释外地进京就医患者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问题。

从刻板印象理论可将患者的信任解释为预设性信任与预设性不信任，信任表现为患者盲目追求医院和医生的知名度，习惯性信任年纪大资历深的医生，不信任则表现在由于媒体不客观的舆论导向导致的患者对院方不加思考的不相信及患者心中医生形象塑造失败。

从费孝通“差序格局”信任模式分析部分患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试图与医生建立更亲密的“熟人关系”以获得情感、信息和帮助，达到符合自己期望或满意的结果，因此而建立“医患信任”。



5 正文

5.1 调查的基本情况

笔者选择在各大医院就医并有清醒意识的患者作为被调查者，进行短期或长期的访谈调查，一般情况均要求患者自己回答问题以确保调查质量，儿科患者请家长代为回答。在经过患者或家属授权同意下进行跟随拍摄，并在治疗结束后对部分患者进行回访。

基于社会人口学因素分析，我们对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部分受访患者人口学特征统计表

变量及赋值		比例%	变量及赋值		比例 (%)
性别	男	51.46	患者来源	安徽	1.94
	女	48.54		北京郊区	8.74
				福建	0.97
年龄	30 岁以下	10.8		贵州	0.97
	30 ~ 40 岁	15.53		河北	28.16
	40 ~ 50 岁	47.57		河南	7.77
年龄	50 ~ 60 岁	18.45		黑龙江	7.77
	60 岁以上	7.77		湖北	1.94
				吉林	2.91
学历	小学	21.36		江西	1.94
	初中	41.75		辽宁	2.91
	大学	31.07		内蒙古	14.56
	硕士	4.85		宁夏	0.97
	博士	0.97		山东	6.8
				山西	5.83
自己就医	是	48.54		陕西	2.91
	否	51.46		四川	1.94
				西藏	0.97
经济状况 (月收入)	1500 元以下	3.88	初诊/复诊		
	1500 ~ 3000 元	23.3			
	3000 ~ 4500 元	52.43		初诊	51.46
	4500 ~ 6000 元	19.42		复诊	48.54
			满意度	满意	76.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91		不满意	23.3

续表

变量及赋值		比例%	变量及赋值	比例(%)	
就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同仁医院	12.62	满意度	不满意	20.39
	北京协和医院	21.36			
	北京儿童医院	4.85		信任	27.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	5.82		不信任	21.3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安贞医院	2.91		非常不信任	1.94
	中国医科大学航 空总院	0.97			

5.2 刻板印象影响下的医患信任问题

刻板印象亦称刻板效应，它是指人们用刻印在自己头脑中的关于某人或事、某一类人或事的固定印象，作为判断和评价人或事的依据的心理现象。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看成某类人或事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或事的评价视为对某个人或事的评价，而忽略个体差异。刻板效应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即对于具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某类人或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判断，不用探索信息，直接按照已形成的固定看法即可得出结论，简化认知过程，节省时间和精力，使人们能够迅速了解某人的大概情况。但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做出普遍性的结论，会忽视个体差异，导致知觉上的错误，造成先入为主，妨碍对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就刻板印象的含义与双面影响而言，我们可将其应用于医患信任问题中来解释医患信任与不信任的形成因素。刻板印象发挥其积极影响从而可以在医患关系上有促进作用，构建医患沟通的良好基础，提高医患信任程度，形成患者心中预设性信任。若刻板印象体现在医患矛盾等方面，它将扩大医患距离，不利于医患之间信任的形成，从而导致预设性不信任。

5.2.1 刻板印象导致的预设性信任

医患信任中的刻板印象指的是患者在就诊前即对医院或医生抱有积极信任的态度。我们将医患彼此未接触前的信任称为预设性信任，这样的信任来源于患者脑海中预先形成的良好印象，即便患者从未接触过某医院或某医生，但由于他人的高度评价或长期以来患者对于医生群体高资历的要求，使得患者不加以探索，简化认知过程，直接按照自己形成的固定看法对医生抱有满意的态度和预设性的信任。

1. 盲目崇拜知名度及他人推荐

人都有从众和求好的心理，尤其是面对疾病和生死的大事时往往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访谈调查数据显示，约 31.42% 的患者经亲友的推荐选择去北京的三甲医院或某知



名医生处就诊，其中大多数患者亲友的推荐理由是自己曾经去过某医院或找某位医生治过病，还有的则是自己或亲友在医院工作，了解内情，这两种情况都增加了医院和医生的可信度。患者在没有其他医疗资源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听取亲友的建议。还有 12.38% 的患者表示自己接受当地医院医生的建议直接前往北京医院就诊。在所有的访谈对象中有 26.67% 的患者明确说出“医院名气大”“权威性高”等词语，明确表示自己就是追求医院的名气和医生的名气，这些医院是经常被媒体新闻提到，或是有知名专家坐诊。这些数据都表明，来医院就医前，患者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知名度高的医院并且一定程度上知晓相关科室的专家与其坐诊时间，这可以使患者增加信心。

2. 追求医生的年龄资历

长久以来很多工作单位都强调工龄与资历，大众普遍认为工龄高资历深的人工作能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在患者眼中年龄大的医生更具有权威性，年龄大与资历深代表医学方面造诣高，掌握着话语权与患者生命的希望。在社会心理学看来这就是患者在刻板印象影响下不加思考、不加信息探索、忽略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固定看法下的盲目选择。这类患者在挑选医生时更加注重医生的年龄、学历、职称和名气，一旦医生各方面都满足以上条件，患者脑海中就会预设性地相信医生具备高超的医术，进而十分信任该医生。

访谈中，一位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患儿的母亲曾与我们这样描述：“我们也相信现在的年轻医生都是名校毕业，十分优秀，他们的态度也确实很好，但毕竟工作时间短，许多病症没有见过，即使书本上学过，见到病人也不能立刻反应过来，患者病症表现不同，年轻医生可能判断不了病情无法对症下药。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医生见多识广，多年来接触了大量病人，这会使他们更准确地诊病，我们肯定更愿意选择年纪大一点职称高一点的医生。”实际上，这位患儿母亲并未寻找年轻医生看过病，而是直接预约专家号。与这位患者家属类似，大多数被访谈对象都表示自己“肯定”更愿意选择年纪大的而非年轻医生。这是刻板印象在患者群体中造成的“年龄资历追求”现象，客观上导致患者对为自己看病的年纪大的医生有预设性的信任感。

5.2.2 刻板印象导致的预设性不信任

刻板印象的局限性在于人们习惯于在有限的条件下不假思索地做出判断，这样的判断很可能忽略个体差异，造成认知偏差，导致判断失误。同时刻板印象还容易被他人或舆论思潮引导，形成错误的刻板印象后容易做出错误判断。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患者一旦形成对医务工作者的不良刻板印象，极易造成患者的预设性不信任，影响医患和谐关系的发展。

1. 消极社会舆论埋下不信任的“种子”

媒体对医患问题的不实报道使民众心中对院方形成不良的刻板印象。大多患者心中存有“医院是老虎”的想法，在访谈的 100 多个案例中有不少人认为医院站在制高点，作为普通人不得不低头。大多数患者在第一次就诊前对医院抱有不信任甚至害怕的态度，即媒体舆论影响下刻板印象造成的预设性不信任。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而导致的“医闹”事件数量也呈递增趋势，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事件发言人，也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在构建医患关系的框架下过度放

大了“医闹”事件，并且媒体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过度凸显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立与矛盾，塑造的“新闻现实”过分渲染了院方责任，加重了社会人群对院方的不良与对立情绪，使社会人群眼中的医患关系变得更加脆弱甚至可能演变为医患危机。现代社会发展为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新闻传播的载体，通过微博、微信等多媒体渠道分享的消息井喷式传播，越是有争议的话题越能吸引人的注意，医患矛盾新闻中，站在患者一方的“站位倾向”能够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每个新闻传播者都将自己对医务工作者不良的刻板印象放大传播，以至于对院方不利的情绪反复在群众中发酵，导致群众对医院产生群体性不信任，从而形成不信任的刻板印象。媒体对医患关系的片面的不实报道使大众扩大了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的怀疑与敌对情绪，强化了对院方不满意的刻板印象，最终激化了医患矛盾，降低了医患彼此的信任。

2. 患者心目中医生职业形象倾倒（颠覆）

医生从古至今一直被赋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高尚使命，具有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医生妙手回春，备受尊重，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然而现在部分医务工作者确实存在一些违背医德的行为，具体表现在收红包、乱开药、过度医疗、收回扣等方面。一些医生的不良行为的出现令广大医生群体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患者形成医生收红包的刻板印象，导致某些患者就医前就抱有“医生不收红包不好好做事”的预设性不信任态度。以下文字案例取自访谈对话记录（A为访问者，B为受访者）。

A：您在这家医院就医多久了？

B：连看病带手术半个多月了。

A：在这期间您的治疗花销主要在哪里？

B：挂号的时候挂了稍微贵点的专家号，大夫看过以后先开了一些药，我也不懂是什么药，反正他说是缓解疼痛的和控制病情的，我们也不晓得就听医生的了（此处受访者给我们看了他的一大袋药品）。

A：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B：5天前做的，大夫让再观察几天就出院。

A：做手术时除了手术费还有其他花钱比较多的地方吗？

B：肯定有啊！

A：那您在手术前后花费的细节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B：做检查的时候挺着急，加了个塞花了几百元，想让医生好好给做手术，给了人家点“好处”，麻醉那边给了点儿，照顾的护士也给了点，现在不是不让陪床吗，咱不也是没办法嘛。

A：那您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吧，您觉得这样“使好处”有用吗？

B：怎么没用啊！现在不都这样，别人都给我不给怕医生有想法，这样总感觉这心里踏实点，钱花到了肯定是好的。

A：您看医生开了这么多药，您觉得都有用吗？还是有一些只是营养药？

B：医生开的药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反正就得用着，治病还得看医生的。

从上文与受访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患者存在主动给医务工作者送“红包”的情况，原因是患者认为“其他人都给自己不能不给”和“怕医生有想法”。如这位受访者一



样,一些受访者也表示给医生“红包”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患者会主动地悄悄给“红包”。在这些患者眼中医生要收了“红包”才会好好做事,而非遵守职业道德认真做事。“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为部分患者共识性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刻板印象造成患者的不安与怀疑,未就医便预设性不信任,就医时也存在不信任,就医后期仍抱有怀疑态度。不良的刻板印象使医患不信任问题愈发严重,激化了医患矛盾。

5.2.3 费孝通“差序格局”信任模式视角下的医患信任问题

20世纪40年代,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差序格局”为基本格局的社会,以血缘亲缘为核心,推己及人,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费孝通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其中包括“自我主义”和“特殊主义伦理”。“自我主义”即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特殊主义伦理”即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已经逐步进入“现代化”,但“差序格局”这一传统社会所存在的人际结构同样广泛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固守着“差序格局”及泛化关系所蕴含的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即对于与自己关系紧密的“自己人”的信任度极高,而对于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则普遍缺乏信任感。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信任模式同样适用于诠释医患关系,即中国人对“自己人”具有较强的信任倾向,信任关系更容易在“熟人社会”中建立。这样的人际信任模式时刻影响着患者对医院与医生的选择以及面临住院手术等情况下的一些举动,并对当今医患信任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逐步开展,医疗机构走向市场,医患间的道德关系与利益关系特征发生重要改变,医患变成流动空间的“陌生人”,“自我主义”和“特殊主义伦理”开始在医患关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的行为具有关系特点,医生与患者间的“关系信任”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社会的患者要“看医生”,尤其是了解自己得了“大病”时的最普遍和常见的反应:寻找各种身边的资源以请托到自己最需要的医生。就医时拉关系、送红包的情况表达了患者对医生医德、医术方面的不信任,患者希望通过“关系”找到好的或信得过的医生,以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与医生建立良好的“熟人关系”。

在此次对外地进京就医患者就医情况的调查中,有31.42%的外地患者选择前往亲友推荐或有熟人关系的北京医院就医,有12.38%的外地患者选择前往相熟医生推荐的医院就医。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宣布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须设立统一投诉电话,并印刷在协议书上,医患双方的协议书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

然而在我们本次的访谈调查过程中,许多患者却表示对此条例并不了解,而且为了提高自己的就医效率,方便“办事”以及检查拿药时少花些冤枉钱,愿意“托关系”给医生送“红包”以此与医生成为“熟人”,更好地就医。



笔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采访的生殖科患者向我们谈及他们选择医院的原因时提到，夫妻二人结婚一年多了，妻子一直没有怀孕，二人希望检查生殖系统是否存在问题，但对北京各大医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便咨询了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的女方亲属，该亲属表示已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科的医生比较熟悉且该医院在治疗不孕不育方面处于全国前列，可以帮他们夫妻“联系一下”，于是二人便借助这样的“熟人关系”，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医。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并不少见，外地进京就医患者的行为具有相当高的“关系取向”，有无关系通常成为影响外地患者与医生信任建立的重要因素。患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其可以延伸到的或重新搭建的关系网络，将医患双方纳入共同的关系网中，将医患由陌生人关系转变成“熟人关系”，以获得情感、信息和帮助，达到符合自己期望或满意结果的态度及行为取向。这正是“差序格局”信任模式在医患信任关系中的体现。

6 结论与反思

6.1 结论

重建医患信任是解决当今医患矛盾的关键。本次研究从社会人口学因素、刻板印象及费孝通“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等影响医患信任关系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在验证其他学者从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方面对医患信任关系做出的研究的正确性的同时，在社会心理和行为机制下重新阐释医患信任关系，并且为提高我国医患信任程度提出以下建议。

6.1.1 矫正刻板印象，重塑患者心中的医生形象

患者应当持有客观的态度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避免盲目追求知名度，也要警惕预设性不信任带来的不良心态而对医院和医生产生负面情绪和暴力行为。

6.1.2 以人为本，致力于满足患者的需求

良好的医患沟通机制可以缓解医患关系，增加医患间的信任。患者与院方产生医患关系时，医务工作者应当积极提高沟通能力和服务态度，本着诚信、尊重、耐心的原则进行医疗工作，对医护人员应进行沟通技巧的培训，提高倾听和介绍的技巧，做到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要加大医院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关爱患者，提高服务意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会对价值观念进行渗透与影响，在群众中形成积极的医疗文化氛围，创建和谐的文化价值对缓解医患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

6.1.3 建立医患间的制度信任而非“熟人关系”

完善医疗体制，强化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深化医改，完善医疗体制改革，化解医患信任危机。增加政府投入，回归医院的公益性，以充足的财政补给做保障。医院不应以经



济创收为导向，而要做到提高医生的合法收入，使医患之间不再进行“灰色交易”，真正回归制度信任。

6.1.4 发挥媒体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

媒体报道掌握着社会舆论风向，过度放大医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医患信任危机。媒体要重视坚持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医患纠纷，积极引导医患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缓解医患信任危机，树立医生的良好信誉形象。媒体还需要向群众宣传医疗知识，使群众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医疗水平和诊疗技术的局限性，提高群众的医疗素质。媒体应当发挥其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医患关系建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6.2 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本次关于外地进京就医患者与医生医患信任关系的研究基于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医漂”暑期社会实践团的调查活动，受调查者经验不足、调查时间较短、调查区域有限等内外因素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需要改进之处。

6.2.1 研究方法方面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与访谈调查法。研究地点仅限于北京市各大三级甲等医院，对于外地进京就医患者在北京一、二级基层医院的就医情况与医患信任关系缺乏了解。访谈提纲的设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于患者对医生信任程度的精确性缺乏准确了解和计算。

6.2.2 研究对象方面

本次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外地进京就医的患者，在医患信任关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就研究数据统计而言，此次调查中男女患者比例、受访者年龄分布不均，对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误差与干扰。

6.2.3 研究内容方面

对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探索、个案研究、总体状况调查和宏观层面的分析，精细实证研究不足。对于医患信任危机的解决方案不够完善，且多数限制于宏观层面，在找出更加具体的修复策略和途径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 [1] 刘扬，王晓燕．论法律在医患信任重构中的作用[J]．中国卫生法制，2015，（06）．



- [2] 龚莎. 当代中国医患信任危机的德性论审视[D]. 武汉: 湖北大学, 2013.
- [3] 石悦, 陶然, 方安安. 论医患信任机制与医事法制建设的互动关系[J]. 医学研究杂志, 2010, (02).
- [4] 王兴龙. 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1998.
- [5] 杨阳. 不同医疗体制下医患信任关系之比较: 中国与新西兰[J].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06).
- [6] 张亮. 医患信任危机问题研究[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史密斯模型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问题探究

——以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为例

2016 年首都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论文特等奖

作者：刘璐 邹璐漪 柴资贻 曾惠美

指导教师：马胜强

【摘要】十八大提出要坚持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据国家“十三五”规划，计划到 2020 年中国要实现全部脱贫，因此，作为国家扶贫工作的关键性政策，精准扶贫的进展程度和执行效果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属老、少、边、穷和库区移民重点县，是武陵山片区实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团通过运用实地观察法、访问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在巴东县 5 个镇、8 个村获得有关精准扶贫执行情况的 firsthand 资料，在总结巴东县精准扶贫特色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史密斯模型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 4 个方面，对精准扶贫执行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完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政策思路。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执行 史密斯模型

1 引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是局部与全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村扶贫开发就体现了我国对于这一部分的重视。但是，受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地区，具有基础设施落后、群众收入低、居住环境差的特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文简称恩施州）有 8 个国家级贫困县，729 个重点贫困村，92 万贫困人口。此次调研的目的地巴东县地处武陵山区，农业生产条件也不足。仅巴东县就有贫困村 118 个，贫困户 46251 户，共 147416 人。当地政府的扶贫工作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瓶颈，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11 月巡视湘西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要求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来对扶贫任务进行系统攻坚。

巴东县作为国家重点贫困县，在政策和实践层面都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是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状况的理想样本。所以，调研巴东县的精准扶贫工作对于推动国家“十三五”规划蓝图和更好地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2 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

2.1 基本概念

精准扶贫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有针对性地帮扶贫困人口，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基础工作是精准识别：“按照统一标准，通过规范的流程和方法，找出真正的贫困村、贫困户，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为扶贫开发瞄准对象提供科学依据。”精准帮扶，就是扶贫对象被识别出来以后，帮扶责任人根据其贫困原因制订帮扶计划和落实帮扶措施等。精准管理是指对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监测，建立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时反映帮扶情况，实现扶贫对象的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2.2 理论框架：史密斯模型

史密斯模型是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式，是由美国著名的政策学家史密斯于 1973 年提出的。史密斯构建了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式，并将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划分为 4 个：一是理想化的政策，指合理可行的政策执行方案；二是执行机构，指国家政府中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机构和人员；三是目标群体，即政策执行的对象，指由于执行某个具体的政策而必须改变其行为的群体；四是环境因素，指影响政策执行的经济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理想化政策是政策运行产生效果的基础，即需要满足合法、合理、可行的政策要求；执行机构是政策理解和实施的主体，对于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会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巨大影响；政策的目标群体即政策的作用对象，指因为某一政策决定而需要调整其行为的群体。

史密斯模型的 4 个主要变量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它们可能随时处于紧张和冲突的对立状态。为了有效地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政策执行的作用机理通常比较复杂，但是可以用图 1 来直观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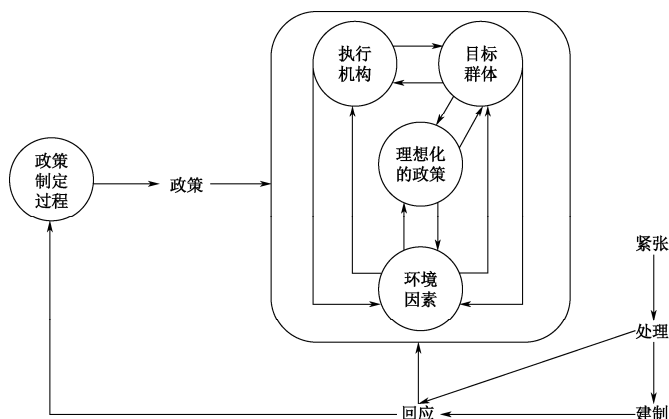


图1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共同完成模型的作用过程。其中，理想化的政策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目标群体对于理想化的政策可以采取拒绝、违反、服从或是规避的手段，这能够直观反映目标群体对于理想化的政策的态度。目标群体与政策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目标群体受政策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目标群体的实际行动又是构成政策环境的重要部分。

模型中的这4个变量维持着一种相互牵制的模式，体现为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是从史密斯模型4个要素内部关系的角度分析的。

3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特色经验——基于巴东县的考察

精准识别于精准扶贫相当于建房子的第一步地基，地基扎实，精准扶贫顶层建筑才会牢固。经过调研，巴东县精准识别覆盖面广泛、执行系统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打牢了精准扶贫的地基。此外，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

3.1 精准识别

3.1.1 精准识别覆盖面广泛

巴东县通过创新机制，将每一户老百姓纳入识别范畴，全县491个村都根据组别让村民就近召开屋场院子会，每户最低有一人到场并签字开会，确保每户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确保了精准识别实现基本全覆盖。

如表1所示，根据我们对87户农户的访谈数据统计，72.4%的农户都听说过精准扶贫，72.4%的农户参加过院子会议，60.9%的农户参与过投票。由于精准识别是2015年进行的工作，我们调查的村子又较为偏远，这样的群众反馈说明精准识别的工作基本落实到位了。

表 1 农户精准识别参与程度的数据统计

变 量		频 率	百 分 比 /%
是否听过精准扶贫	否	23	26.4
	是	63	72.4
是否参加过院子会议	否	23	26.4
	是	63	72.4
是否投票表决贫困户	否	33	37.9
	是	53	60.9

3.1.2 精准识别执行系统化

巴东县为精准识别执行拟定了科学的机制,保证了执行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两机制、一措施”锁定“靶心”:一是精准扶贫责任管理机制;二是工作台账机制。屋场院子会议则是实现这两个机制的路径,屋场院子会议采用“八步走”战略,“选主持、定地点、明对象、讲政策、听意见、贴公示、核信息、留痕迹”指导全县精准扶贫“不落一人,不错一人”。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回头看”活动,让村民自己能“对号入座”。采用大数据思维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将每一村每一组的院子会议进行备案,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5870 户 14752 人,这为“点对点”式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信息保障。

精准识别的高覆盖率、执行的系统性,为精准识别的良好效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治国理政新实践·脱贫军令状”栏目播放了《建档立卡“回头看”确保扶真贫》的系列报道,向全国人民推介了巴东脱贫攻坚战的新成绩——屋场院子会议,这为精准识别聚集了强大的窗口效应。这让巴东县精准识别“屋场院子会议”的做法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扶贫工作的注意,并赢得了广泛的肯定。

3.2 精准帮扶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在保障农民各项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向农村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化的种养业。精准帮扶作为直观体验这一精神的帮扶方式,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巴东县的精准帮扶主要体现在“五个一批”,即生产发展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发展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而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切实根据各乡镇、各村户实际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进行产业规划,大力发展柑橘、茶叶等多种有效经营。对有发展能力、讲诚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提供“10 万元以内,3 年期限,无担保,免抵押,全额息”的信用贷款,培养了脱贫发展的中坚力量。



刘家荒村刘家荒片的李能菊说：“烟草地我们村有两处，都是由岳书记负责的。岳书记发放烟草苗、肥料、前期教授种植经验，去年我们家种了3亩地烟草，一颗烟草的收购价格为1.5元，去年烟草收入约有四五千元。”

3.3 精准管理

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障，巴东县在精准管理上的优秀经验主要体现在阳光化的操作管理上，这为政策的执行拉上了安全阀。

巴东县出台了全面细致的考评问责体系。一是各种精准扶贫考核办法，使得精准扶贫考核权重占比达到70%；二是县纪委出台《巴东县精准扶贫、“六城”同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问责暂行办法》，明确了精准扶贫工作中被问责的6种情形和10种问责方式；三是6个督查工作专班，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紧密配合抓”的督察模式，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督察和通报保证了管理的公开透明，使得精准管理真正做到了公正民主，彻底落实。

县扶贫办的杨局长说：“巴东县脱贫工作的监察是镇内部自行验收；上报州政府，申请验收；上报省政府，抽样调查并借助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保证检验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4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的障碍性因素探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应用

巴东县的精准扶贫效果显著，但是我们统计的农户主观评价的数据显示（表2），只有42.5%的农户表示精准扶贫后生活水平有改善，高达55%的农户表示生活水平改善有限，这表示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性因素。本章运用史密斯模型进行分析，从精准扶贫的理想化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环境4个角度对精准扶贫执行问题的障碍性因素进行探析。

表2 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评价

状 况	分 类	生活变化不多	生 活 变 好	生 活 变 差
非贫困户	非贫困	10	1	0
贫困户	劳动力不足	4	6	0
	因学致贫	8	7	1
	因病致贫	19	15	0
	因残致贫	3	5	1
合 计		44	34	2
百分比		55.00%	42.50%	2.50%



4.1 精准扶贫政策引发的执行障碍

4.1.1 易地搬迁的拆除旧房政策不合理

巴东县依法实施农村农户一户一处宅基地制度，要求农户在搬迁后拆除旧屋，拆除过后土地进行统一复垦。针对这一政策，有村干部表示执行遇到很大阻碍，也有很多农户反映这一政策有不合理之处。一方面，多数农户只能继续从事劳动生产维持生计，而原有耕地与搬迁地距离较远，旧屋可作为放置农具、避雨的重要空间，拆除旧屋对搬迁户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另一方面，部分对老屋有情感的农户难以接受集体搬迁的政策。

将军岭的胡忠兴说：“村里共 31 户人家，关于易地搬迁政策正在讨论中，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 3 次讨论会，政策和现实有冲突，一旦搬离原住地，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很多，可能只有‘低能傻’才没有太多顾忌。”

除此之外，从政府的角度看，统一复垦旧物所在的土地也缺乏可执行性。易地搬迁主要针对地处偏远且分布位置比较分散的农户，贫困户的房舍有很多还是土坯房，统一复垦花费的时间、精力比较大，成本过高。

4.1.2 精准扶贫政策的标准缺少弹性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涉及多套标准，部分政策标准过于刚性，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第一，精准识别的标准缺乏弹性，多种实际情况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外。一是用人均年收入高于 3072 元的贫困线划分农户，一些子女在外打工但未能受子女供养的空巢老人被“人均收入”限制，二是扶贫“五不扶”中的几个要求太一概而论，瞄准的既定目标有时会发生偏差。第二，精准帮扶的部分项目的准入门槛比较高，使减贫项目的受益者更多变成了能够承受入门要求的非贫困户，这个问题在养殖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面体现得比较突出。第三，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估标准过硬，巴东县精准扶贫虽然采用建档立卡的大数据对扶贫效果进行评估，但扶贫工作的绩效评估多以贫困户收入的单一数据来评估扶贫工作。

绿葱坡镇香家垭村的牛东波说：“自己患病，劳动能力较差。子女外出打工但收入较少且开销较大；家里的一辆破旧旧卡车是没有选上贫困户的原因。”

溪丘湾乡榔树槽 4 组胡正江说：“说是养殖业的脱贫，家里 18 只羊，没达到 20 只羊的标准线，我们家申请种羊也没有拿到，更不用说小额贷款了，根本借不到钱。”

4.2 精准扶贫执行机构引发的执行障碍

4.2.1 扶贫执行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

巴东县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分别由 5 个主要部门负责，具体的扶贫措施是平行进行的，但是此分工的灰色地带使部门出现权责推诿的现象。例如，对于“易地搬迁后农户是否还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这类问题，发改局和农业局未能达成一致，由此可见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障碍性因素。

巴东县扶贫办的李主任说：“易地搬迁后的这些人是否还算是贫困户，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国家已经花了 20 万元帮你把家搬好了，难道不算脱贫了吗？如果他真正出现了返贫现象，国家还是要关注的。”

4.2.2 扶贫干部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扶贫效果

全县动员 544 名常驻工作队员，对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覆盖全县上下。帮扶干部在了解贫困户的情况后确定具体扶贫措施并负责督查，村干部负责具体的实施。51.73%的贫困户表示只见到帮扶干部 1 或 2 次（图 2），他们没能起到实际的帮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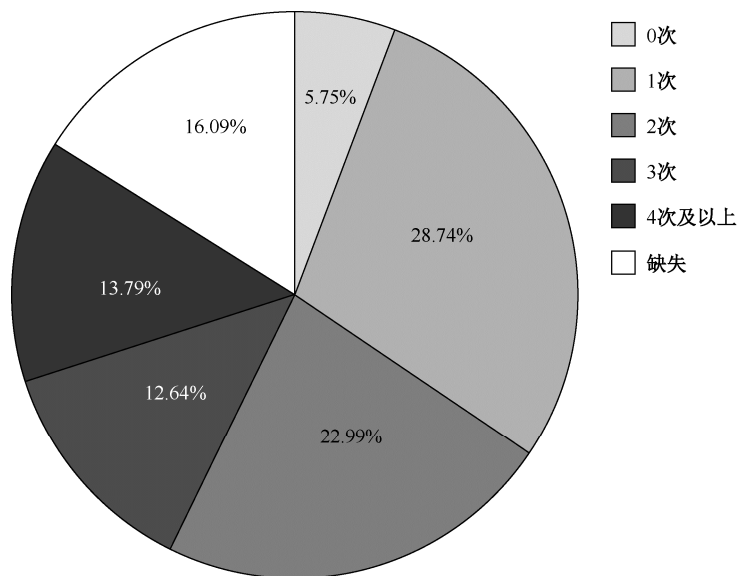


图 2 结对帮扶干部上访次数统计

溪丘湾乡榔树槽的胡正江说：“村里没给什么措施，就一开始送来两桶油，还拍了照，后来给了茶树苗。根本没什么用啊，都是搞形式，茶树苗我们平时也种，就自家喝茶用，卖不了多少钱。”

除了工作未落实的情况外，还有少部分村干部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牟利的。精准扶贫涉及扶贫的资金和产业项目的扶持，对农户而言利益相关程度较大。而在贫困户评选、产业帮扶项目的选择、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上村干部的权力大，容易出现腐败现象，而真正的贫困户自身的资源缺乏，能反馈问题的途径少。精准扶贫的落实很大程度上与扶贫干部的个人品质和工作风格高度相关，仍需要加强监督的力度，力求落实扶贫政策。

4.3 精准扶贫目标群体引发的执行障碍

精准扶贫的目标群体受其主观因素的限制，对精准扶贫产生了滞障性因素。

首先是贫困户对政策的理解不足的问题：巴东县有重点贫困村 118 个，非重点贫困村 204 个，贫困户的政治参与度不高，缺少提升自身发展动力的意识。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



难以对精准扶贫有较为系统和完备的理解，精准扶贫政策推动的阻力大。

其次，农村劳动力不足难以落实产业扶贫项目。81.25%的受访户表示家中有人外出打工，家中只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情况很多，难以配合产业扶贫的政策。农村劳动力流失和巴东县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巴东县的产业发展以农业为主，就业收入微薄，从事农业劳动周期长，在短时间内收入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又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本地消化劳动力能力较差，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4.4 精准扶贫政策环境引发的执行障碍

巴东县政策大环境受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限制，使得部分政策不能完全与扶贫的需求相匹配。这种集体性贫困的问题未能得到高度重视，因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香家垭村的薛书记说：“政府给了 100 万元的资金，只有 20%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卫生室建设和党员活动室建设。在精准扶贫以前有一段时间的扶贫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通水，村委会门前这条路就是当时修的，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修路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组长出来说，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就把修理申请上去，但是不可能每年都能去修路。”

据调查，大量村庄的基础设施还停留在崎岖山路或是碎石子路的阶段，只有部分村庄建设了水泥路。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建设落后，使得相继的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如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等设施不完善，农户生产和日常出行受阻，降低了精准扶贫的效率。基础设施的陈旧落后对政策的执行是一个较大的障碍性因素。

5 史密斯模型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执行效果改进的建议

针对此次考察中发现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和隐患，本文应用史密斯模型，从 4 个要素的角度分别提出建议：提升政策质量、优化部门协同体系、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和改善精准扶贫执行的外部环境。

5.1 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质量

公共政策质量的高低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而政策质量的提升首先取决于元政策质量的提升。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强调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但在执行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和太强硬性的标准。面对复杂性、动态性、多元性的贫困问题，扶贫政策必须要有一定的弹性。易地搬迁拆迁旧房要考虑到贫困户搬迁后要回原来田地耕种的现实情况；贫困户的识别、帮扶的准入标准必须以实际贫困情况为标准。需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政策执行的立足点，切实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除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以外还需要对政策和执行进行科学评估，科学的政策评估是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精准管理中就主要涉及对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评估，但是多限于根据贫困户的收入改善情况，以一个刻板的数据来表示扶贫工作的进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绩效评估的政策：一是完善建档立卡的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科技手段，实时检测政策的落实情况；二是加入贫困户主观感受这一指标，对收入增加情况、生活条件改善情况、农户满意程度等多维因素进行不同的赋值，在最后的评估过程中进行加权。另外，还可以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专业、公正客观的绩效评估。

5.2 优化精准扶贫部门协同体系与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当一个系统成为有机整体时，整体功能才大于部分之和。“五个一批”对应5个部门协调推进能有效促进扶贫的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信息沟通不畅、责任推诿的现象。尤其在目标时间将近、扶贫工作难度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把扶贫工作当任务完成的思想。作为协调、统一扶贫工作的县扶贫办，应及时地就具体问题细致落实各部门的职责分配，加强监管和注重基层情况反馈。

主体的专业素质对政策执行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巴东县扶贫队伍建设很完善，对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但大部分帮扶干部没有做到及时跟进扶贫工作，少数出现利用职权为亲友牟利的行为。干部应加强政治学习、作风建设，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落实工作。

5.3 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

政策的落实需要目标群体的理解和配合，这也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一大难点。加强政策的宣传，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第一个是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加快互联网全覆盖、通无线广播、通光纤的工作进程。第二个是宣传内容的通俗化和精准化。精准扶贫政策囊括了医疗、教育、生产、住房等多个方面，包括很多细则，想让贫困群众理解政策，政策宣传需要通俗易懂、简洁明确。在政策宣传过程中，还需要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政策实施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要看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互动作用关系而定”，精准扶贫的政策是具有创新性的，相对经验较为空缺，目标群体的反馈显得尤为重要，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标群体对于政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决定了政策推行的深度，而基础教育更是主观决定了目标群体对政策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基础教育，重点要切实加强农村青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远程继续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和政策理解能力，才不会让目标群体对于政策执行陷入“莫比乌斯”怪圈，从而更好地解决了目标群体对于政策执行的持续性消极抵触。



5.4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在“政府-市场”双导向扶贫开发的今天，政府仍然是扶贫开发的责任主体，在基础设施修建、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扶贫阶段，虽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来，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仍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仍是牵制部分地区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饮用水等方面的建设，而交通作为联结纽带，是运送人流、物流的重要通道，对村民的生活、生产、村落的城镇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加强交通的建设，实现建制村通沥青路，推进村庄内道路硬化，仍是基础设施中的重点工作。

6 结论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运用史密斯模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执行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不足，如易地搬迁拆旧房不合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标准缺少弹性的问题；执行主体中存在行政部门职责不清、部分村干部偏私的问题；作为目标群体的贫困户存在结构性贫困、劳动力缺乏等问题；政策环境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针对这些障碍性因素，本文基于史密斯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包括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质量、优化精准扶贫部门协同体系、强化对贫困群众的政策宣传与教育、改善精准扶贫执行的外部环境，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本文的未来研究方向是继续研究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执行情况，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为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和理论思路。

参考文献

- [1] 宁骚. 公共政策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2] 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 [3] Pressman L, Widavsky B. Implementation[M].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4] Lerner D, Lasswell HD. The Policy Science, 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5] 向德平, 黄承伟. 减贫与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6] 邓维杰.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 农村经济, 2014 (06).



- [7] 孙璐. 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研究——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 [8] 葛志军, 邢成举. 精准扶贫: 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 反贫困研究, 2015.
- [9] 丁建军, 赵奇钊. 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与减贫对策——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 (2).
- [10] 张伟宾, 汪三贵.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2).
- [11] 马晓河, 刘振中. “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07).
- [12] 曹洪民. 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03.



基于高校公益社团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研究

——以北京部分高校为例

2013 年首都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论文特等奖

作者：陈杰敏 邹歌 刘硕 张一豆 吴香颖

指导教师：鲁春霞

【摘要】高校公益社团是社会公益活动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面临认知模糊、形式单一、影响力小、缺乏支持等困境，其作用发挥受到限制，亟需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笔者选取北京高校大学生、公益社团组织者、基金会工作人员等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结合自身参与公益实践的经验，提出了创建资源共享平台、参与公益项目资助计划、拓展与专业公益组织的合作、参加公益创业大赛等新思路，并且构建了高校团委、社会组织、公益社团协作发展的运行模式。

【关键词】高校社团 公益实践 长效机制

1 研究背景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05 年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表明，当前我国高校中有 59.7% 的大学生参与了校内社团，平均每人参与的社团数为 1.8 个。在各种类别的社团中，高校公益社团蓬勃涌现，如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社团等。它们一般由大学生自发组成，按照章程自主展开活动，以自己的热情、专业或一技之长来开展公益实践，服务社会，其活动主要涵盖法律咨询、支教助学、普法宣传、环境保护等领域。

饱含公益热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是高校公益社团的主力军，一方面，他们在公益活动中获得教育自我、增长才干的机会，同时还能为服务对象提供实际帮助，从而使得参加公益社团、参与公益活动成为校园中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他们对公益事业的认识水平、参与程度和组织能力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和反映。

公益活动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把思政课的教学融入到社团的公益实践中，能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引导大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正确把握，推动树立崇高的理想。

然而在大学生参与公益社团实践的过程中，因缺乏支持和引导的长效机制，导致一些本可以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公益项目没有得到深度挖掘，在资金不足、活动形式单一、社会



影响力小、缺乏与国内公益组织联络沟通机会等因素的制约下，高校公益社团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了限制。因此，立足高校公益社团探索公益实践的长效机制，有助于解决大学生公益活动周期短、影响小等困境，激发大学生参与公益服务的热情，带动更多大学生参与其中，对促进高校公益理念的传播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地区高校众多，社会资源丰富，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笔者成员均亲自组建或参与了公益实践社团，一直关注公益活动的发展，对公益活动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调研中，我们选取了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这 6 所具有代表性的北京高校开展问卷调查，向以上高校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问卷 558 份，回收率为 93%，其中有效问卷 552 份，有效率为 98.9%。同时，笔者还对 5 位高校公益社团组织者、3 位基金会项目官员、3 位相关媒体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对 15 家基金会进行了电话访谈。并辅之以文献研究、实地观察等方法，希望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参与公益实践的经验，对北京高校公益社团开展公益实践的长效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和分析。

2 影响高校公益实践长效发展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大学生在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中积极阳光的形象，以及在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担当责任的勇气，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参与公益事业的大学生人数及高校内部公益社团组织的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公益理念在高校大学生中慢慢传递开来，然而大学生的公益活动面临着各种困境，束缚了高校公益实践良性发展的脚步。根据调查过程中的访谈结果及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大学生公益实践面临的困境及相应的原因概括如下。

2.1 大学生对公益实践缺乏清晰认知和坚定信念

受调查对象参与公益活动的动机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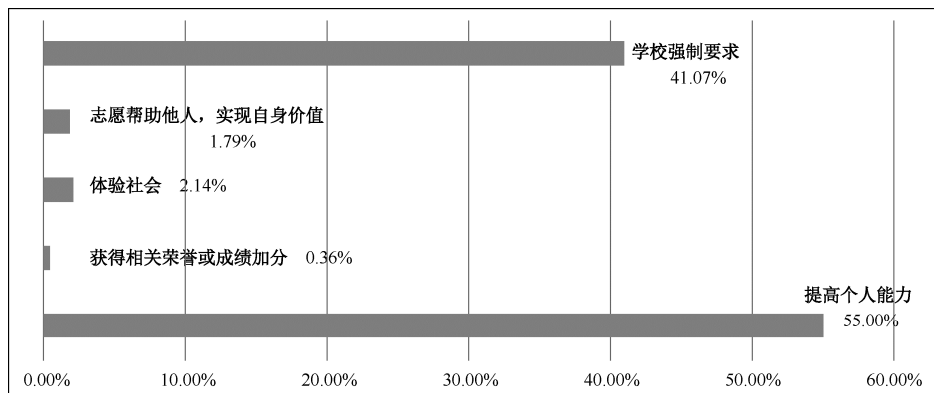


图 1 受调查对象参与公益活动的动机

在学者韩文雅、刘振中对大学生公益活动困境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大学生开展公益活动时认识浅显、信念不足的自身特点。对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的动机进行了调查，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投身公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仍有 41.07% 的受访者是在学校的强制要求下才参与公益活动的，他们对公益的认识是在学校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只是服从学校安排参加一定量的社会实践服务任务，属被动的、非自愿的，动力与活力明显不足，对实践的目的和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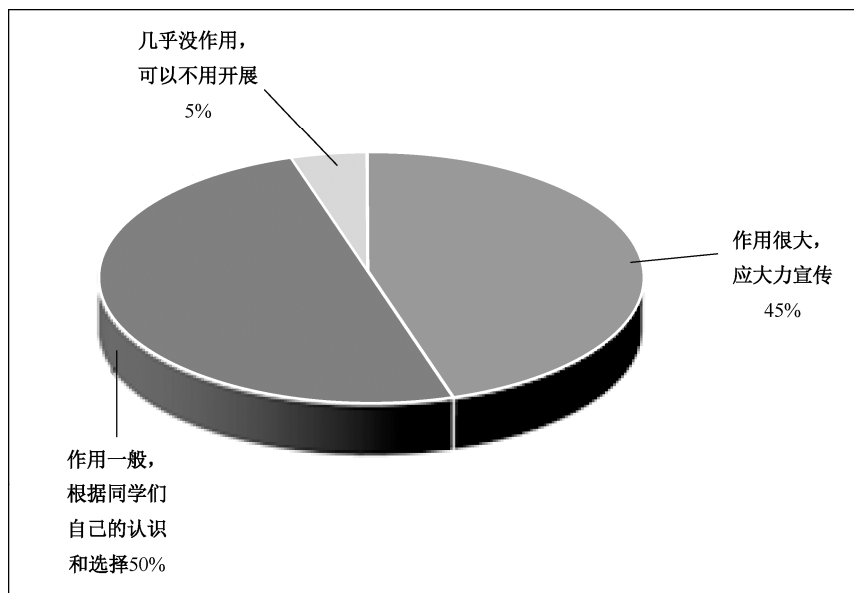


图2 受调查者对公益实践意义的认识

此外，在对如何认识公益活动意义的调查中（图2），50%的受访者对此认识消极，认为公益活动可有可无，甚至觉得没必要开展。这反映出部分大学生对公益活动缺乏清晰认知，认为开展公益实践只是学校的要求，很多人对公益活动没有兴趣，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做公益活动。

2.2 公益实践活动与课余时间相冲突

阻碍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因素如图3所示。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学生愿意参与公益活动，但由于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 7.49% 的受访者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仍是学习，他们参与公益实践的时间只能在课余及寒暑假，而寒暑假时期大部分学生需要返乡，而课余时间在不同年级之间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大一学生的课余时间较为充足，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供利用的时间相应减少。时间上的受限制性决定了大学生从事公益服务时间的短期性，并进一步影响到公益实践的社会效应。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在大学一年级积极参与公益社团及实践活动的学生，在高年级时逐渐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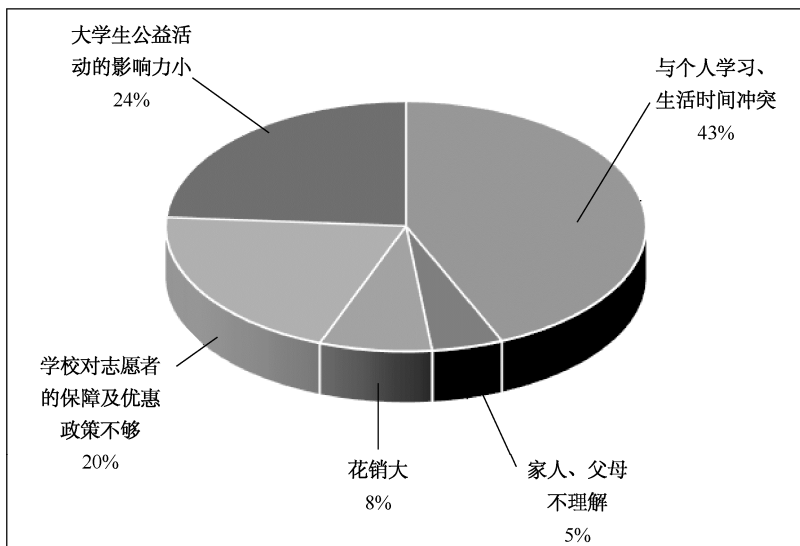


图3 阻碍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因素

2.3 实践活动趋于形式化

在刘丽杰、邓迎迎等学者的研究中提到目前高校所涉及的公益活动过于形式化，缺乏实际意义。从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公益实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形式单一和活动趋于形式化成为最主要的原因。目前大学生公益性团队的主要服务项目为支帮助学、扶老助残、社会建设、环保宣传及大型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形式也集中在帮扶、支教、宣讲及志愿活动等。其中，临时性、一次性的志愿者占了很大比例，形式较为单一，缺少创新的活动形式。

2.4 实践效果不显著，难以满足被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

大学生公益实践的主要困境如图4所示。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大学生往往只凭着一腔热情和自身的感悟与了解做实践，没有深入调查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导致事倍功半，不能达成预期目标。以支教为例，大学生自身缺乏授课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前往山区学校短期支教并不能有效改善当地的教学状况，反而可能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从对西安南北沟小学辛校长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需要能够长期支教、稳定的志愿者教师，以及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图书等，而大学生很难为其提供这些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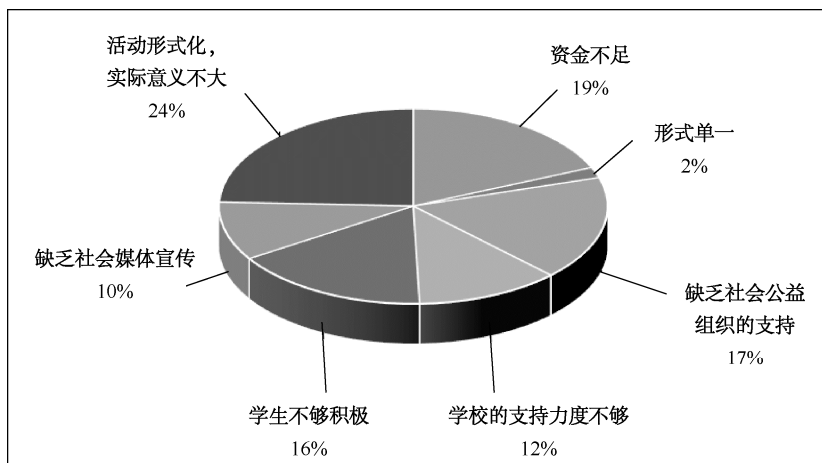


图4 大学生公益实践的主要困境

2.5 大学生对社会组织缺乏了解

公益活动的发展虽然离不开高校指导，但是也需要社会公益组织和公司企业的支持。然而，由于大学生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对社会支持体系缺乏全面了解，往往只从团队、学校层面寻求支持，而忽视了范围更广、操作更为专业的社会机构的支持，对具体的联系方式和规则更是缺乏清晰的认识，导致公益活动不能高效、有序开展。

以基金会支持为例。大学生对基金会的了解往往来自于媒体，没有系统的认知，媒体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使大学生对社会组织甚至外界产生不信任的感觉。通过调查发现（图5），只有43.42%的大学生认为基金会是扶贫济困的公益组织，而26.31%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些组织没有印象，30.27%的受访者对基金会持不信任、怀疑等态度，这反映出大学生公益社团与这些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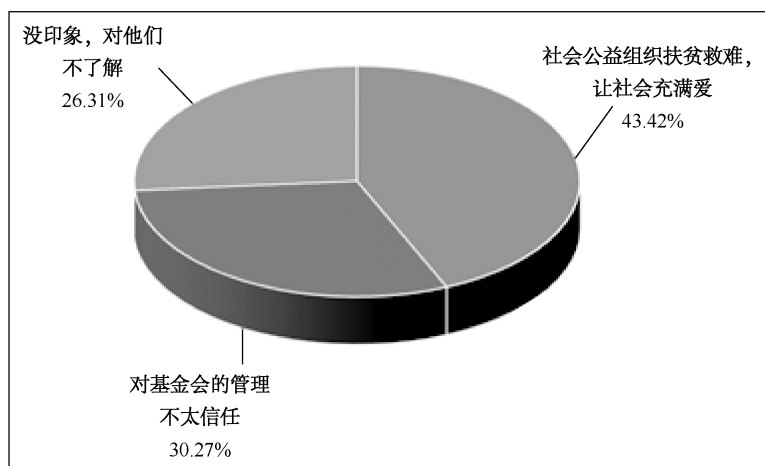


图5 大学生对基金会的认识



2.6 社会多方主体协同不足

韩文雅对社会多方主体协同开展大学生公益展开了讨论，认为社会土壤缺失造成学生公益性活动与社会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协调都存在一定难度。

社会各界对学生公益性社团和高校公益活动不甚了解，即使有一定的认知也大都是片面的。例如，一些被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认为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就是走形式，博取一个“热心公益”的名声，或者只是为应付学校任务来盖一个章。在对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负责人的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该基金会很少有与大学生合作的公益项目。社会组织对高校公益活动的关注力度与支持力度有限，导致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能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从而影响实践项目的顺利进行。

此外，高校中现行的公益团队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公益项目与社会的接轨。例如，当公益实践团队需要寻求公司或企业的资金捐赠或大量实物捐赠时，为保证资金和物品的合法使用，往往需要提供信誉保障，而公益团队自身无法出具有效票据，承担公益团队管理职能的高校团委同样不能出具相关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公益团队只能寻求社会组织如基金会的帮助，而绝大部分基金会也不愿意为活动影响力小的短期大学生团队提供授权支持。北京科技大学山区小学图书支教帮扶实践团为寻求基金会帮助，通过电话、邮件、走访的形式联系了 15 家基金会，最终只有人口福利基金会予以回应并提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公益团队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困难。

3 推动高校公益实践长效发展的新思路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的公益社团实践困境，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对社会现有公益发展新思路进行如下总结。

3.1 创建高校公益资源共享平台

通过高校资源共享平台能更多地接触到大学生公益活动资源，提高公益活动的质量，扩大组织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大学生公益论坛（CUPF）通过高校志愿者和社团领袖能力培训、构建发布活动动态及志愿者需求网络平台、组办不同类别公益社团交流活动、联合相关公益机构为高校学生公益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服务等方式，影响带动了部分地区公益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3.2 参与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资助计划

参与公益组织优秀公益项目资助计划能很好地帮助大学生公益团队突破资金瓶颈，通过选拔和资助，培育公益专业人才，对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中坚分子形成影响，激



发他们关注公益，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创新，从而促进公益理念的更新和传播。例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于 2007 年启动大学生环保公益活动小额资助项目，资助参与环保活动的全国高校大学生社团，为其提供 3000 ~ 10000 元不等的资助资金，培育他们参与环保、参与社会事务的使命感。6 年来，小额资助项目资助了 347 个有社会影响力、推动社会发展的环保公益项目，覆盖了 31 个省（区、市）的 197 所高校，直接参与的大学生人数达 40000 人。

3.3 拓展与专业公益组织的合作

加强高校公益社团与国内专业公益组织的合作，不仅可以获得专业的指导，还可解决经费不足、活动形式单一的困扰。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公益组织正在向着普通本科院校发展，包括 Enactus（原 SIFE 团队）、JA 团队、AIESEC 团队等，这些公益组织拥有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培训模式。

以 Enactus 为例，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团，目前在北京共有 22 所合作高校，这些合作高校在 Enactus 的支持下涌现出许多优秀公益案例。北京林业大学 Enactus 团队的“光影人生”项目，致力于帮助北京现存唯一的皮影戏班——路家班，通过对路家班做出合理的品牌定位、积极联系政府和 NGO 获得支持、为路家班联系演出机会等一系列活动，提高了路家班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拓展了皮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 Enactus 团队的“阿拉善之光”项目旨在帮助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牧民改进挖掘肉苁蓉的方法，从而转变牧民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阿拉善环保事业的发展，并与高科技生物公司合作，帮助牧民创立一种全新的致富模式。他们曾先后 3 次奔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地区，与当地牧民和永业集团达成合作关系，教授了牧民挖掘肉苁蓉的方法并进行了相关金融知识的培训。最终使得这种可复制性很强的经营模式在阿拉善地区迅速传播，引得牧民竞相效仿。

3.4 参加公益实践创意大赛

公益创意大赛的平台成为高校公益团队砥砺的舞台。近年来，零点集团、联想集团等公司、企业先后支持中国大学生参加公益创意大赛或创业大赛，以此汇聚大学生的公益创意，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公益事业和梦想。友成基金会和南风窗合作的“调研中国”项目、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和《中国周刊》杂志社主办的实践项目、中国农业银行与《第一财经日报》发起的“角落阳光——大学生星火暖中华公益”项目、腾讯微爱校园行动等，都带动了一大批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通过比赛，大学生践行公益理念，在理论与实践的平台提升自己，同时也解决了大学生公益活动筹款困难、宣传范围窄、缺乏公益组织支持等难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权利和资质，让他们经历从设计项目到独立募集资金，以及实施公益活动的整个流程，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实训。



4 推进高校公益实践长效发展的运行模式

高校公益社团要想形成社会公益实践的长效机制，不仅仅需要通过资源共享、项目资助、创意比赛等措施来增强社团自身的能力建设，还需要积极探索以高校公益社团为中心，多主体协作发展的运行模式，以形成公益实践的合力，从而保障其可持续地长效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公益社团的探索和实践为构建长效发展的运行模式打下了基础。2012年，该校“山区小学图书支教帮扶”实践团获得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短期授权，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为8名贫困学生提供总计达4万余元的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金。2013年，在“山区小学图书支教帮扶”实践团的指导和帮助下，“富农兴昌”实践团也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开展合作并获得短期授权，把从爱心企业募得的公益资金转入基金会账户，由基金会管理资金并交付给昌平区果农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把滞销水果运送至公益服务对象太阳村。实践后期，“富农兴昌”实践团还把实践项目转化为北京科技大学 Enactus 社团长期开展的公益活动项目。

在两年的实践探索中，基本形成了高校团委、社会组织、公益社团协作发展的运行模式（图6）。团委的积极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的有力支持和社会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有助于高校公益社团深入持续地发展公益实践，能强化公益社团活动的成果，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在其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推广意义，现从以下3个方面具体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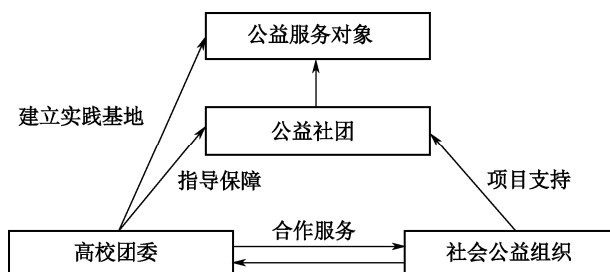


图6 高校团委、社会公益组织、公益社团协作发展的运行模式

4.1 高校团委搭建保障指导平台

高校团委作为学生公益实践活动的指导机构，基于其社会实践部、社团部、志愿者工作部等部门工作，充分发挥其协调、组织功能，为学生公益实践活动安排指导教师，在实践课题选择、实践方法、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指导。

第一，要加强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成立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年级学生组成的“学长指导团”，为低年级学生传授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在联系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公益服务对象等环节提供有力支持和帮助。校团委同时要加强对督促检查，紧密关注活动或项目的进程，及时解决大学生公益团队开展活动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努力完成预期目标。

第二，通过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实践氛围。高校应在现有文化环境营造的基础上，加



强公益实践活动的宣传，使大学生们始终处于一个浓郁的公益实践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逐渐形成公益活动所具备的基本技能。

第三，推进品牌公益实践项目长期开展。学校可以同公益组织或者企业联合，固定一些品牌公益项目，由学校组织高校学生参与实践，公益组织或企业提供实践地、实践项目等的支持。同时，在完成合作项目后，学生可及时向学校反映活动的完成情况，学校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表彰评比，鼓励表现优秀的同学或团队继续投身公益事业。

4.2 社会公益组织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积极寻求被服务对象的支持。开展社会实践前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实践项目做出修整，为服务对象提供最大化的帮助与支持。

第二，积极寻求基金会等社会专业公益组织的支持。基金会可为大学生公益团队短期授权支持，管理大学生实践过程中所获的捐赠物资，保证物资流通的合法化、制度化。在授权期内，公益社团可代表基金会向公司、企业等寻求资金方面的支持，所募集的资金交由基金会管理。基金会也可把大学生的公益项目纳入到基金会常规项目中协同开展。

大学生公益团队获得短期授权后，通过基金会能为捐赠物资的企业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及发票，企业对捐赠的物资使用也更加信任。通过短期授权途径能提高与企业合作的成功率，扩大实践成果及社会影响力。

第三，积极寻求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支持。企业在社会公益活动中不可或缺，没有企业强有力的支持，社会公益活动将无从谈起。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知识优势，与企业建立友好的、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帮助企业发展的同时，与之建立良好的社会实践关系。

4.3 公益社团主导的项目管理与实施

公益社团作为长期开展活动的学生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及活动经验。不同的公益社团往往具有不同的着眼点，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实践工作在向学生社团延伸的同时，应注重社团的特色，将社会实践作为社团活动形式上的拓展，融入社团的运行和发展之中，引导社团从自身宗旨出发选择实践主题，并鼓励成员依托社团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实践助成长。

社会实践中公益团队的实践成果可深入挖掘，逐步转化成社团的长期项目，实践成果的提炼对公益社团的进一步发展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浙江大学的学生社团为例，作为2009年“全国大学生新农村建设十佳团队”的三农协会，利用自身优势，专注“三农问题”，在短短6年之内，组织了12000多人次走访了10多个省30多个县，通过实践调研的形式服务“三农”。以实践的形式使公益社会团队更多地接触社会力量，也势必对学生社团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5 结语

社会应当重视青年公益精神的培养，积极接纳、支持、鼓励大学生参与公益，弘扬公益文化，锤炼公益品格，投身公益实践，为公益实践创造机会。通过创建资源共享平台、参与公益项目资助计划、拓展与专业公益组织的合作、参加公益创业大赛等措施能够增强高校公益社团的能力建设，而高校团委、社会公益组织、公益社团协作发展的运行模式能深度挖掘大学生公益实践成果，促进大学生公益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韩文雅，章兴鸣. 参与视角下大学生社会公益困境的分析与破解[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4).
- [2] 刘振中，罗成翼. 略论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德育价值及路径[J]. 当代教育论坛，2011，(11).
- [3] 刘丽杰，王扬丹，李帅，等. 从“大山天使计划”团队、“爱华”支教团队到成都高校公益——对当代中国大学生公益心和公益行为的探索[J]. 青春岁月，2012，(21).
- [4] 邓迎迎，刘江宁. 公益性学生社团的发展路径探析[J]. 山东省团校学报青少年研究，2012，(1).
- [5] 韩文雅. 无锡高校公益行动状况调查研究[J]. 调查与研究，2010，(7).
- [6] 陈昭华.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新模式探讨[J].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2，(1).
- [7] 程虹娟，张春和，龚永辉. 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1）.
- [8] 阮俊华. 知行合一·实践报国——大学生从社会实践走向成功[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9] 邹军娥，汪雅芸. 大学生是社会公益活动的主体力量[J]. 校园之声，2011，(3).
- [10] 龙永红. 高校公益学生组织的运行机制——基于四个个案的质性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12，10（4）.
- [11] 王继勇. 建立高校第三方微公益平台的初步分析[J]. 教育教学，2012，(5).
- [12] 余传涨. 探寻贫困山区教育现状及支教有效途径——以丽水月山村支教为例[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13).
- [13] 黄文彬，李琪，倪炜. 以公益社团为载体的高校“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探索[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1).



失独者如何老有所依？

——以北京模式为例

首都思政课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一等奖

作者：陈新宇 段文琦 吴翔宇

指导教师：刘向英 王爱红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群体——失独群体。目前，我国对失独老人的社会养老机制不完善，相关政策存在缺陷且未落到实处，为了更好地保障失独老人的权益，实现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本实践团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法在北京展开了实地调查。在依托大量真实数据和案例的基础上，对北京市失独老人的养老现状和有关政策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失独老人 养老保障 制度建设

1 引言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规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 1975~2010 年间大约出现了 2.18 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独生子女由于疾病、车祸、自杀和自然灾害等意外事故而不幸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瞬间就转化为“悲苦家庭”“破缺家庭”和真正意义上的“空巢家庭”。据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10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的人口疾病死亡率（还不包括意外事故死亡）推算，15~30 岁年龄段的死亡人数至少为 40 人/10 万人。由此推算中国的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以每年大约 7.6 万的速度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达到千万。作为响应国家政策，为计划生育做出了贡献的一代人，作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信念支撑的一代人，在遭受了老年丧子这一人生的大不幸后，国家能否兑现他的承诺，给这些老人一个相对无忧的晚年，不仅是对一个国家责任和文明的考量，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越来越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例如,马一研究了如何系统构建失独家庭救济机制,方曙光着重关注失独老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张必春、刘敏华研究了独生子女意外去世对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魏凌波对城镇地区失独老人的精神心理状况进行了研究等。本文则着重关注失独群体的养老问题,由于目前全国在失独群体养老保障的试验不统一,且地区差异性较大,我们力图通过分析北京市的案例,为全国范围内相关政策的改进和完善起到参考作用。

本次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失独群体的生活现状及养老保障需求。共计调查了 108 位失独老人,其中城镇地区 100 位,农村地区 8 位;女士 75 位,男士 33 位,以女性为主。由于本次问卷以网上发放为主,受到使用网络技能等因素的影响,调查对象多集中在 50~69 岁这一年龄段,且 50~59 岁的人群占到了一半以上。

3 北京市“失独家庭”的基本情况及社会保障状况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5 月,北京失独人数为 7746 人,其中城市 6477 人,农村 1269 人。2013 年为 8781 人,2014 年为 9881 人,其中还不包括未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失独老人。保守估计 2015 年北京市失独人数已达万人,在北京的 16 个区(县)都有分布。其中朝阳区人数最多,为 1444 人,海淀区为 1074 人,东城区为 900 多人,其他各区县都有上百位失独老人。这些失独老人以 60 岁以上为主,总体年龄偏大。受生育观念和政策调控力度的影响,城镇地区的独生子女家庭远多于农村地区,失独老人的比例也远大于农村地区。

3.1 经济状况

我国现对失独者的年龄界定是在 49 岁以上。本次调查抽取的样本中,已经退休的老人占到了 75%以上,所以没有了主要经济来源,将近 80%的人也没有储存养老用的钱,加上无子女供养,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图 1)。而农村地区的失独家庭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故大多数失独家庭生活较拮据,生活水平较低。此外,还有部分家庭因为子女生前看病欠下巨债,或还需要抚养第三代和赡养父母,经济上更是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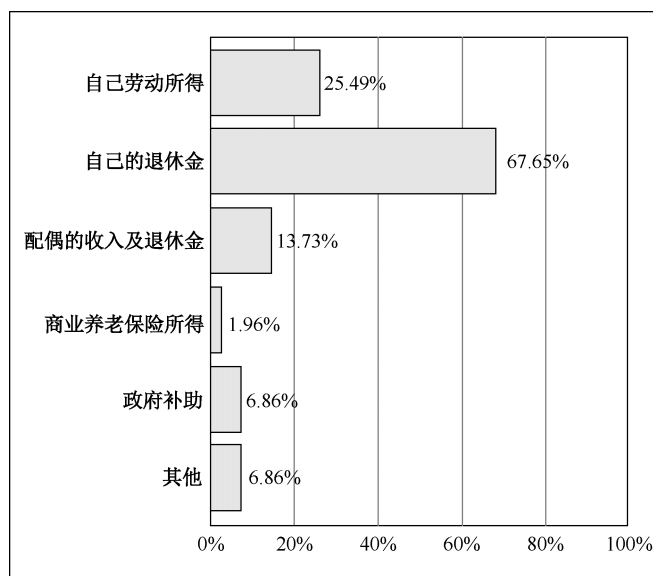


图1 失独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年迈体衰，大多数失独老人身体较差，根据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的调查，在失独老人中，有 5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15%的人患有重大疾病，调查发现，身体较差的占到了 1/3 以上，身体很好或较健康的仅占不到 10%（图 2），也就是说，90%的失独老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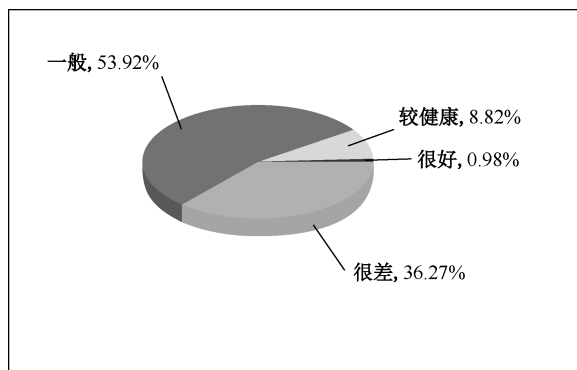


图2 失独老人的身体状况

除日常生活开支外，看病医疗是大多数失独老人的主要支出（图 3）。拥有北京户籍的大多数失独老人拥有医保，能减轻一部分负担。在看病过程中，除费用问题外，无人陪伴也是一大难题。而且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失独老人是独居，一部分是因为年纪较大，其父母已经故去，其子女生前也未生养第三代，老伴儿已离世；一部分是因为子女走后夫妻离婚的，这个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在这种独居的情况下，如果突发疾病而身边又无人陪伴，如何就医就成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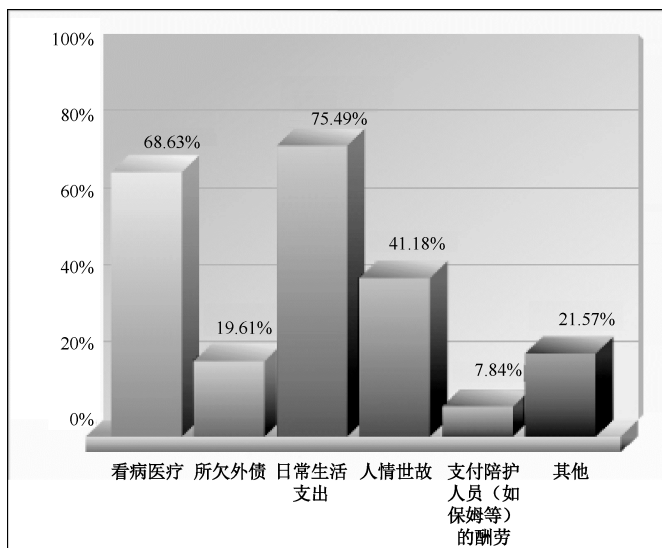


图3 您的主要支出

相关保障：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金

2007年8月，中国正式出台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从2008年起，国家开始全面实施计生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该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自女方年满49周岁后，夫妻双方每人每月分别领取不低于80元（伤残）或100元（死亡）的特别扶助金。

2012年，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10元（伤残）、135元（死亡）。2013年，全中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共有67.1万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为40.7万人。自2014年起，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50元、170元，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

2015年1月1日起，北京提高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金的标准。对于具有北京市户籍、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或死亡、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女方年满49周岁的夫妻，政府发放的伤残、死亡特别扶助金分别由现行的每人每月160元、2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400元、500元。且从2015年起，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和特别扶助金负担渠道调整为市、区县两级财政分级负担，其中市级财政负担85%，并结合年度预算安排情况纳入市对区县转移支付补助项目；区县财政负担15%。但是对于已经退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并且无子女供养的失独老人来说，这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且，由于没有统一政策，全国各地的扶助标准不一样，最高的达到1000元每人每月，最低的只有170元每人每月，甚至更少。

3.2 精神心理状况

其实，在经历了老年丧子这一人生大不幸之后，心灵上的创伤才是最难痊愈的。据调查，将近80%的失独者会经常陷入沮丧、失望等消极情绪中，6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有自残和轻生念头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除在经济和物质上给予关怀外，如何给失独老人精神上的安慰，让他们走出伤痛，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更应该是我们工作

的重中之重。

从图4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经常陷入沮丧、失望等消极情绪中的占到了76.47%，很少陷入这种情绪的不到3%，可见，心里的这道坎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无法逾越的。换位思考，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丧子之痛，只要看到小孩子或者与子女相关的事物就难免会触景伤情，一位失独母亲告诉我们她现在不会终日以泪洗面了，但是不能想起孩子，“最害怕的是晚上，做梦还是会经常梦见孩子，就像她还在身边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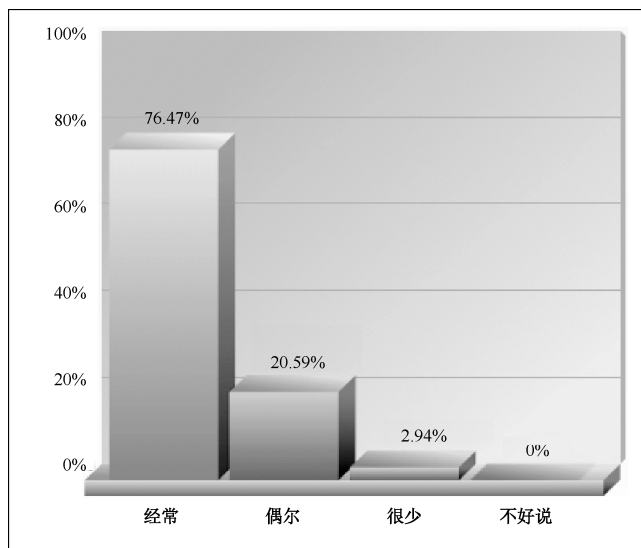


图4 是否经常陷入沮丧、失望等情绪中

当陷入这些消极情绪中时，一半以上的失独者选择了闷在心里，不愿意或不能够向别人倾诉。一方面是因为他人不仅无法理解，还可能会招来嘲笑和歧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伤疤轻易地揭给别人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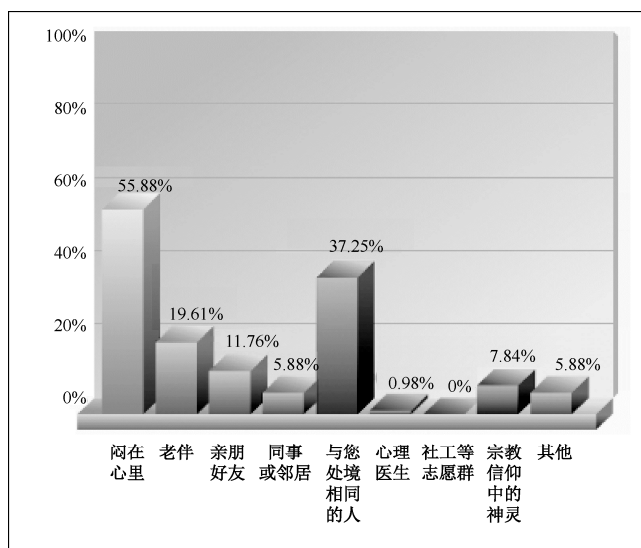


图5 有心事时的倾诉对象



相关保障：“心灵家园”——为失独家庭提供精神慰藉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协会联合社会组织，建设“心灵家园”，为失独家庭提供精神慰藉、文体活动和生活照料。目前，16个区（县）已建成129所“心灵家园”基地，市级建成4所。

“心灵家园”基地是失独家庭互助与交流的场所，通过组建舞蹈、书法、摄影、养生、旅游等兴趣小组，在重要节日组织开展主题活动，鼓励家园成员之间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建立与家园成员的沟通联系渠道，及时了解其需求。同时，以“心灵家园”基地为载体，统筹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建立骨干志愿者、专业志愿者、普通志愿者服务队伍，为家园成员提供体检、特殊呼叫、家政服务及紧急救助等公益服务。

我们走访了西城区展览路的新希望家园，这是2009年建立的全市第一家心灵家园。一进门是一张家园“全家福”，园长樊阿姨告诉我们这是几年前照的，当时家园只有40多位成员，随着活动开展得日益丰富，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109位成员了。家园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着很多字画和照片，都是失独老人自己写的或拍的。屋中有一个“暖心书架”，供成员浏览或借阅。还有一个小厨房，里面锅碗瓢盆、电磁炉、冰箱俱全，樊阿姨说有时候成员们在这里参加完活动就在这里一起做饭一起吃，各种基本食材都有。家园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一年两次春秋游，每逢节日都会组织踏青、赏花、远足、健行、植树、手工制作、厨艺大赛等活动。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正赶上有几位成员在排舞蹈节目，她们面色红润，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可见这个家园给了她们家的感觉。看到她们优雅的舞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但是据了解，全国范围内有这样专为失独者提供精神慰藉的省份并不多，除北京市的“心灵家园”外，湖北武汉市有一个“温馨港湾”，影响也比较大。但是纵观全国，在失独家庭心理和精神安慰工作上还是非常不足，亟需加强和改进。

3.3 养老保障状况

西城区新希望家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失独群体目前最担心的还是养老问题，他们年事渐高，又无法律赡养人，以后生老病死恐怕都无人过问。

在问到最担心的问题时，选择最多的三个选项是“等到年老体弱时没有人进行日常照料”“没有监护人，看病困难”和“没有担保人，很难进入养老院”，如图6所示。由此可见，由于独生子女的离去，这些老人在法律上赡养人和监护人的缺失是问题的关键，怎样为其确定新的法律监护人以解决就医难和进养老院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

由图7可以看出，大部分失独老人倾向于特殊（专门的）失独者养老院养老，主要原因是在普通养老院与其他老人恐怕没有共同语言，聊到孩子会勾起伤心事，逢年过节别人有孩子来探望也会对其造成一定刺激。研究表明，失独群体更倾向于“抱团取暖”以集体疗伤，从全国各地的失独者QQ群和贴吧论坛也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一群体的排外性比较大，可能是由于经历特殊而产生自卑心理，也可能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而避免与外界接触，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只要是人都渴望爱，同样，失独群体也十分渴望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但这种关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而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平等地对待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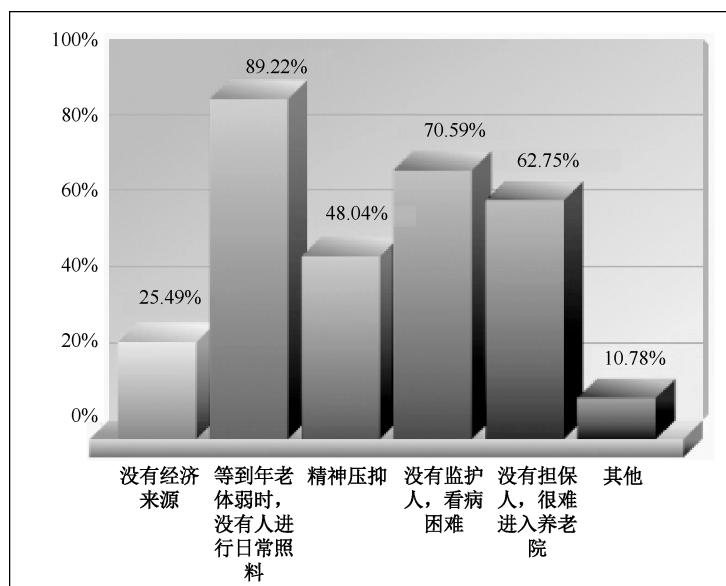


图6 失独群体最担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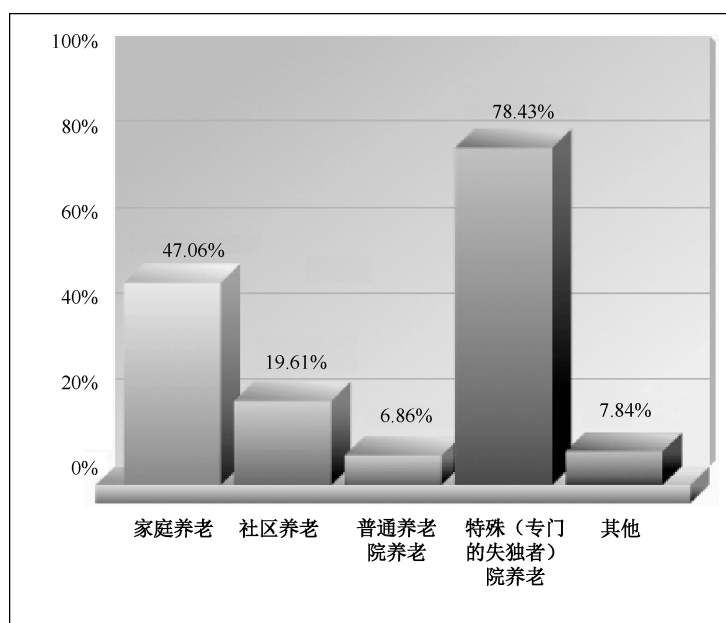


图7 理想的养老方式

相关保障：“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养老保险

自2012年开始，北京市计生委开始和北京人保寿险合作，政府连续出资3年，给失独老人每人每年投保2800元，为其购买涵盖养老、医疗、意外、人寿和女性安康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3年来为26415人次投保，政府投入7366万元。2015年7月1日开始，“暖心计划”进入第一轮养老金给付高峰。预计有7100位符合条件的失独老人，每人可一次性领取3年合计养老金8700元，全市领取资金总额约为6177万元。本次养老金领取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2012年6月30日起参加“暖心计划”，且截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被保险人年满 55 周岁。在 2015 年 7 月中旬已完成全市 90% 区县的养老金领取工作。

由参保人数可以看出，并不是每位失独老人都享受到了“暖心计划”的福利待遇，它有年龄和户籍等限制。而且就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社会对这一政策的了解并不充分。不仅一些失独家庭不知道或不太了解“暖心计划”的具体政策，在回答时表示除知道有扶助金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政策。就连有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太了解其具体涵盖的险种，只说是养老保险。可见，政府对这一政策的宣传和普及程度还不够，如果连宣传工作都没有做到位，具体落实情况则更令人担忧。

3.4 社会对失独群体的关注情况

除调查了失独群体外，我们也调查了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在北京的部分高校、政府单位、事业单位、街上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学生（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工人、农民、个体户、保安、快递员等多种职业人群，年龄从 13 ~ 75 岁不等，故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调查结果（图 8）来看，做此问卷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群体的占到了 27.6%，听说过但并不了解的占了 1/3 以上，比较了解的只有不到 10%。由此可见，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并不是太多，关注度也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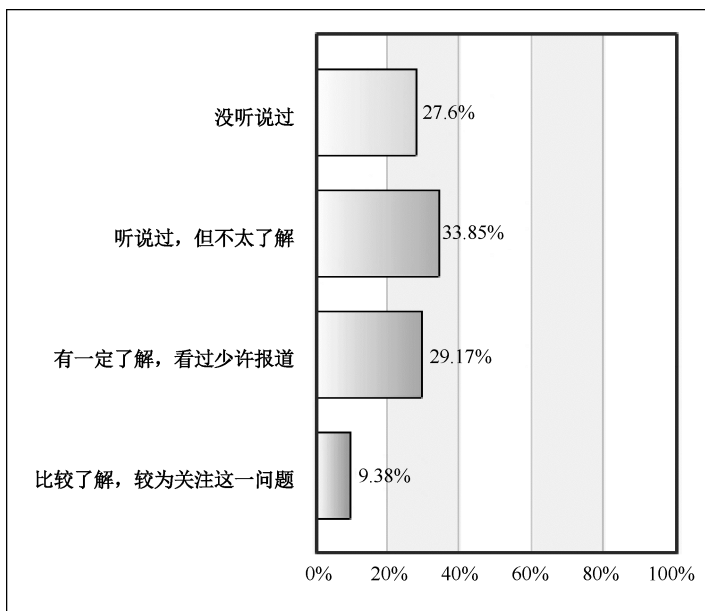


图 8 社会大众对失独群体的了解程度

在简单介绍了失独群体的概念之后，我们询问调查对象认为失独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选择最多的分别是“心灵创伤，精神孤独”“无人养老”和“遇到突发状况无人照料”，与失独群体选择的最大困难基本吻合，如图 9 所示。

大致了解了失独群体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后，有 86% 以上的人认为失独问题是一个

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注尽快解决（图 10），并有 8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为失独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此次调查也使得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关注失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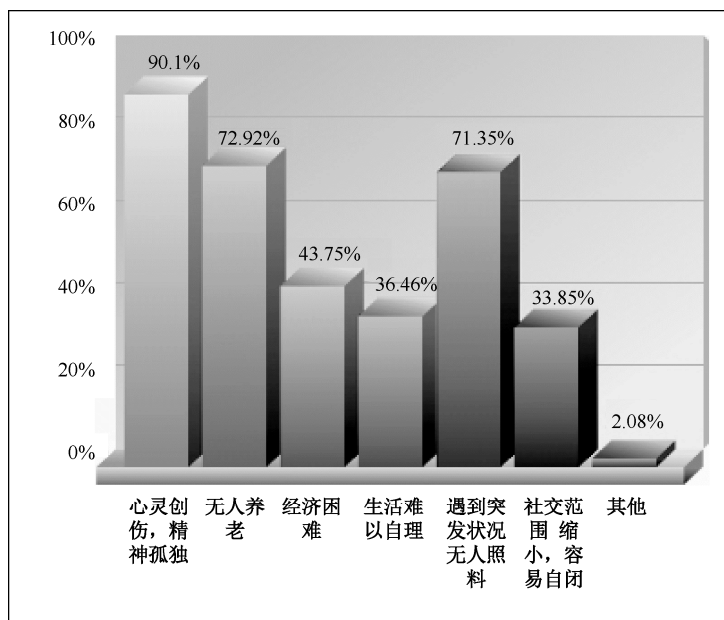


图 9 社会认为失独群体面临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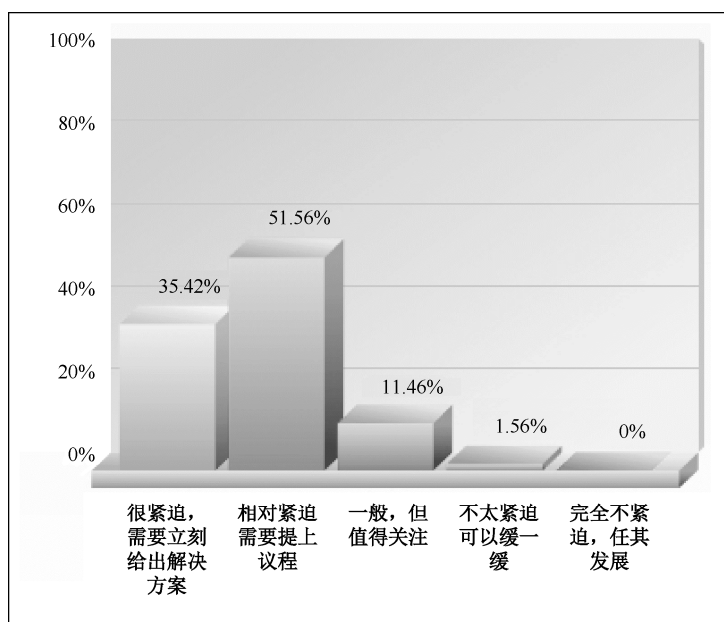


图 10 社会大众对失独问题紧迫程度的看法



4 目前失独群体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4.1 全国扶助金标准不统一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对失独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虽然在 2007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财政部出台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女方年满 49 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 100 元的扶助金,然而,就这一项制度很多地方也没有严格执行,各地在这方面的政策可以用“缺、乱、损”3 个字来概括,即绝大多数失独群体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各地进行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试验相当混乱。总体来看,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益处于受损状态。对于扶助金具体标准全国不统一,造成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最高的每人每月可领 1000 元扶助金,最低的只有 170 元甚至更少。

在扶助金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主要为广东深圳、东莞等城市。或许是因为这些城市发展历史较短,外来人口较多且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社会抚养比低,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都做得较好,各种福利待遇都走在全国前列。截至 2014 年年底,深圳市独生子女死亡、伤残扶助金发放对象分别为 314 人、235 人。按新标准测算“十三五”期间扶助金的费用总额每年在 600 万元以上,扶助金由各区财政负担,纳入区财政预算。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深圳市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死亡、残疾的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1000 元、800 元,并建立完善了多项扶助优先制度,以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此外,深圳市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死亡、残疾的特殊家庭还享受 5 项“优先”服务:优先提供养老康服务,对 60 周岁及以上的特殊家庭成员,优先安排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优先提供再生育、收养服务,免费提供相关计划生育手术,对符合收养条件、有收养子女意愿的予以优先安排;优先提供住房保障服务,对申请廉租房、公租房、安居房等优先安排;优先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凭《优待证》在市属公立医院就诊优先等;优先提供专项服务,符合低收入、残疾条件的特殊家庭成员,享有专项扶助服务。这些政策值得全国其他省市借鉴参考。

4.2 突发情况无紧急联系人,就医困难

本次调查发现许多 70 岁以上的失独老人都是一个人生活,随着年纪增大,身体越来越差,行动不便。在看病就医过程中,突发疾病无联系人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我就怕哪天晚上突发心脏病,走了都没人知道。”一位受访老人这样对我们说。此外,重大手术无人签字也是其面临的一大问题

由图 11 可见,超过半数的失独老人在看病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人陪伴,突发疾病无人送自己去医院,做手术无人签字担保,就诊时也无照顾,此外,还有费用问题。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多位老人提到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并因为费用问题没有得到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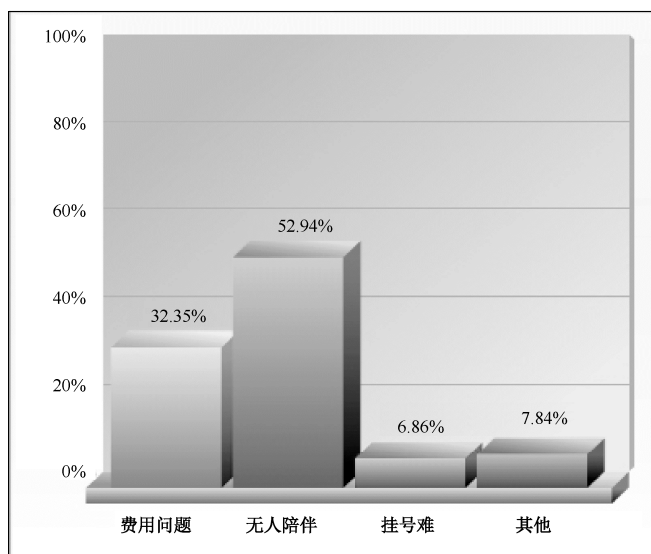


图 11 看病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4.3 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

由于经历的特殊性，这一群体比其他人都要敏感，心理上也更加脆弱。一位“心灵家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与失独老人说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很多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不小心就会伤到他们。此次调查发现，很多失独者对心理咨询充满怀疑，认为其解决不了问题（图 12），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一种偏见。据了解，有些老人确实寻求过心理辅导治疗，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现在的许多心理咨询流于商业化和利益化，针对失独群体的专业性相对缺乏，因此很多人求助无门，只能选择闷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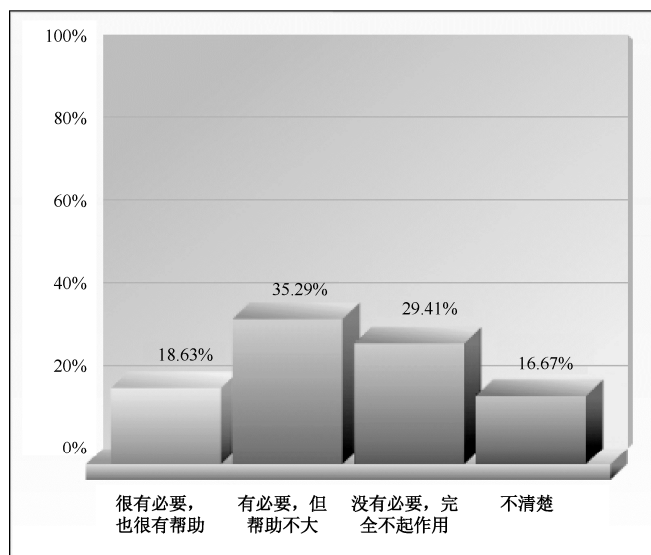


图 12 失独群体对心理咨询的看法



4.4 进养老院难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生人口进入老年期，我国迎来了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据推算，中国从 1999 年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1 年之后进入“人口老龄化提速期”。《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披露，截至 2012 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1.94 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4.3%。到 2013 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突破 2 亿大关，达到 2.02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4.8%。根据权威机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2.43 亿，占人口比例将达 18%。而到 2050 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为 4.37 亿，老年人口比例将达 31.2%。届时，中国将进入一个“三人行，必有一老”的超级老年型社会。如何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我国实现“老有所养”战略目标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而如何解决失独这一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也是社会和政府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而且我们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失独老人倾向于养老院养老和家庭养老两种方式，并希望建立专门的失独养老院。除费用问题外，进养老院还存在一个担保人的问题。2015 年 6 月，北京市宣布将北京市第五福利院改造为专收失独老人的养老院，具体收住标准还在研究中。我们向第五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第五福利院目前的空余床位大概只有 120 张，而排队的失独老人估计已达几千人。如何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又将是一大难题。

5 结论与建议

众所周知，养老绝不仅仅只是一栋住房、一笔养老金能解决的事情。因此，要想解决我国失独群体的养老问题，仅从一个方面，靠一种力量是不够的，它需要从经济、医疗、精神、住房、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才可能为失独者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

纵观北京市针对失独群体的相关政策，可看出政府及社会对这一群体是越来越关注的，很多政策都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其中很多如“暖心计划”“心灵家园”工程也是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对于相关政策进行制定和改进，不仅能体现北京市政府的责任和能力，对全国来说，也会起到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针对目前北京市失独群体养老保障还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5.1 统一全国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失独家庭养老制度化

2001 年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害、死亡，其父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有关“必要的帮助”的相关细则并没有明确规定。

国家没有出台相关统一的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这一制度的公平性，也使得各地的试



验处于无法与外地方案进行衔接的独立状态，将无法解决失独群体的后顾之忧。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立失独人口数据库，发放失独老人证，便于了解需求与开展服务。建立“一对一”帮扶制度，不同家庭情况不同对待。

(2) 制定全国统一的扶助金制度。例如，深圳现在的扶助金是每人每月 1000 元，而内地有些省份只有 170 元甚至更低，差别太大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目前失独群体的普遍要求是把失独家庭的待遇与因公伤残和市级劳模的并列。此外，还应根据家庭的特殊性，给予特别优待，如有的需要抚养孙子、孙女或赡养老人的应当给予特别补助。

(3) 建立失独家庭保障房和廉租房制度。有些失独老人因子女生前看病欠下巨债，只能卖掉房屋，居住在环境潮湿阴暗的廉租房里。

(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失独群体养老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解决失独老人法律赡养人缺失的问题。

5.2 开通绿色医疗通道

(1) 建立失独老人紧急联系人制度，解决陪同就医、手术签字的问题。可由相关街道、社区及志愿者、义工等负责。我们了解到，北京市有针对失独群体的亲情牵手活动，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精神慰藉、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等多元化服务。目前，全市共有近 5000 位志愿者与 3000 多户计生特殊家庭亲情牵手。如果可以将这个活动与紧急联系人制度联系起来，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2) 医疗费用补贴。凭计生特殊家庭证在市属公立医院就诊优先并给予失独老人大病救助和医疗费补贴。此项措施可有效缓解失独老人挂号难、排队难的问题，同时也能减少一些因费用问题看不起病而无法就医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北京一些街道定期组织失独老人体检，这对于预防和及时治疗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应继续坚持并加以推广。

(3) 建立专业的失独老人服务队伍，定期为其体检和提供健康照顾。满足高龄失能老人的护理需要；扩大养老产业从业人员队伍，加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逐步实现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化、专业化。

5.3 培育和帮扶相关民间公益组织，给失独群体更多关爱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加速发展阶段，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全让政府去养老，显然不现实。因此，政府要积极倡导和扶持民间公益组织，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促使养老形式多元化和市场化。

国家应该大力鼓励大量的慈善组织和基金会等第三部门进入失独老人养老领域，发挥他们灵活多变、专业性强、富有激情的优势。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可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及时有效地扶助拥有失独老人的家庭，提供一些政策之外的关怀和补助。



鼓励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多种模式并存。发展社区互助养老，对居家养老的失独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社区养老以失独家庭为中心，以街道办为起点，以居（村）委会为媒介，以社区小组为落脚点，由运行机制、监督激励机制及退出再循环机制三部分组成。成立社区关爱失独者服务中心，社区小组内部分工合作，为失独家庭提供物质精神一体化服务。

北京目前在关爱失独群体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公益组织有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和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他们都有专门针对失独群体帮扶的项目。其中，尚善公益基金会主要是为失独者提供一个自助和互助的平台，希望通过自我增能和同命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走出阴影，如他们成立了一个“暖心健行队”，经常组织同命人进行野外行走，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忘掉烦恼。此外，他们还有“暖心年夜饭”等活动，组织同命人在一起过年。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更主要的是提供心理援助方面的服务，2015年8月天津爆炸事故后，他们也发起了为这次事故中失独父母的捐款活动，并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5.4 放宽失独家庭收养条件，增设不完全收养法律制度

除将收养对象扩展至成年人外，在立法上还可增设不完全收养即简单收养制度，指被收养人在与收养人建立父母子女关系的同时，与其生父母之间仍然保持父母子女关系，收养方式可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也可与失独家庭紧急联系人制度结合起来，解决他们就医与进养老院签字的问题。

6 结语

世界上或许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任何一项制度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实行某种制度，但至少应对其产生的后果负责。同样，为控制我国人口数量起到过重大作用的计划生育制度，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改进的同时，也应为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及时做出补救措施。但是一种制度的完善不仅要靠政府，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何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为失独老人托起一个老有所养的晚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时间不等人，面对年岁渐高的老人们，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参考文献

- [1] 王丽娇，“失独老人”的暮年将于何处安放[J]. 改革与开放，2014，（17）：72-73.
- [2] 马一. 当代中国失独家庭救济机制的系统建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42-51.
- [3] 方曙光. 断裂、社会支持与社区融合：失独老人社会生活的重建[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05-112.



- [4] 李倩, 贺连香. 加强失独老人护理工作的探讨[J]. 护理学杂志, 2013, (04): 84-85.
- [5] 夏木, 杜葳. 救助失独者[J]. 中国新闻周刊, 2012, (36): 48-49.
- [6] 张必春, 刘敏华. 绝望与挣扎: 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演变及其干预路径——独生子女死亡对夫妻关系影响的案例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4, (04): 104-111.
- [7] 杨勇刚, 胡琳娜, 马刚. 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失独老人养老风险化解机制——基于对河北省保定市的调研[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2): 100-106+159-160.
- [8] 谢勇才, 王茂福. 论我国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 中州学刊, 2015, (01): 68-72.
- [9] 贾锋. 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权的国家保障[J]. 理论探索, 2014, (02): 115-120.
- [10] 袁静娜, 吕天驰. 浅谈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J]. 学理论, 2013, (13): 94-95.
- [11] 魏凌波. 浅析城镇地区失独老人的精神困境和精神自养[J]. 神州, 2013, (06): 257-258.



关于工业遗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探究

——以 798 艺术区为例

首都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二等奖

作者：马泽天 陈启白 鄂益坤 姜影影

指导教师：刘丽敏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一些地区更是形成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而且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许多由于产能撤离而闲置下来的厂区厂房面临改造。其中，以城市工业遗产和旧厂房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更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以北京市的 798 艺术区为例，思考在工业遗产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概况和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工业遗址 文化创意产业 798 艺术区

1 引言

北京 798 艺术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坐落在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所属的 718 大院，核心区域占地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23 万平方米。798 艺术区汇集了画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艺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众多的文化艺术机构。其中包括多家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机构。这里曾一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展示中心和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北京乃至世界最重要的现当代艺术的集散地之一，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面旗帜。北京 798 艺术区吸引了众多世界政要、影视明星、社会名流前来参观。2003 年北京 798 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 22 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2004 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年度评选为世界有发展性的 12 个城市之一，入选理由之一就是 798 艺术区。

2016 年 7 月 23 日，我们 12 人的社会调研实践团队来到 798 艺术区开展为期 14 天的调研活动。调研初期，我们从 798 艺术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1995 年中央美术学院的隋建国老师租用了 798 工厂的闲置厂房作为雕塑场地，由此拉开 798 由废弃厂房向艺术区转变



的序幕。798 艺术区交通便利，颇具包豪斯建筑风格，很适合开设画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工作室等，也非常适合艺术家们发挥创意灵感、创作艺术作品。后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不断被 798 艺术区的艺术创作氛围所吸引，使得 798 艺术区逐步壮大，从而造就了 798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知名地位。我们走访了整个 798 艺术区发现，今天的 798 艺术区在功能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是原先的艺术创作圣地，而是演变成一个庞大的艺术品超市，正在进行疯狂的商业性开发。如今，资本寻求利润的冲动已经消解了原来的艺术气息，一片商业气味已经冲淡了 798 艺术区的艺术氛围，而艺术就是 798 艺术区的产业生命。798 艺术区的艺术魅力成就了一个商业奇迹，但是这一商业奇迹似乎要结束 798 艺术区的产业生命。

为什么一个以艺术定位的艺术区却成了现在买卖商品的地方？为什么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却成了小商贩、饮食的集聚区？为什么工业遗址改造成的文化区却存在推倒重建的情况？上级部门领导是否知道 798 艺术区的真实发展情况，有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我们首先查阅了近年来关于 798 艺术区发展情况的文献，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而且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点，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促进社会产业结构优化的朝阳产业、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的重要产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兴产业。因此，我们决定以关于工业遗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为调研课题。在调研中期，我们实地考察了 40 余家入驻商户，拍摄照片 200 余张，并且走访了 798 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管委会。为了对后期 798 艺术区的发展情况做定性分析，我们设计了关于 798 艺术区所面临问题的调查问卷，有效回收 249 份。

结合调查数据并进一步确立了研究框架，根据得到的数据对 798 艺术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列出其中存在的房租高以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和艺术家的艺术理想的矛盾冲突两大问题，逐条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明晰各个原因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对策。

2 798 艺术区的发展情况

2.1 798 艺术区的发展现状

798 艺术区是北京重要的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园区自 2004 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数届艺术节。首届艺术节吸引了 80000 人次前来访问，其中约 60% 为中国观众，40% 为境外观众，其中不乏来自巴黎等国外各大城市当代艺术的代表。798 艺术节已经成为园区的盛事。园区每年举办超过 2000 场次的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动，吸引 300 多万人群到访。北京 798 艺术区在不断的扩大中已经逐步成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典型艺术聚集地。在此聚集地观光造访过的有国际奥林匹克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欧盟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泰国公主等。北京 798 艺术区也成为多家教育机构重要的产学研基地，在国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798 艺术区以其独特的建筑和人文环境，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已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旅游目的地。



每年有近 50 万到访者，其中近半数外籍人士，树立了国际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品牌形象。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率先实施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双轮驱动”战略，着力打造“世界文化之都”形象。市区两级政府都拟将 798 艺术区所在的大山子区域打造成国际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2.2 798 艺术区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2005 年，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艺术家李象群联合 798 艺术区内的艺术机构，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保护 798 艺术区的议案，获得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支持。而就在 2006 年伊始，《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798 艺术区正式被政府定位为“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这一消息使 798 艺术区摆脱了被大规模拆迁的阴影，798 艺术区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也标志着 798 艺术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798 艺术区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画廊行业剧烈膨胀，国内外画廊纷纷入驻，2004～2007 年，短短 3 年时间，艺术及商业机构从 75 个迅猛增至 250 个。艺术家工作室从最初的 38 个增加到 59 个，798 艺术区的艺术家群体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壮大；画廊也逐渐被 798 艺术区的名气所吸引，优秀的外资画廊，如日本东京画廊（2002 年）、德国空白空间画廊（2004 年）等相继入驻，同时带动了本土画廊行业的发展；798 艺术区独有的艺术魅力也吸引了书店、艺术网站、设计公司等众多文化机构进入；此外，餐饮、商铺也为艺术家及艺术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便利，使整个艺术区增添了生活的氛围。通过区域的品牌效应的增强、知名度的提升，798 艺术区吸引了更多艺术机构（如画廊到美术馆级别的艺术机构）进入。2006 年，最早进驻北京的外资画廊之一的红门画廊在 798 艺术区开设分店。意大利常青画廊、台北帝门画廊、程昕东当代艺术空间等重要画廊都在这一时期进入 798 艺术区。2007 年 11 月 2 日，尤伦斯的开幕可以算作这个过程的高潮事件。尤伦斯是非营利性的美术馆，它选择 798 艺术区——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发生地，完整了 798 艺术区的产业结构。同时，相关服务业文化娱乐业也发展起来，如餐饮、酒吧、服饰、礼品店等日渐红火，争奇斗艳，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798 产业区在不自觉间完成了产业链的调整。

2008 年之后，画廊的发展进入滞缓期，生意大不如前，很多画廊不断缩减展览次数及开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的很多画廊从 798 艺术区撤离，还有一部分画廊开始寻求 798 艺术区周边成本更为低廉的空间。从数据来看，2009～2010 年，798 艺术区的画廊数量不增反减，从 168 家减少至 159 家。随后几年，每年都有大量画廊迁出，同时也有不少画廊慕名而来，画廊的数量在一进一出之间维持着平衡。政府引导的力度在这个阶段体现明显。在奥运因素的驱动下，798 艺术区的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经政府资金支持得到巨大改观。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虽然 798 艺术区内部更迭频繁，但是园区内的旅游热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据悉，尤伦斯艺术中心“2011 年只有 170 平方米的艺术商店全年营业额达到 1700 万元”。很多画廊也开始在展厅一侧做起了艺术衍生品生意。798 物业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对营利性质的文化机构（设计、建筑、媒体等）似乎更为青睐，因为他们更有能力承担高额的租金。足够的游客数量使 798 艺术区内的咖啡厅、酒吧、创意品商店甚至是卖水的小亭都生意火爆，维持了艺术区表面的繁荣。2012 年伊始，在当代艺术相伴下的 798

艺术区刚刚走过了第一个 10 年，又有新的变故发生了：由于房租纠纷，798 艺术区第一批租户徐勇的时态空间遭物业强行封锁。这不得不让人思考 798 艺术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798 艺术区经济学角度的演变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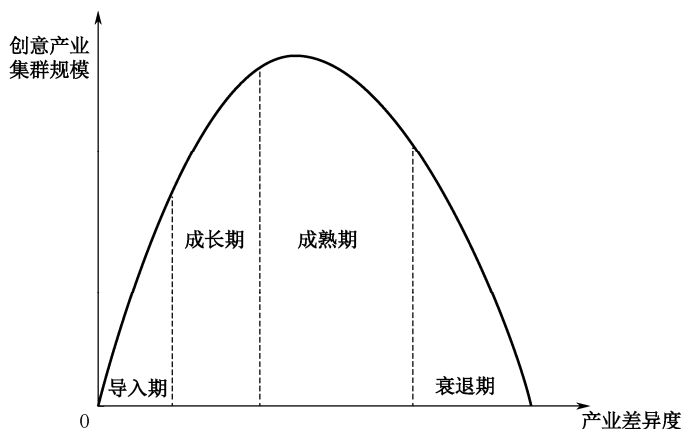


图 1 北京 798 艺术区经济学角度演变过程

798 艺术区目前入驻的机构有 449 家，大致有 3 个类别。其一，文化艺术类，主要包括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占比 25%。其中艺术家工作室基本维持在 55 个左右，仅占总比例的 12%，而画廊中大量的签约艺术家并非艺术区的在场艺术家；798 艺术区的画廊数量和聚集程度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艺术区中都首屈一指，但随着艺术区房屋租赁的饱和，自从 2013 年之后，每年都有数十家画廊迁出，房租问题仍然是纠纷的始作俑者，而且大量涌入的观光客并非画廊的艺术品销售目标群体，因此这些画廊的生存现状并没得到太大的改善，2016 年 798 艺术区的画廊数量只剩下 57 家，仅占艺术区机构总比的 13%，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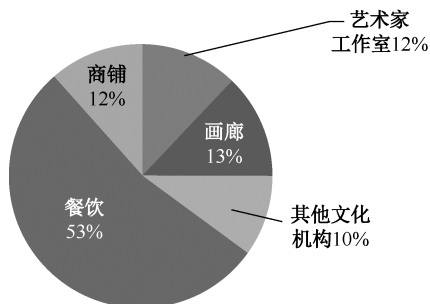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北京 798 艺术区各类机构入驻数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 798 艺术区创意文化产业发展并不顺利，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机构被餐饮和小商店所取代，种种迹象表明，798 艺术区的商业化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创意文化的平稳发展。



3 798 艺术区面临的问题

3.1 快速增长的租金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山子地区的工业衰落,工厂遭到废弃,大批工人下岗,大多数业主本来打算拆建工厂进行商业开发,但是一些艺术家们看到了此地优越的条件,希望能到这里进行艺术活动。而业主把闲置的厂房出租给艺术家们做工作室只是做临时性的考虑,最主要的目的是赚取少量的租金。1995 年,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以极其低廉的租金(每天每平方米 0.3 元)租用了一个 3000 多平方米的仓库作为雕塑工作室,开启了 798 从厂区走向艺术区的先河。之后,随着 798 艺术区的名声越来越响,更多的人开始涌入这块艺术宝地。2000 年以后,北京市城市建设急速扩张,798 艺术区成了黄金宝地,加上业主们对短期经济效益的急功近利,地价的飞涨带动 798 艺术区的房租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无力负担租金的重压。由 2002 年每平方米每天 0.6 元,到 2007 年的 5~12 元,5 年时间房租上涨了 10~20 倍。房租快速上涨,既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也有 798 艺术区人气渐旺和空间有限而导致的市场卖方效应,还有部分空间的层层转租导致成本上升。一度沸沸扬扬,闹上法庭的摄影家徐勇与 798 艺术区的房租纠纷事件或许是房租逼走艺术家的直接案例。当前房租还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中。艺术家们自发地聚集在这里,打造出了 798 艺术区的品牌,带动了这片废弃工厂的升值,但是品牌的名声大噪也吸引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这里分羹逐利。最早进驻 798 艺术区的艺术家黄锐认为,“一个以艺术命名的区域,首先必须尊重艺术家。在 798 艺术区,法律上的主人是业主,但精神上的主人是艺术家。缺少了艺术家的 798 艺术区,就不能称之为 798 艺术区”。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资本争夺的现实是不容艺术家轻易改变的。

3.2 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和艺术家的艺术理想的矛盾冲突

随着 798 艺术区品牌的形成,798 的名声越来越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而那些崇尚时尚的商家更是将 798 艺术区作为投资的首选,把商业的目光投射在这片艺术区,因此日益浓厚的商业气息开始笼罩着这片艺术宝地。798 艺术区渐渐被商业气息所侵占,艺术氛围已不再是当年的景象。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初期,业主们为了艺术区的发展,在整修道路、修建停车场、改善卫生条件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艺术区的硬件设施,为 798 艺术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可是现在,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业主们将艺术区进行了很多违反艺术创作的改造,这严重损害了艺术氛围,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初衷。不仅如此,一些小商小贩开始涌入,在艺术区内随意地摆摊设点,这样看来,798 艺术区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不再是一个仅供艺术欣赏的园区。时尚消费充斥着 798 艺术区,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来这里寻找商机,面对这种情况,艺术家们很无奈,有些纷纷选择离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和艺术家的艺术理想之间的矛盾,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艺术区的变味或衰败。



4 798 艺术区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4.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大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进经验，制定并完善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各种法规和鼓励政策，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适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诸如 798 艺术区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名声越来越响的同时，势必会吸引大量的商家涌入，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很多资本家往往忽视对艺术区的保护，对艺术区造成破坏，这就需要政府来合理管制。政府应在不破坏艺术区发展的前提下，吸引企业投资，既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市政府一直以来十分关心 798 艺术区的发展。2005 年正式发布的《2004—2008 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对‘大山子文化艺术区’一类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要积极研究、科学论证，在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前提下，推进新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和管理”；2005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要认真对待大山子的建筑物的保留方式，对艺术区 4 栋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建筑进行重点研究，同年印发通知明确将 798 艺术区列入保护范围；2006 年，798 艺术区被认定为北京市首批十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并确定了保护中间、开发周边、确保稳定的持续发展原则。政府相继出台的文件对 798 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政府对 798 艺术区似乎一直停留在谨慎而又积极的宽容态度上，“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政府并没有真正对 798 艺术区进行战略性发展定位。这就使得 798 艺术区的发展方向、内部功能分区、产业链构建、产业化发展路径等问题具有极大的随意性，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管理者和经营者很容易注重短期的经济行为，而忽视长远发展。

4.2 艺术家地位边缘化

在 798 艺术区的整个从废弃厂房到艺术圣地的转变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是艺术家。2002~2003 年第一批进入 798 艺术区的艺术家包括黄锐、徐勇等 37 人。这部分人基本以艺术家为主，个别的是与艺术有关的人员。应该说，早期的入驻者直接推动了 798 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国际国内的艺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是现在这批人已经所剩无几了，有很大一部分离开了 798 艺术区。加上早期留下的艺术家，现在生活于艺术区的艺术家大约是 26 人。从画廊或艺术机构的数量来看，2003 年 798 艺术区的画廊或艺术机构主要有时代空间、弘泰武仕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等 18 家，而今天这 18 家也仅剩时代空间、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百年印象摄影画廊、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等几家了。据笔者调查和查阅相关文献，2003 年左右，共有艺术家 37 人，画廊和艺术机构 18



家。至 2008 年年底，早期艺术家还剩 13 人，加上后来进入的艺术家 13 人，共 26 人，画廊、艺术机构约 218 家。也就是说，2003 年艺术家和画廊、机构的比例约为 2 : 1，但是到了 2008 年二者的比例约为 1 : 8。由此，画廊、机构的数量急剧膨胀，而艺术家则被严重边缘化了。当然，艺术家地位的边缘化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798 艺术区时态空间的主人徐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798 艺术区实际上是一个一级市场。艺术家已经成为资本运作的对象，这里有很完整的一个食物链。”

5 798 艺术区问题的对策

5.1 定位明确，坚持“创作方向”

从 2006 年开始，798 艺术区的建设被纳入北京市文化产业规划中。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区域，而是融入到整个北京市文化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中。不同的文化产业聚集区具有不同的自身特点，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定位。从 798 艺术区的发展来看，它已经走过了自发聚集阶段和“粗放型”的管理阶段。但是随着名声的增加及商业价值的提升，798 艺术区开始偏离其原来的发展轨道，逐渐成为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交错、艺术和商业交错，以及艺术与其他多种力量角逐的场域。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都左右着艺术区发展的进程和方向。笔者认为，艺术区的核心在于艺术，798 艺术区的核心在于创造艺术。将“创作”作为 798 艺术区发展的战略定位，能够保持其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区的特有气质。政府有了明确定位后，艺术区的一切活动和行为就要围绕定位开展，不能偏离这一方向，要有长期、中期和近期不同时段的发展规划。与此同时，政府要有扶持 798 艺术区发展的鼓励政策、措施，使其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要放水养鱼，努力维护和打造艺术区的品牌。

5.2 避免过度商业开发，让艺术家重回 798 艺术区

798 艺术区人气的走高，必然引起更多其他非艺术机构的大举进驻，从而加剧该区域的商业化气息。然而，这将使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旗帜和象征的 798 艺术区不复存在。艺术创作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更多的是想象、灵感、直觉、顿悟等非理性思维方式，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氛围。“现代艺术真正要开拓的是一个自由抒发的公共领域，而不是一个消费场所，尽管它对公共领域的拓展依赖于市场，但绝不能受制于市场”。从图 3 中可以看到 798 艺术区这种商业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

2004 ~ 2016 年，艺术区的画廊、其他文化机构、餐饮、商铺数量几乎一直在迅猛增长。2016 年，餐饮行业受到青睐，急剧增长。而作为艺术品创作来源的艺术家工作室，在 2007 年达到了 59 家的顶峰，随后几年，艺术家工作室逐渐撤离艺术区。商业化的过度开发直接产生的后果是商业品位的低俗，影响了整个文化区域的氛围和品牌形象。798 艺术区当前

新发展的商铺已经和起初以创意、精品为理念的商铺有了极大的不同，有的仅仅售卖普通旅游纪念品，很多商品都是从一些小商品市场和旅游商品市场批发来的，打着 798 艺术区的名号赚取超额利润。实际上，在考察中，798 艺术区在很多人的眼中，已经开始慢慢地俗气了，正在逐渐失去其早期最具活力的创造性。商业化的过度开发产生的另一后果是艺术家被迫离开艺术区。2007 年艺术区有 59 家工作室，到 2013 年只有 19 家，减少了 2/3。艺术家选择离开艺术区的原因主要是昂贵的场地租金和逐渐失去的创作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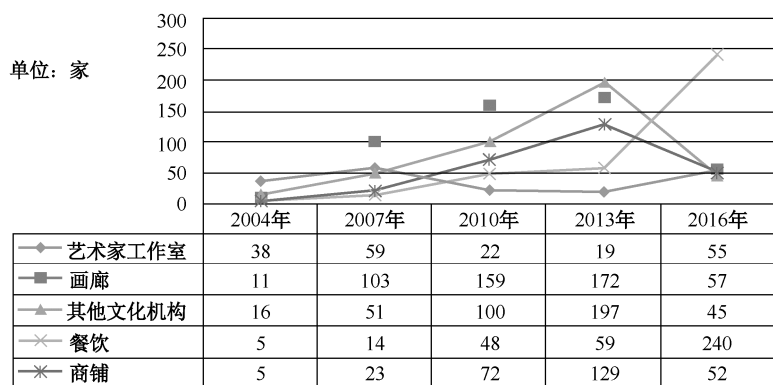


图3 798 艺术区各类入驻机构数量的变化趋势

艺术家的流失，带来的不仅是 798 艺术区生态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艺术区特性的消失。一个失去了艺术家的艺术区，或者说一个纯粹的画廊聚集区，其魅力或许要大打折扣。要知道，多数参观者之所以到 798 艺术区，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艺术品，更是因为这里的艺术家和他们独特的艺术创造，失去了艺术家的 798 艺术区将和全国其他大大小小的创意产业园区一样特色缺失、平淡无奇。艺术区的核心是艺术本身，艺术的本质是艺术家的创作。如果过度地商业化，艺术家不在了，798 艺术区作为艺术家创作的圣地也就不复存在，798 艺术区的生命也不会长久。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商业开发，避免商业的泛滥。

5.3 提升专业素养，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798 艺术区由朝阳区委、区政府、七星集团组成的“798 艺术区管理委员会”日常运转和管理。这一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地方政府参与组建事业性质的机构，与国有企业协同管理。政府提供艺术区的市政配套设施，七星集团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统筹建设艺术区的公共服务平台；七星集团投资组建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公司，具体负责艺术区建设项目的运作；七星集团物业部门提供艺术区的全方位物业管理服务。798 艺术区的运行是由产权主体七星集团具体实施的。七星集团是 2000 年年底在 718 联合厂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当初艺术区所在工业厂区规划为电子工业园区，七星集团成立的目的是管理电子城科技园。从工厂管理到艺术区管理的跨度很大，客观上导致 798 艺术区的管理难以按照既符合艺术又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进行。管理水平的限制，导致 798 艺术区经营和运转效率低下。在对 798 艺术区内商户和艺术家的访谈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一问题，受访者反映艺术区管理水平低、整体混乱、缺乏长远发展规划、无法进行良性发展。没有科学的管理，就不可能产生理想的



收益。七星集团管理方只能以房租为主要收入来源，房租上涨成了公司收入增加的直接方式。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必然导致艺术家的流失和艺术区发展方向的偏离。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培训现有管理人员的文化艺术产业管理知识，高薪聘请专业高级管理人员，提高艺术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使 798 艺术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在 798 艺术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要给出艺术区的明确定位，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 798 艺术区沿着既定方向发展。平衡好艺术产业和商业开发之间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适度的商业开发有助于艺术区艺术产业的发展，过度的商业开发则使艺术区失去艺术。提高管理者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要注重长远发展。798 艺术区只有回到艺术创作的本质上来，成为艺术家心目中的创作圣地，才能可持续地繁荣发展。

6 结语

文化创意是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文化创意产业倡导开发人类创造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强调创意和创新，强调把文化、技术、产品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有效地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

798 艺术区虽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它依然是在工业遗址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合理利用了资源，更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在工业遗址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相信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会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 [1] 刘明亮. 对北京 798 艺术区当下发展困境的分析[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 (1).
- [2] 赫斯蒙德夫. 文化产业[M]. 张菲娜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闫玉刚. 文化创意产业总论[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 [4] 花建. 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5]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6] 黎静, 等. 北京 798[M].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8.
- [7] 吕庆华. 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6.
- [8] 滕守尧. 文化的边缘[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关于建立留守儿童援助实效性体系的研究

——以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镇为例

首都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二等奖

作者：艾宛欣 苏星 李洁璇

指导教师：盖明

【摘要】为探究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帮扶的实效性，本文选取留守儿童问题较为典型的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镇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考察、入户采访、召开座谈会等方法获得大量当地帮扶留守儿童的有关资料，通过分析、讨论，提出了当前援助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由政府主导构建留守儿童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设立留守儿童专项基金、建立完善的留守儿童信息库、构建三位一体的关爱网络、注重帮扶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合理性等一系列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河西镇 留守儿童 援助实效性 问题 对策

1 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城市而出现的一个群体。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 5800 万人。留守儿童中的 79.7% 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 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 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如图 1 所示。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监护人水平有限，农村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不足，加之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留守儿童生活失助，学习失教，成长失护。许多孩子或性格孤僻，或对学习不感兴趣，甚至外出流浪被不法分子操纵而误入歧途。据调查，青少年犯罪群体中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 20%。留守儿童的父母多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本已经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留守儿童作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衍生群体，从小就远离父母的看护，无法得到应有的关爱，所以更为弱势。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频遭伤害的报道层出不穷，解决这一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帮扶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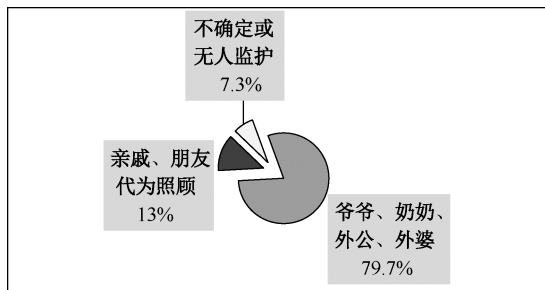


图1 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基本情况

以穆棱市为例，穆棱市妇联、团委动员全市力量坚持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共享一片蓝天”、“关爱留守儿童圆梦行动”等活动，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近年来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和条件限制，很多帮助和扶持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无法切实改善留守儿童的现状，帮扶实效性差。帮扶过程中存在着留守儿童信息库不完善，有些帮扶活动重形式、走过场，帮扶力度不够，没有真正建立帮扶的长效机制等问题。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相比，无法享受城市现代化带来的优越性；而相比农村其他儿童，他们又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这种不公平对农村留守儿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他们能力的获得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与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相悖而行。

因人口流动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占儿童总数的比例居高不下。以河西镇为例，当地留守儿童占儿童总数的 21.7%。课题组通过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监护等问题，认识到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会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后腿，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障碍。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实现更高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因此，为了研究留守儿童帮扶活动的实效性，探究出更合理、更高效的帮扶机制，课题组以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镇这个留守儿童问题较典型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对河西镇调查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如何才能增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援助的实效性。

2 河西镇留守儿童帮扶工作的现状

2.1 基本情况

穆棱市素有金城的美誉，百里金川从河西镇穿过。20 世纪，当地的铁矿石资源十分丰富，是当时东北典型的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当地居民多以工矿产业谋生。但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工矿产业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当地水土流失情况非常严重，相当一部分土地不能复垦，人均纯收入位于 8 个乡镇之末，就业岗位锐减，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许多村民为了生计挤进了进城或出国打工的行列，造成了河西镇留守儿童较多的现状。河西镇有 3 所小学，共有留守儿童 52 名，占学校学生总人数的 21.7%。当地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独特社会地位和发展模式造就了这一社会民生问题。



2.2 帮扶现状

据调查,针对河西镇的留守儿童的帮扶措施目前有以下3种。一是学校分管德育教育、生活的教师每周末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抚慰和帮助。由于教师对学生的情况了解较多,这一措施有助于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时刻掌握其思想动向,利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但由于很多留守儿童对心理咨询存在抵触心理,内心防备较深,很难获得他们的真实想法,甚至有可能给留守儿童造成心理负担。二是每年穆棱市妇联、团委组织一或两次大型关爱活动,为留守儿童赠送学习用具、衣物等。这类活动能够从政府的角度给予留守儿童帮扶工作很多支持,并达到了宣传呼吁的作用。但是由于活动的耗资较大,所以长期举办存在资金上的困难。此类活动覆盖范围虽广,但针对性较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困难。三是少数慈善团体和社会爱心人士一对一的资助与心理辅导。这种方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针对性也较强,但是难以持续,后续跟踪帮扶存在困难。

3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缺乏长效的帮扶机制

目前,获取有关留守儿童的信息主要依靠教育部门。但是,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学校教师难以及时追踪和收集有关本村、本乡镇所有留守儿童异动的信息。有效信息的缺乏导致难以建立长期性的帮扶机制,帮扶效益低下。以河西镇为例,帮扶团体在当地实施援助时大多蜻蜓点水,牡丹江市爱心协会的爱心帮扶活动以及牡丹江几所中小学与贫困留守儿童的“手拉手”活动,最终都不了了之。这些帮扶只着眼于短期效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短暂的“止痛”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这个社会“病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各界对留守儿童的持续性跟踪关注度不够,往往一开头热情高涨,后期不闻不问,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心理落差。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只有建立了长效性的帮扶机制,才能使药效直达“病灶”,实现“疗效”。

3.2 帮扶资源分配不合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深刻影响着教育和学校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教育市场,教育公平受到了来自市场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给教育带来了竞争、选择等新的社会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新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伦理诉求。然而教育部门和学校通常注重追求绩效,树立典型,以达到“示范”的效果,导致弱势留守儿童小学的有限资源不断流向“被树典型”的留守儿童小学,造成社会帮扶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以河西镇中心小学和五兴小学为例,两校距离仅100



千米,然而教育环境却相差甚远。中心小学占地面积为 2050 平方米,在校师生共 200 余人,有图书 456 本,微机室一间,体育器材若干。五兴小学仅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有 3 个教师,39 个学生,5 个年级。宿舍、图书阅览室、微机室、实验室均无。两所小学的基本情况对比如图 2 所示。去当地进行帮扶活动的慈善团体及个人中,近 80%都选择中心小学作为帮扶对象。由于帮扶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难以实现帮扶效益最大化。

3.3 家庭教育与社区参与力度不够

当前,关爱留守儿童的担子主要落在学校和教育部门头上,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人和社区参与力度不够。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身体状况、教育程度、教养方式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有很大影响。在河西镇,从监护人教育程度看,留守儿童监护人是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程度者的比例高达 38.5%。这对留守儿童学习和成长显然不利。儿童学习、安全、身体健康、营养卫生、心理发展等方面的责任几乎都推给了学校和教师。教育部门和学校承担了“无限责任”,家庭和社区缺乏深度参与,这是当前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中的一个误区。

在构建立体式留守儿童关爱网络中,学校、社区和家庭缺乏制度化沟通渠道,三者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功能没有充分融合和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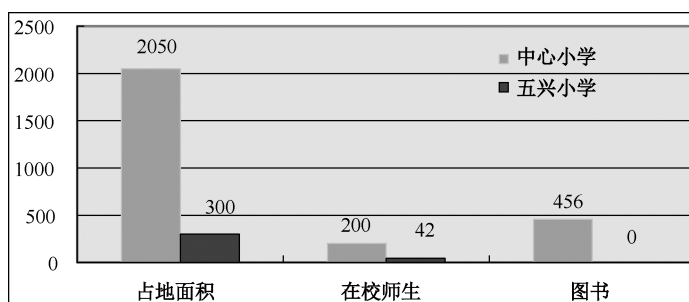


图 2 中心小学、五兴小学的基本情况对比

3.4 帮扶方式单一

近年来,随着留守儿童现象愈发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不少慈善团体、个人纷纷自发前往留守儿童聚集地进行帮扶活动。随着帮扶活动大规模地开展,帮扶活动中援助方式单一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直以来,各社会帮扶团体及个人对留守儿童的援助方式往往局限于捐钱、捐物、支教 3 种,而忽视了对学校周边配套设(如交通、通信状况)的改善。因此,帮扶活动只能在短期内起到明显效果,长期来看,则收效甚微。

目前,各级政府鲜有将留守儿童关爱和支持活动专项经费划入财政范围,长期支教缺少制度化支持和激励,导致学校和教师关爱留守儿童活动难以持久、深入。而正是由于乡镇留守儿童小学的教学环境与薪资待遇较差,所以导致当地师资力量薄弱,教师队伍的素质不高、水平有限,无法应用社会各界捐助的教学设备,导致资源浪费。

据调查,河西镇中心小学的留守儿童普遍没有上过实验课。但我们发现,其实学校拥



有占地 30 平方米的实验室和价值 4000 余元的实验器材。可是由于当地初中以上学历的教师仅占 24.7%，50 岁以上的教师占 46.3%。教师队伍的低学历与老龄化导致实验器材鲜有机会被使用。这反映出即使社会各界捐助硬件设施，但是薄弱的师资力量使这些援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河西镇五兴小学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五兴小学坐落于河西镇边缘大山深处，与当地留守儿童学校的典型代表——中心小学相距 57 千米。其中仅有 14.6% 的里程为水泥路、石子路，其余均为凹凸不平的山间土路。到雨季和大雪封山的时节，五兴小学与外界的交通基本处于断绝状态，孩子上学和外界沟通极为艰难。令人忧心的交通状况也给外界慈善帮扶团体进山援助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反观近年来五兴小学收到的援助中，90% 是捐款、捐物、校舍翻新和短期支教形式。学校周边配套设施则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学校师资力量并没有真正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的高投入也是摆在社会帮扶团体眼前的一个难题。

4 增强留守儿童帮扶实效性的对策

留守儿童帮扶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家庭、社会缺一不可，为进一步增强留守儿童帮扶工作的实效性，让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共享一片蓝天，健康成长，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4.1 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建立留守儿童政策实施的有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完善与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将政府、教育界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怀作为一项法律规定，政府工作决不能“打折扣”。明确相关职责，提高政府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实效性，保障留守儿童的权益；将关爱留守儿童的成效作为当地政府官员业绩评估和教师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此加强对乡镇留守儿童帮扶的制度规范和硬性约束；根据帮扶团体和个人对当地留守儿童的援助成效设立奖励机制，主要以荣誉奖励为主，如颁发荣誉证书、利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为表现极其突出的帮扶个人及团体颁发帮扶基金等。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奉献爱心，将帮扶留守儿童变成自觉行动，使关爱不止浮于表面。

设立关爱留守儿童的专项基金。基金来源有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列支，二是社会各方面力量捐赠。对于经济贫困地区，国家设立专项补贴基金，投入到这些地区的留守儿童援助项目中去，以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以此作为为留守儿童开展各项活动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如设立“留守儿童自强奋进奖学金”，对自强奋进的留守儿童实施成才对接关爱。为确保基金的健康发展，应积极建立留守儿童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聘请有关领导、相关专家和学者、企业家担任顾问，建立常设机构和联动组织。此外，基金会也应在银行设立账户，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基金管理规定的关爱范围和支出比例执行，不得



挪用。同时，不定期地接受当地及上级审计部门的审计和抽查，亦接受捐赠者的监督，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度。对重大情况和异常状况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严防资金使用上的违规现象。基金会也可邀请知名人士举办义演或义卖活动，促进基金的保值与增值。有了充分的资金保障，孩子们的生活、教育环境就能得到较好的改善，师资力量就能得到加强。同时，基金会也可在政府主导作用“打折扣”时作为政府的替代者，代替政府实施援助，关爱留守儿童，做关爱援助留守儿童的坚强后盾。

加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一要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以乡镇中心学校为核心、边远学校及教学点为支撑的辐射式教学网络，使教师从“学校人”变为“区域人”，为师资均衡配置创造条件；二要建立县域内教师校际交流制度，尤其要重视贫困留守儿童学校与重点学校之间的交流；三要提高留守儿童学校教师的待遇，在评优、职称评聘、交通补贴等方面要向留守儿童学校教师倾斜；四是每年有计划地开展留守儿童学校教师轮流培训，小科教师、生活教师、心理辅导教师的业务培训更要常态化、科学化；五是强化激励机制，利用留守儿童专项发展基金，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激励农村学校和教师积极投身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活动中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提高留守儿童的综合素质对于国家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只有壮大乡村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才能在提高留守儿童综合素质、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取得进步。

改善偏远山村学校的周边环境。例如，本级政府自行筹措资金或向上级申请修路补贴，进一步推进“村村通”工程，修缮公路，形成完整的道路交通网。在偏远山区，每隔一段距离设立一个路面监视点。在雨季和雪季等道路、桥梁受损几率大的季节加强监控。遇到道路损毁、桥梁冲塌的情况能够及时修缮，保证孩子和进山人员的安全。架设信号塔，建设覆盖山村学校的信息网络，保证山村学校能与外界保持顺畅的联络，这些措施在改善学校周边条件的同时也为进山帮扶团体深入进行帮扶活动扫清自然障碍。

4.2 构建三位一体的关爱网络

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共同发力，才能有效保障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在学校教育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引导社会各界，在帮扶时不仅要关注典型的留守儿童学校，更要通过实地考察，向环境更为恶劣的留守儿童学校倾斜，对弱势留守儿童小学实施“优先扶持”政策，保障其具备国家教育政策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办学条件，使留守儿童充分享受符合基本标准的教育。要用对待强势和弱势的不平等手段实现帮扶资源的合理分配。通过在教育观念与制度方面的创新，打破市场与教育公平之间的矛盾局面，要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教育环境下保障教育公平，而不是走上非此即彼的两端。利用市场机制建立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弱势留守儿童小学的公平保障体系，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建立慈善助、贷学金制度，同时鼓励民间建立慈善性质的基金会组织，吸收民间资金解决弱势留守儿童学校的实际困难。

在家庭教育方面，留守儿童的父母多为文化程度较低、能力相对较弱的务工人员，再加上父母长期远离孩子，其监护人多为隔代亲属，家庭教育的缺失显而易见。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尤为重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按规定切实办好家长学校，在留守儿童专项基金的支持下，选择优秀的班主任担任家长学校的教师，同时聘请

退休的老教师、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共同兼任家长学校的教学工作，通过定期举行培训班、座谈会、报告会等途径，加强对孩子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的教育和培训，使之转变思想观念和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和监护孩子的水平。给积极配合、表现优异的家长颁发证书，授予“模范家长”荣誉称号，以此增强家长努力学习的动力。通过社会的资金援助和教学参与、学校的教学方案制定和教学对象统计、家庭的积极配合与自我反思，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三位一体关爱网络，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在社区关爱方面，要鼓励新型农村社区发挥作用，兴办“留守儿童之家”，动员社区热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中，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当孩子的“代理家长”“爱心妈妈”。媒体也要持续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科学的教育理念，宣传帮扶留守儿童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4.3 建立科学长效的帮扶机制

夯实帮扶工作的基础。负责留守儿童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要协调建立村、镇、县三级留守儿童信息库，为外来帮扶团体和个人提供信息支持，为宏观决策服务。

各学校要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联系卡制度。联系卡基本信息包括留守儿童和家长姓名、家庭详细住址、联系电话、临时监护人地址和电话等，方便社会团体了解留守儿童的信息，与孩子结成可行可靠的“一对一”帮扶关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直给予帮助和关爱。

此次调研课题组帮助学校收集了当地留守儿童的资料，建立了规范的信息档案，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河溪镇向阳小学留守儿童的基本信息数据统计表

年级	学生姓名	年龄	家长姓名	双亲家庭	留守原因	留守看护人	年龄	心理状态	学习情况行为习惯
学前	张鑫怡	5	父 张建		父母离异， 母亲出走	爷爷 奶奶	57 52	性格内向 不合群	学习兴趣 不浓
	张晶怡	5	父 张建		父母离异， 母亲出走	爷爷 奶奶	57 52	性格内向 不合群	学习兴趣 不浓
学前	郑世豪	6	父 郑项伟 母 兰丽	是	母亲在 日本打工	父亲	32	乐观向上 活泼	聪明好学 乐于助人
一	谷启鹏	7	父 谷朝富 母 芦向丽	是	父母在 日本打工	爷爷 奶奶	65 64	乐观向上 团结同学	积极上进 勤奋好学
	谷启羽	7	父 谷朝春 母 于双艳	是	父母在 日本打工	爷爷 奶奶	65 64	自律性差 散漫好动	上进心不强 散漫好动
	王海鹏	7	父 王春林 母 杨金侠	是	父亲在日本打工 母亲在韩国打工	姑姑	37	性格内向 智力发展缓慢	学习意识 不强、习惯不良



续表

年级	学生姓名	年龄	家长姓名	双亲家庭	留守原因	留守看护人	年龄	心理状态	学习情况行为习惯
二	张佳义	8	父 张传斌 母 杨春霞	是	父亲服刑	母亲	37	心理健康	学习态度好成绩不稳定
	崔宇彤	8	父 崔长斌 母 赵波	是	母亲在俄罗斯打工	父亲	48	心理健康	成绩优良积极上进
三	郑倩文	10	父 郑项伟 母 兰丽	是	母亲在日本打工	父亲	32	天真无邪积极进取	学习刻苦品学兼优
	王施媛	10	父 左家文 母 王金维	是	父母离异跟随外公	外公	63	快乐上进乐于助人	学习专心有礼貌
	卢 强	10	母 李巧玲		父亲去世	母亲	41	聪明贪玩天真好动	学习认真不甘落后
四	臧传俊	11	父 臧海运 母 安翠		父亲服刑 母亲离异出走	外公 外婆	55 54	聪明好动 顽皮淘气	成绩一般 积极向上
	初启发	11	父 初立龙 母 曹利红	是	父亲在日本打工	母亲	35	思想进步 劳动积极	学习一般 性格开朗
	杨芳宇	10	父 杨加英 母 王凤兰	是	母亲在日本打工	父亲	33	思想进步 懂事好学	成绩较好 勤学上进
	李佳欣	11	父 李明山 母 刘花苹	是	父亲在俄罗斯打工	母亲	44	心理健康	学习懒惰 成绩一般
五	于文胜	12	父 于双成 母 白洪莲	是	父母在俄罗斯打工	爷爷 奶奶	63 60	以自我为中心 不自立	学习一般 淘气好动
	李可平	12	父 李福军 母 巩丽影	是	母亲在日本打工	爷爷 奶奶	59 60	吃苦耐劳 积极向上	勤奋好学 成绩优异
	张 灿	12	父 张传斌 母 杨春霞	是	父亲服刑	母亲	37	尊老爱幼 乐于助人	学习较好 遵守纪律
	郭洪全	12	父 郭天祥		父母离异 母亲出走	父亲	41	坚强独立 乐于助人	学习一般 认真听话
六	马云龙	12	父 马春良 母 李如霞	是	父母离异 母亲出走	父亲	41	性格孤僻 思想健康	学习努力 遵守纪律
合计	20 人	单亲家庭	5 人 占 25%	离异家庭	6 人 占 30%	心理 健康	14 人 占 70%	成绩较好	10 人 占 50%
市直 就读	学前 6 人 小学 18 人	留守 儿童	1 人 4 人		0~4 岁 未入学儿童	63 人	留守 儿童	7 人	

表 2 河西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的基本信息统计表

班 级	学 生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家 长 情 况			
				父 亲 姓 名	所在城市/国家	母 亲 姓 名	所在城市/国家
一	赵文浩	男	2006.05	赵 岩	北 京	刘 丹	北 京
一	赵文博	男	2006.05	赵 岩	北 京	刘 丹	北 京
一	邓文杰	女	2006.07	邓枝全	哈尔滨	李俊华	日 本
一	辛 蕊	女	2006.11	辛宗莹	日 本		
一	杨春鹏	男	2006.03	杨 明	韩 国		
一	娄嘉乐	男	2006.09	娄明辉	哈尔滨	康翠萍	哈尔滨
二	林世国	男	2005.01	林继光	山 东	李 莉	山 东
二	李文博	男	2005.01	李景刚	俄罗斯	尹学娟	俄罗斯
二	吴昶利	男	2006.04	吴景顺	牡丹江	曾 焱	山 东
二	盛 雁	女	2005.02	盛祥利	新 疆	闫素芳	新 疆
三	李心雨	女	2003.12	李景刚	俄罗斯	尹学娟	俄罗斯
三	刘 蕊	女	2004.04	刘树国	俄罗斯	张爱玲	俄罗斯
三	单玉捷	女	2003.09	单 章	俄罗斯	张 芬	俄罗斯
三	刘梦晴	女	2003.10	刘福暄	山 东	刘春花	山 东
三	刘胜坤	男	2004.04	刘福海	哈尔滨		
四	冷学权	男	2003.02	冷德军	林 口		
四	李宝鑫	男	2004.07	李永棋	唐 山		
四	迟雨萌	女	2003.08				
四	崔美花	女	2003.02				
五	栾博然	男	2002.08	栾昌礼	俄罗斯	石雅瑞	俄罗斯
五	于佳伟	女	2002.09	于铁军	大 连	魏国华	大 连
六	栾然旭	女	2000.10	栾昌学	俄罗斯	李秀云	俄罗斯
六	于宝川	男	2001.12	于秀洪	山 东	尹明玉	韩 国
六	袁博艺	男	2000.06	袁宏波	山 东	郑海英	林 口
六	顾广宇	女	2000.05	顾元清	俄罗斯	刘玉玲	俄罗斯
六	周银龙	男	2001.03	周忠祥	日 本	刘艳香	日 本

推广一对一帮扶模式。一方面各帮扶团体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帮扶基地，方便日后的长期援助，通过新媒体与当地留守儿童和学校建立联系，充分利用新型通信工具方便快捷的特点，实现长效帮扶。另一方面，建立相对稳定的“爱心妈妈”队伍。学校要发挥好桥梁作用，依据本校留守儿童的情况和数量，确定相应的“爱心妈妈”，根据“爱心妈妈”的意愿结成“一帮一”或“一帮多”的对子，定期邀请爱心妈妈来校和留守儿童面对面沟通感情，鼓励留守儿童经常向“爱心妈妈”汇报成长情况。对于新出现的留守儿童要及时确定“爱心妈妈”与之结对帮扶。

在学校开辟留守儿童家园。在每个留守儿童学校建立一个留守儿童活动区，主要设有交流室和娱乐室，方便爱心团队和“爱心妈妈”随时来校与留守儿童沟通交流，也为放学后无处可去的留守儿童创造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建立城市小学与乡镇留守儿童小学之间的长期结对帮扶机制，让孩子们建立友谊，共



同成长。通过同龄人之间的长期交流与帮助，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达到性格互补、资源共享的效果。

帮扶活动要体现计划性、时效性。留守儿童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决定了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要有计划性和时效性。从整体上来说，对于每年组织大型帮扶活动的主题及其效果都要有目标设定和具体措施。对留守儿童个体来说，给予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的时机也有其规律性。无论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还是广大爱心人士，都要付出持续的努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伴随着一个个中国梦的实现，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留守儿童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 于颖,张友祥.论完善农村弱势群体帮扶机制的基本途径[J].经济纵横,2005,(10): 28-47.
- [2] 刘复兴.市场条件下的教育公平——问题与制度安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3-29.
- [3] 董溯战.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国家责任[J].宁夏社会科学,2011,(6): 70-74.
- [4] 刘欣然.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政策问题浅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1,(5): 50-51.



“棒棒军”的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以重庆市渝中区为例

第九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棒棒军”的生存状况调查研究实践团

指导教师：毕丞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重庆，既是“江城”，又是“山城”，起伏错落的道路交织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爬坡上坎，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农村，沿街揽活，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依靠搬运、卸货等体力劳动来获取收入；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困难，工作艰辛，但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的是那股积极乐观、不言放弃的山城血液。他们，被重庆市民称为“棒棒军”，也成为当地独有的文化符号。

2014年4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万州港考察时接见了棒棒代表，他深情地说：“你们很了不起！每一分钱都是流汗挣来的，是中国人民勤劳的象征。”并表示，推动中国发展需要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2016年，在央视人气综艺节目《了不起的挑战》中，同样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明星学做棒棒”的别样职业体验，该节目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关注。早期，更有中央电视台的《重庆与世界》栏目连续7年跟踪播出了一名棒棒成长过程的纪录片《棒棒刘晓箫》。2000年于全国热映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也深刻刻画了码头搬运工人因共同的生活和梦想携手合作、团结发展的奋斗历程，让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庆“棒棒军”这一群体有了更多正能量、全方位的了解。

“棒棒军”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工的代表，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底层劳动人民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他们默默干活，辛勤劳动，却难以发声诉说自己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深入“棒棒军”群体，以最贴近他们的姿态对其工作生活轨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一群体的心声，显得至关重要。

本研究立足于反映以“棒棒军”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及其社会保障情况，富有人文关怀色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法

在近距离接触“棒棒军”群体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检索相关文献，对我国农民工的特征及生存状况进行了初步的了解，为即将开展的调研打好理论基础。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广大学者更倾向于将目光聚焦在农民工这个整体上，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同样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群体的研究层出不穷，然而直接以重庆“棒棒军”为对象的社会研究却寥寥无几。

“棒棒军”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是自然、历史、文化交织作用产生的特有人群，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文化符号。在与进城务工农民具有大部分相同的特质之外，“棒棒军”还具有其独特的自身属性，如劳动时间和场所相对灵活、劳动安全保障缺乏、劳动收入兑现快、劳动雇佣关系简单以及受现代社会发展冲击大等。这些特征需要更准确、更深入、更具有证明力的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课题应运而生。

我们的调查研究以“棒棒军”为基点，将以“棒棒军”为代表的劳动群体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众，所得成果不仅服务于“棒棒军”这一群体，更是为研究流动性底层劳动人民提供一定的帮助。

1.2.2 观察法

深入“棒棒军”群体中，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我们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团队抵达重庆后，通过团队中的本地成员与相关区域的“棒棒军”取得联系，加入“棒棒军”团队“拜师学艺”，共同劳动，这是我们调查过程中最为艰苦的部分，也是深入、全面、客观了解“棒棒军”生活的切入点。团队成员分为3组，固定跟随3位棒棒师傅，持续工作5天，从清晨重庆还是一片寂静时我们就启程跟着师傅上货，待夜幕降临才疲惫收工，这些经历让我们亲身实践了“棒棒军”的雇佣关系、结算方式、劳动强度和工作风险，更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一群体真实的工作状态和生存压力。

1.2.3 访谈法

为了深入分析研究现代社会下“棒棒军”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采用了访谈法，对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师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对他们工作时间和收入有了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还跟踪采访了“棒棒军”的家庭成员，为我们调查“棒棒军”的真实生活状况奠定了基础。透过与他们的谈话及家庭走访，我们更感受到“棒棒军”对子女的未来发展充满期望。与此同时，敞开心扉的棒棒师傅们跳出访谈的圈限，自由地与我们分享了不少一路走来的故事，让我们在研究以外，对这一人群心生敬佩之意。

为了使调研结果更具全面性和权威性，我们还借助为“棒棒军”开展众筹活动、请他们免费吃面的机会，在为“棒棒军”送去微薄温暖和支持的同时，与更多的棒棒师傅一对一交谈，以他们吃饭休息的时间为契机，尝试与棒棒师傅交流，了解到尽可能多的情况。



1.2.4 问卷法

为了了解重庆市民对棒棒群体存在的态度及棒棒群体在社会中的认可程度，分析棒棒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社会人群心目中的基本形象，我们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卷问题，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张，收回 460 张有效问卷，都是有质量保证的反馈结果。从反馈中我们不仅了解了重庆人眼中的棒棒形象，更可以透过数据预测到棒棒这一群体未来发展的前景。

2 “棒棒军”的发展历史和群体特征——“两江孕育而出，山城肩挑而起”

2.1 挣苦力求生存的发展历史

谈及棒棒的由来和发展，可以从重庆的码头说起。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水运枢纽。对于两江环抱的重庆来说，码头也就成这座城市的标志。老重庆影像志《老码头》中有这样一段话：巴国故都，自古扼踞水路要冲。两江汇流，万民累居，商旅辐辏，百业兴旺。有人说，没有码头，就没有今天的重庆。同样，没有两江江水，没有码头，也就没有如今的棒棒，江水码头孕育出棒棒，棒棒肩挑起这座山城。

棒棒的“祖先”，可以直接追溯到重庆旧时的码头工人，当时重庆旧时的码头不同于天津和上海的码头，重庆码头的吞吐量不是很大，所以在重庆码头谋生的人，他们的收入都很低。

文化名人张老侃说：“当时，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在此集散，所以需要大量的搬运劳工。新中国成立前的历朝历代，许多灾民为求温饱，养家糊口，从四面八方涌到山城闯码头，凭一身劳力肩挑背磨将堆积如山的货物搬运进城，疏散各地。这些人以挣苦力求生存，如蚂蚁搬家一般将雇主的货物顺着一级级陡立的石阶搬运上山。旧时重庆城的搬运夫是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包括码头的货物搬运、轿夫、挑水夫、建筑工人等。”

旧重庆自来水供应不足，要靠挑水夫从河边往城里挑水。那时，小什字一带的人吃水用水都要从千厮门河边挑上来。有一幅历史照片，是成群结队的挑水夫在朝天门码头上挑水，那场面令人震惊。抗战时，徐悲鸿来到重庆，为挑水夫的苦难和精神所感动，还专门画了一幅国画，并题诗：“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

棒棒的发展历程，粗略地可以分为开埠时期、抗战时期和改革时期这 3 个阶段。开埠时期可以算是棒棒的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重庆海关建立于公元 1891 年 3 月 1 日，这一天，重庆正式开埠。开埠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外国轮船及上面的大量的商品，那么考虑到当时的机械化水平以及重庆的复杂地形，要把这些货物运到内陆上，就需要数量极其庞大的搬运工，在那个以水运为主的年代，“棒棒军”的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抗战时期棒棒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他们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抗战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战役的功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作为棒棒的后代，在抗战中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的危险，经过 40 天将大量人员和 10 万吨物资由宜昌运到重庆，



到达之后，“棒棒军”用肩挑背磨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了这一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

改革时期重庆第二次大规模地出现棒棒。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重庆工业化、城市化进展迅速，大量人口向重庆城区涌入，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重庆拥有更大的对“棒棒军”的需求，这一轮“棒棒军”的“勃兴”，在 1990 年前后达到顶峰。在后来我们接触到的一位棒棒告诉我们，90 年代初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棒棒”，当时“棒棒”群体展现出勃勃生机。同时在这个时候，“棒棒”的分布也不仅仅局限于码头附近。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批发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附近也开始聚集了大量棒棒，他们在这些地方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拎货物和带路，车站附近的雇主一般就是乘客，那时“棒棒”是廉价劳动力，对于刚来重庆的人，复杂难找的道路使得他们宁愿花点钱雇用个“棒棒”带路，顺便还能帮忙拎东西；而在商场附近则是商店老板早晚装卸货物时雇用“棒棒”运送。

时间推演到现在，“棒棒军”的困境日益显现。如今重庆的城市格局、交通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例如，在重庆火车站，乘客可以直接搭乘地铁，根据地图引导轻松到达目的地。并且随着智能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手机导航已经可以帮助大多数人解决山城寻路的问题。而且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的一大弊端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对于初抵重庆的旅客游人，相信陌生的“棒棒”已成为一件确有难度的事情。不过批发市场附近的“棒棒”目前的状况还不算太糟，除了竞争大之外，基本收入还是可以保证的。

总而言之，“棒棒”群体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他们无疑已经成为重庆这座山城的独有名片，有些人或许觉得“棒棒”的存在与否跟他无关，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但是棒棒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力，更是山城重庆的一种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2.2 慢增长趋老龄的棒棒现状

我们在进行调查之前，查阅了有关资料。相关资料显示，2010 年“棒棒军”的规模有 30 万~40 万人，当年年度人口普查显示重庆市总人口约为 3016 万人，“棒棒军”的数量占重庆市总人口的 1.2% 左右。根据访谈结果，我们了解到棒棒群体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并且很少有年轻人成为棒棒。

基于前期调查，在众筹吃面活动当天，我们对前来吃面的 150 多位棒棒进行了数据统计，获取了年龄、性别、农村土地拥有情况、从业时长、是否有缴纳养老保险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得出了以下的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庆“棒棒军”的基本情况统计表

调查对象	分类标准	人数	所占比例/%
年龄	39 岁及以下	6	4.0
	40~49 岁	45	30.0
	50~59 岁	67	44.7
	60 岁及以上	32	21.3
性别	男	147	98.0
	女	3	2.0

续表

调 查 对 象	分 类 标 准	人 数	所占比例/%
农村土地拥有情况	有	117	78.0
	无	33	22.0
从事棒棒时间	5 年及以下	8	5.3
	6~10 年	16	10.7
	11~15 年	62	41.3
	16~20 年	49	32.7
	21 年及以上	15	10.0
养老保险缴纳情况	已缴纳	11	7.3
	未缴纳	139	92.7

从这个统计数据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4 点明显的结论。

(1) 棒棒群体的年龄趋于老龄化，6 成以上的棒棒年龄集中在 50 岁以上，而 60 岁以上的人数又相对较少。

(2) 棒棒群体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样本中女性只占了 2%，棒棒的工作内容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3) 棒棒群体中有 8 成以上从业时长超过 10 年，对该工作的依赖性较强。

(4) 棒棒群体中有 9 成以上的人未缴纳养老保险，安全防范意识薄弱。

2.3 分类别划区域的工作类型

经调查，重庆“棒棒军”的工作类型和地点分布呈现分类别、划区域的特点。主要有以下 5 种类型：码头型、大型批发市场型、车站型、路边商店型和零散型。

第一类，码头型棒棒，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在重庆市的货运码头，渝中区被嘉陵江和长江环绕，在夜间，两江上有很多游览两江的观景船，也有穿梭在长江沿岸城市的客运旅游船。这些船上的生活物资、食物、淡水就是由棒棒们一件一件挑上去的。棒棒们挑货的时候会用两根一长一短的绳子把货物绑起来挂在粗竹棒两端，长端在台阶低处，短端在台阶高处。棒棒师傅说这样可以让上台阶更加省力。棒棒师傅们还有独特的打结技艺，他们甚至可以用一根绳子把一颗西瓜牢牢绑住。在我们调查的一个叫作“世纪天宇”号的观景船上，送货的师傅说，每隔两天他们的船就要停靠在重庆港八码头上货。因为游船数量较多，并且一次性上货数量大、上货时间固定，所以这部分码头棒棒一般有自己的工作团队。我们调查的陈师傅带领的团队有 11 位棒棒，有 3 艘游船的货是他们负责搬运的，基本上每天他们都有固定的运货工作，每次运货大约有 4 吨左右。这一类码头棒棒也成为棒棒军里工作最固定、工作强度适中、最具团队属性的一类棒棒群体。

第二类：大型批发市场型棒棒，他们的主要工作地点集中在服装批发市场、小商品城、电器城等大型百货中心。这类中心的聚集地就是朝天门商圈。商场的店家每天都要进货和出货，棒棒们充当了朝天门商圈的血液，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货物送到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工作相对零散，没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一般商家们会雇用固定的几个棒棒来做他们的搬运工。秦师傅是在朝天门做了 30 年的老棒棒，他说：“我们就是通过电话联系，他们什



么时候要上货，会提前告诉我们，大多是在 8 点钟商场开门之前或者是下午 4 点钟商场关门之后。不过一天 24 小时几乎每一个时间段都有棒棒们在工作，有些人白天出来，有些人晚上出来。”经过我们的观察，该区域最繁忙的时间是在凌晨 5 点左右，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各种货车停在路边，棒棒们肩扛手拿，搬运货物。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队员们突然间觉得自己仿佛身处电影里看到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街上。棒棒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做工，天蒙蒙亮，整个朝天门大街上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光着膀子的汉子。朝天门有一个长达 100 米左右的超长台阶连接了下边的码头和上边的商圈。这些棒棒们会肩扛 200 斤的包袱上下台阶，汗水、吆喝声、搭在脖子上的白色毛巾、嘴里叼着的 6 块钱一包的“朝天门”烟、脚穿裂开的褪色拖鞋，这一幕幕情景还原了大家心里对朴实劳动者这个角色的想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干活虽然很累，但是在干完之后，一擦汗，给同伴递上一支香烟，相视一笑，满眼流露出的是喜悦和轻松。大约到了 7 点钟，货车渐渐离去，商场开始营业，街边摆起了早餐小摊，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路人。这些棒棒穿上衣服，拿起自己的竹棒，消失在人群之中。这部分的工作随着季节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夏秋季是淡季，服装运输需求小，他们上货的活就少，几乎处在“失业时期”。何师傅说：“就像现在这种热天，一天能赚 20 块钱就是多的了。”但是到了冬春季，服装疯狂上新时，便是他们工作的旺季。冉师傅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搬运 2~3 吨的货，赚 200 多块钱，但是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工作、劳动强度随季节性变化大，工作群体相对较小且工作地点不固定是这一类棒棒的特点。

第三类，车站型棒棒，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火车或长途客运站，这一区域的棒棒相对零散，没有固定的工作团队，他们做着相对原始的棒棒工作，帮助下车后提着行李的旅客提拿行李，跟着旅客一起把行李运送到目的地。这里的棒棒还会充当向导，由于重庆市是山城，道路情况复杂，加上该区域还是当年的阶梯式道路，路与路之间高低不同，所以找路很困难。有些乘客需要在不同车站之间换乘，棒棒就帮他们提行李，给他们带路。棒棒们一般会坐在路边的树荫下，等到车到站，在路边停靠，他们就会主动聚集过去，询问下车的旅客是否需要帮助，但是他们渴望的眼神得到的大多是冷漠的回应，客人的脸上分明地写着“不相信”3 个字。一个叫作老李的棒棒告诉我们，现在在这里做活越来越难了，这几年老人碰瓷的事件频繁发生，旅客们都不敢让我们这些老人做活了。外地人根本不敢让我们碰他们的行李，但是在过去大家都是很愿意相信我们的。看着这位老人佝偻的身影，拄着棒棒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令人感觉十分落寞。这一类棒棒的工作强度普遍不大，没有一同工作的团队，随意性很强，工作收入不高但也足以满足生活。

第四类，路边商店型棒棒，他们的工作地点大致是路边的门市部、零售店、面包店、酸奶店等小型商店。他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些商店上货或者是整理库房。我们在弹子石调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作石老三的棒棒，他做了自己的名片“重担棒棒 石老三”，名片上有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弹子石这一片路边的门市部散发。石老三组建了一个小型的棒棒团队，他负责接活，之后他联系这个团队里的棒棒去做工。这部分棒棒的工作相对固定，劳动强度适中，一般有自己的劳动团队。

第五类，零散型棒棒，他们在路边、超市门口、菜市场门口等地方帮助出门买东西拿不动的家庭主妇提东西。由于重庆市的上坡路和下坡路比较多，提拿重物对于家庭主妇或是老人来说比较困难，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便利。另一部分是充当短途快递员，

帮助商家把买家买的东西送到目的地，或者是帮助商家把发往外地的货送到货运部。这部分棒棒的工作模式是最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的形成完全是由于重庆市独特的地形因素。这部分棒棒是最零散的、工作最不固定的，但是小型商店型棒棒在完成自己在商店的工作后也会拿起自己的棒棒来路边等活。

2.4 男女别遭歧视的性别分布

在前期查阅资料时，不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在文献中都不曾发现过女性棒棒的身影，而在我们亲临实地以后却见到了星星点点的女性棒棒，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相比于随处可见的男性棒棒，女性棒棒可以说是稀奇的，“棒棒军”在性别上的数量差异可谓巨大。以在朝天门请“棒棒军”吃面那日为例，当日吃面的棒棒共有150人，而女性只有3人。

通过与实践期间遇到的“女棒棒”的交流，我们了解到了“女棒棒”这样一个特殊的棒棒群体生活和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2.4.1 家庭负担重

出来工作的女性棒棒，有些是为了贴补家用，而更多的其实是家中的支柱。其中有一位姓卢的女棒棒，得知她今年52岁，2000年开始进入棒棒行业，家中躺着已经瘫痪了10余载的丈夫。卢女士说：“丈夫之前就是做棒棒的，一次意外事故让丈夫瘫痪在床，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大笔的医疗费用。”卢女士自己之前不过是在家务农的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并且无专业工作技能，有的只是这一把子的力气和打不倒的韧劲。17年里，卢女士靠做棒棒和其他零活挣钱，勉强维持着家里的全部开销，工作之余，她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卢女士说她早已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现在她只想多接一单活，争取可以改善家中的伙食，若还能有个温暖的窝，她就很满足了。

2.4.2 性别遭歧视

在棒棒这样一个以原始劳动力为依托的行业中，性别差异尤为明显。力量差异一直是自古以来形成性别歧视的重要因素，在访谈商店老板、雇主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直言不讳，宁愿自己去搬货也不愿意雇用女性棒棒，他们认为女性棒棒力量小、怨言多，倘若摔坏了东西而对方又是弱势群体，容易造成以强欺弱。而事实上，对女性棒棒存在诸多顾虑的商店老板们往往并没有雇用女性棒棒的经历，之所以形成这种想法，大多是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导致的。各个行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性别歧视，但棒棒行业的性别歧视仿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2.4.3 身份羞辱感

来到重庆城区做棒棒的女性无一例外均来自乡村，对农民的排斥是都市的本性，而作为“棒棒中异类”的女性棒棒，对这种羞辱感体验得更加深刻。一位姓代的女棒棒说，刚刚入行的时候，被路边的人指着说“这女的怎么也出来当棒棒”。这时候，心底产生的羞辱感导致她们担心被别人看不起而拒绝交往、对别人的态度过分敏感、藏匿自己的身份……



说到孩子，她说自己上小学的儿子不好意思向同学介绍自己的妈妈。可见，这种羞辱感不止属于棒棒的从业者，也影响到了家人。

2.5 随季变难稳定的收入状况

棒棒的收入情况大体上是随“季”应变，这源于不同的用工季需要的棒棒工作量不同，就人数最多的朝天门商圈里的大型批发市场型棒棒而言，服装批发比较火热的秋冬季节是他们的工作旺季。一般来说，一天最少可以赚到100元钱，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到300元。但是收入是与劳动量挂钩的。正如上文提到的冉师傅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搬运2~3吨的货，赚200多块钱，但是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李师傅说：“我们干得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卸6车货。”旺季时，棒棒们一个月挣到30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夏季，也就是我们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多数棒棒都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吹冷气聊天，很少能找到活。棒棒师傅们把每天这样出来等活叫作“出来耍”。况且找到的活收入也不高，如帮助店家送货到货运部，一单最多5元，还有的就是帮助大厦里的商家做些拆货架这样的装修工作。这种工作同样收入不高，并且危险性较大。在我们调查的其中一天，刘师傅和他的朋友林师傅一起帮助一个商家拆货架，早上大概9点钟的时候，林师傅站在椅子上拆货架，因为穿着拖鞋打滑，从椅子上摔下来，左脸颊撞到地上的木板，去了医院。刘师傅在拆电线的时候不知道电源未切断，把电线扯断的时候电线竟然蹦出火花，幸好空气闸及时切断，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危险的工作，店家最后给了刘师傅400元，刘师傅自己要负担250元的运输清理下来的货架的费用。但这样的工作在淡季已经是棒棒们的“美差事”了。在淡季棒棒们一个月赚到1500元就很不易了。和朝天门商圈的棒棒不同，码头型棒棒的收入旺季是旅游人群增长的春夏季，这个时候江上的游船生意正火，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有上货的工作。平均下来一个月可以赚到2000~3000元。但是到了冬季，游船生意不如夏季火热，上货的工作会相对减少。但是码头型棒棒的淡季不会像商场型棒棒那么惨淡。码头型棒棒的工资收入是最稳定的一批。最后就要提到车站型棒棒和零散型棒棒，这两类棒棒的收入相比前3种棒棒较少，收入零碎。月平均收入在1300元左右，只能用来维持生计。

2.6 强骨气守信义的山城血液

作为特殊的农民工团体，棒棒是重庆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来渝考察时曾赞扬棒棒“负重前行”的精神，并表示，推动中国发展需要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这使得更多的人第一次认识了棒棒这一人群，大家纷纷为“棒棒军”这一劳动群体点赞。然而，在银幕之外，棒棒工作时是否真的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在棒棒的心底，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在重庆这所大都市里的身份的？为此，我们对棒棒在都市中的自我身份认知进行了调查。

大型商场里的商家让棒棒运货到自家店里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临时有一批货送过来，这时老板会直接在商场门口找两个棒棒帮忙，谈好工钱之后直接带着他们把货送到自家店铺里；另一种是定时有货车货船前来供货，这时一般不需要商家自己出面，由商家



雇佣的棒棒长期替商家联系。钱师傅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都很相信我们，直接把库房的钥匙给我们，我们一早替人家把货运进库房就走，其他东西都不会动，我替这个服装店干了半个月之后，老板就不用费心上货了。”和钱师傅一同的王师傅也抢着告诉我们：“我这里送着三四家库房，这是对咱们棒棒的认可呢！”棒棒以拥有库房钥匙为荣，揣着钥匙便是揣着信任，也是揣着一份满满的责任。

在我们之后举办的网络众筹请棒棒吃面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前来吃面的棒棒都会向我们打听清楚，这一笔用来请他们吃面的钱是哪里来的，如果是我们父母的钱，那他们宁可不吃，我们向他们再三解释了什么是网上众筹，他们才放心吃面。一位年纪大的棒棒在我们面摊快要收摊时踌躇不前，我们上前询问才得知，因为给雇主送货时雇主迟迟没有到来，而按照棒棒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在雇主到来之前，棒棒不可以留下货物擅自离开，所以才在面摊活动规定结束时间之后到来，他不知道是否还能吃一碗小面。我们给这位守信用、有责任心的棒棒又加了一碗面，他很感动地拉着我们说：“真的是莫大的福气！”

由此可见，棒棒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收入的微薄和工作的卑微而放弃对自身精神层面的管理，没有停止过对美好品质的追求，知荣辱明是非，以他人为己任的自豪感驱使着他们的责任心，在工作中发光发热。尽管生活窘迫，但他们深谙贫贱不能移的道理，不能做不仁不义之事，即使是一碗小面，他们也告诉我们不能用父母的钱，他们靠自己的汗水赢得明天，他们的腰被货物压弯，但他们负重前行的精神在这世间顶天立地地站了起来。他们血液里的骨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都有的骨气，虽然抵抗不了五风十雨，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但骨子里的不屈不挠一直在说着：“不属于我们的，就不能去要。”

2.7 常乐观有奔头的生活信念

尽管社会地位不高，但在工作中棒棒都能得到重庆本地人的认可和信任，在劳动过程中，也都能保持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品质，这是维系棒棒继续工作的重要情感纽带之一。除此之外，子女在城市里能得到高水平的教育也是他们愿意留在重庆继续生活的重要原因。

包括棒棒在内的大多数农民工的人生目的就是最朴实的对健康、对平安的向往。而信仰要高于一般的生活目的，应该具有稳定性、超越性和终极性。所以信仰即由自身衍射到家庭，缩小到子女。既然信念有着将来时态的取向，但这个将来不是自己的未来，也不是自己的来生，而是对下一代的期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所有付出无足轻重，自己的生活现状能否得到改变也并不重要。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并尽可能地为一代实现这种期望打下更好的基础和创造更好的条件。这表现在为子女而外出打工，不惜支付比在农村高得多的费用让子女在城市入学，帮助子女谋得体面的职业，倾其所有为子女在重庆购房等方面。在对子女未来的考虑上，棒棒们如出一辙地表示“绝不让娃捞棒棒”，我们能理解，毕竟零散人力搬运业的社会地位低下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农民工们勇于走出山村，靠自己的打拚争得了改变子女生活轨迹的基本物质条件，也因为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改变了他们对子女的期待的具体内容。不变的是子女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是他们超越苦难的精神动力和信念。

也正是对子女的教育充满希望，棒棒即使工作得再辛苦也有奔头。晚上随冉师傅一起回家吃饭，冉师傅带着他的小儿子和我们一起玩，他温柔又宠爱地看着小儿子，一天的疲



意仿佛在此刻都烟消云散。“再辛苦也要让娃读到大学，只要他能好好念书，我做什么都值得了。下个月我们这里的房租要从 500 块钱涨到 600 块钱，我已经不打算住了，我想换一个离娃读书近的地方，虽然贵一些，但娃念书会方便多了，啥都值得。”

一支冰棒让我们和冉师傅的小儿子亲近了起来，他告诉我们日后他要做一名警察，我们问他是不是因为做警察特别威风，他腼腆地笑了，小声说是为人民服务。他说不想让爸爸再做棒棒，不是因为怕班上同学嫌弃爸爸干着又脏又累的活，而是心疼爸爸太辛苦。贫穷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变这一家子的其乐融融，也不能阻碍任何一个平凡人感知幸福。

3 现代社会发展对棒棒群体的冲击——从单一传统到多元便利

3.1 城市交通日益便利

自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是，对于棒棒们来说，这可能恰恰是“噩梦”的开始，因为日益便利的城市交通设施导致棒棒们工作的机遇大大减少，棒棒的劳动付出变得愈发廉价。

从实际情况来看，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变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传统人力运输型码头被现代化大型码头代替，如重庆港已经不需要传统的人力搬运，众多货物可以通过集装箱等机械化设施搬运；二是东水门大桥等跨江大桥的竣工，使得最初需要棒棒从南岸区摆渡运输到渝中区的货物，如今完全可以通过陆地运输，大大减少了人力开支，导致棒棒大量失业；三是现代公路、地铁设施的完备，代替了过去的“山梯”，商家们通过车辆便可完成货物的转移，并且导航更为便捷，棒棒们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少。

3.2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3.2.1 难以保障的人身安全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但是由于棒棒工作的流动性较大，加之棒棒与雇主的关系是临时性的，劳动期间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又都是口头的，并且棒棒的法律意识淡薄，更不懂得如何用法律维权，所以一旦有伤残事故发生，棒棒能从商家那里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

实践过程中我们曾跟随毛师傅去商店卸各种玻璃杯、塑料盖子、绳子等货物。玻璃杯本就是易碎品，在搬运过程中免不了磕磕碰碰，毛师傅在搬运过程中不小心打碎了 19 个杯子，不仅要向雇主赔钱，自己的手也被玻璃渣子扎到留下了伤口。我们的团员因为是新手便包揽了搬塑料制品的活，塑料盖子体积小且轻，搬起来着实不很费劲，即便如此，一个还是在推车时碰掉了 5 箱纸杯，可见在工作过程中碰撞时有发生，危险也随之存在，可是包扎伤口所需交付的费用，却全部由棒棒个人承担。

但随着法律的完善，相信会有更多的法规出台来会为棒棒分担一些关于自身安全的保障，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正越来越清晰，诚信友爱的观念也将渐渐深入商家的心中，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在棒棒们受伤后伸出援手。

3.2.2 无法利用的社会保障

为了了解棒棒的补贴情况，我们采访了重庆解放碑自力巷居委会。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们，现在很难有单独的社会保障。据调查，在最需要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中，棒棒群体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比例最高，达到 73.8%。这说明他们强烈关注养老问题，迫切希望自己也能被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但实际情况是，我们调查的 150 名棒棒中，只有 7.3% 的棒棒参加了养老保险，有 92.7% 从未交过养老保险费，这样的数据为改善养老保险制度指明了亟待填补的欠缺，而自力巷居委会的说法也更说明了，现如今他们的目光也未曾离开过诸如“棒棒军”这类的底层劳动者，这也让我们也松了口气，不只是我们在关注着“棒棒军”，我们的政府也一样，也许“棒棒军”的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3.2.3 高居不下的教育开支

在访谈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教育支出是棒棒们除去生活必需开支以外最大的支出项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3 个。一是再穷也要重视教育。多位棒棒都表示，凡是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需要用的钱，都会尽量满足，不愿马虎。汪师傅说道，可以吃得差些、穿得差些，能凑合的都可以凑合，唯独孩子的教育不能凑合。二是农村户口导致的消而不除的借读费问题。纵然 2010 年国家已经取消了这项费用，但借读费在部分地区依旧存在，可以说是消而不除。而借读费真正影响到的人群确实因为这项费用的存在备受压力。三是子女学习中课外辅导费用的压力，为了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棒棒们也会让孩子在其他教育机构进行课外学习，即使自己要承担额外的教育支出。

4 社会支持和群体关注不断汇聚

4.1 棒棒美誉度调查

作为重庆文化历史的经典元素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重庆市民对“棒棒军”这个群体也有着独特的认识。为了充分了解“棒棒军”在重庆市民视角下的信用和美誉度，以及市民对棒棒未来发展的看法，我们在重庆街头采访调查了重庆市居民雇用棒棒的情况，同时在观音桥、解放碑等 5 个区域随机发放了 500 张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60 张。

经过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在重庆人眼中，棒棒是不可或缺的存在，75.87% 的人认为“棒棒军”是重庆独有的文化符号，58.70% 的受访对象对棒棒表现出了相当的信任，仅有 8.04% 的人表示印象中有出现棒棒丢失货物或者索要高价的情况。在雇主眼里，棒棒的信誉普遍较好，有些雇主甚至会把自己库房的钥匙给棒棒保管，需要时只需打一个电话，



棒棒就能去库房拿货。同时，当我们调查采访交警、城管部门、街道办事处等政府单位时，他们同样不认为棒棒会存在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表示有过雇用棒棒的经历，但是近 5 年间，由于交通越来越便利，人们在生活中对棒棒的需求少了很多。虽然 70.00% 的人相信未来棒棒不会完全被机械取代，不过对于棒棒未来的发展轨迹，大家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32.83% 的人认为由于重庆对其需求减少，棒棒必然消失，而且他们能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职业。而 67.17% 的人希望棒棒能得到更多人关注，希望重庆一直有他们的身影。

4.2 青年对棒棒积少成多的帮助

截至 2016 年 7 月 27 日 21:05，调研团队通过网络为重庆“棒棒军”众筹，筹集到来自 63 人的 1100 元善款。

当我们的调研接近尾声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筹集到的 1100 元善款该何去何从。我们应该把它捐给生活穷苦的棒棒还是用于支付某位棒棒的子女一学期的学费？想来想去，我们决定用这些钱筹办一场特殊的谢师宴——请棒棒们吃一碗重庆小面。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一碗面，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滋味。但是对于棒棒来说，简单的一碗小面，已经是他们工作数小时之后能量的来源，也是下午能够继续工作的保障。对于收入微薄的他们来说，午间烈日下的片刻闲暇，配上一碗小面，已经是想象范围里最为奢侈的享受了。

2016 年 8 月 2 日，晴，最高温度高达 41℃。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朝天门大厦门口，与朝天门大正商厦一层和五层面摊的老板协商好活动计划后，便开始了工作。有人负责在面摊接待前来取面的棒棒，有人则负责将印好的 180 张餐券发放出去。发放餐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对这些棒棒来说，他们平时的生活经历让他们在面对来自一群素未谋面的人的邀请时，很难去交予完全的信任，所以起初我们在发放餐券的时候，遭到了意料之中的拒绝。但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所有的餐券都成功发放。

上午 10:25，我们迎来了第一位吃面的棒棒，紧接着又来了第二位、第三位，或许是看到了我们热情的服务与棒棒的口口相传，之前心存疑虑的棒棒也打消了顾虑，纷纷前来取面，高峰时那个小小的面摊要同时做 8 碗面，面摊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们与前来吃面的棒棒聊天，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高兴，一方小小的桌子上，谈笑声不绝于耳，有的棒棒还特意带来了平日里不舍得喝的冰镇啤酒与同桌的朋友分享喜悦。中午时分，小摊迎来了一个哑巴棒棒，他吃完面后想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一直不停地做着手势，看着他的笑脸，大家都明白他是在说感谢。

截至下午 13:00 整，我们共接待了 150 位棒棒，送出 150 碗小面。

4.3 媒体对棒棒广而告之的宣传

重庆文化标志和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代表的双重特点，让“棒棒军”这个群体从来不缺乏媒体的关注，从 20 世纪 90 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到近年人气满满的综艺节目《了不起的挑战》，“棒棒军”已经成为山城人民乐观自信、勤劳勇敢的精



神象征。从他们的身上，也可一瞥广大劳动人民在苦难中坚忍不拔的形象缩影。尤其是在社会转型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代，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及生活问题，也成了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棒棒军”这个群体的人文关怀，就更能吸引媒体的目光。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希望引起社会对“棒棒军”的广泛关注，通过影响力来提高“棒棒军”在社会中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将“棒棒军”群体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让更多的人知晓。为此，我们联系了多家媒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关棒棒的相关报道也被《重庆晚报》头版头条和《北京晚报》报道。在网络上，我们的行为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腾讯、网易、新华网、中青在线等多家媒体转发报道，登上当日 UC 头条及微博热搜，在百度热搜中也能见到我们的身影，通过此次大面积报道，更多的人了解了“棒棒军”这一值得被人尊敬的群体。

5 关于重庆“棒棒军”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的团队最初对“棒棒军”的关注仅仅来源于重庆生源的同学的口头介绍，直至后来的真人秀节目、书籍、报道的一步步了解，大家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兴趣和问题为导向，我们从研究设想，到实地调研，至如今报告成型，已走过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来在教师的指导和陪伴下，我们付出良多，但收获更多。

我们从最先的考察“棒棒军”的历史、发展，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到深入了解了棒棒这个大群体的整体的发展现状，再到在报告中具体呈现棒棒的工作类型和团体分布的特征，介绍其工作现状，还涉及棒棒的性别差异，探究男多女少的棒棒性别分布特征的根源，最后演化至棒棒的生活。这一路走来我们收获的远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了解，更多的是我们对自身胸怀的扩充与提升，也更贴近这个社会，让实现中国梦真正成为我们的梦。

现代社会对棒棒生活和工作的冲击不容小觑，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更想呼吁这个社会来关注这样一个群体，在梳理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不禁思考，既然棒棒的工作处境已经如此困难了，那棒棒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事实上，棒棒们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不失人格，他们虽然知识水平不高，但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对生活充满乐观，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失培养的义务和责任。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更确切地说是“90后”群体所欠缺的精神，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这种“棒棒精神”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所迫切需求的。



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的角色困惑与定位

——以心路实践团云南苗族村精准扶贫实践活动为例

第十八届“摇篮杯”北京科技大学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作者：浦震

指导教师：宋伟

【摘要】公益扶贫事业是推进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其良性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近年来，很多大学生也开始积极投入其中。但是，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事业中常常遭遇角色困惑，难以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本课题基于连续两年去往云南苗族村进行的公益实践活动，结合相关的社会调研，对公益扶贫事业与大学生之间的现实关联展开了探索，建议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事业中结合自身优势发挥探索者、传播者和助推器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角色扩展的可能性路径进行了探索，以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 公益扶贫 角色定位

1 引言

怀有公益之心，身边尽是机会。大学生是壮大公益组织的重要力量，整体素质较高、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大学生可以在传播公益理念、实践公益行动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在如今主要依靠政府、公益组织扶贫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加入将会为扶贫事业带来极大的进步，大学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1 研究背景

1.1.1 公益扶贫现状

如今，公益事业的社会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成为社会资源分配和重组的一种重要途径，已被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主流媒体的宣扬和社会贫富差距矛盾冲突的显现，公益逐步在中国社会渗透开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体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之事。如今，公益机构和个人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 大学生的公益参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公益事业的社会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成为社会资源分配重组的一种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扶贫工作发展的有力手段,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其中大学生的公益热情日益高涨,《2015 年度大学生公益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九成以上的大学生参与过捐款、捐物、献血、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其中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参与度最高的公益类型,78%的受调查大学生表示参与了志愿服务,高校志愿组织已成为我国志愿服务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志愿服务中,16%为支教志愿者,慰问弱势群体是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最多类型。另外,诸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组织也一直致力于支持大学生公益的发展。所以,大学生从事公益已成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大学生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利用寒暑假下乡义务支教; 募捐衣物、书籍、资金给弱势群体; 去敬老院、福利院等弱势团体中进行看望和陪伴工作; 进行环保活动等。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大学生参与公益扶贫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对于热爱公益的大学生,他们本就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似火热情的群体,但是仅仅靠热情是不够的,公益活动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部分大学生在公益扶贫的过程中,由于了解程度不够,基础扶贫知识匮乏,前期缺乏需求性调研,无法提供针对性的公益服务,大多时候会给扶贫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在暑期支教的浪潮中,普遍存在支教时间短、连贯性差等问题。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生力军,作为中国的新生代力量,在公益、扶贫工作中纷纷涌现。公益活动在今天更成为一种时尚,在大学校园里存在很多公益类社团,如红十字会、校青协等,这些都表明很多大学生开始认识到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开始承担起社会责任。但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公益的扶贫方向和开展方式,无数大学生投入到公益活动中,但鲜有大学生真正做到“扶贫”。

大学生的公益活动应从何处开展?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这些问题不断地暴露,不断有大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和身份参与到公益扶贫之中?

本文以云南心路——益心益意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两年的实践活动为例,实践团连续两年前往云南省贫困的苗族村进行精准扶贫实践活动,13 名大学生第一年在 14 天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苗族村修建了一条 4.8 千米的生产生活要道,并成功助力当地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但在过程中发现该村存在严重的教育问题,村民的教育意识薄弱,这成为阻碍该村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基于此,实践团在第二年去到村里进行了以“意识觉醒”为主题的社会实践,带领孩子们走出大山前往北京,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从出村土路到疏通意识的心路,这一过程中实践团遇到了什么阻力?该把这条路修成什么样?该以什么角色来修?如何来修?



2 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的角色困惑及原因

2.1 社会偏见

如今,虽然大学生从事公益扶贫受到极大的支持,但是大学生在投入公益扶贫中除了有着资金、社会资源缺乏等困难外,社会上的很多人对他们也表示怀疑和不理解,认为大学生做公益只是“三分钟热度”,大学生并没有打算全心全意地做好公益事业,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校要求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在参与公益扶贫中公益机构、企业等校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大学生通过公益机构、政府、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占比仅为18%、3%、1%。另外,被帮扶者对大学生也缺乏足够的信任。

在以往的社会公益当中,支教是大学生公益志愿服务中最常见的形式。但在支教过程中,大学生作为临时教师,还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无法系统、完整地给孩子教授有用的内容,有时候甚至还会起到误导作用。所以在公益事业中社会对于大学生并没有足够的信任度,在这种先觉条件下,大学生开展公益事业就显得异常困难了。

此外,被帮扶者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大学生前往某个贫困村开展公益活动时,即便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很多村民也认为“大学生贵为天之骄子”,是不会真心实意想帮助自己的,认为他们只是单纯地下乡体验。此外,部分被帮扶者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藐视大学生,认为他们不会有能力和方法来开展公益活动。

2.2 资金缺乏

谈起扶贫,最离不开的东西是资金,最尴尬的事情也是资金。作为还未走上工作岗位,基本没有收入的大学生,如何为贫困地区筹集资金帮助他们解决当地紧急的暂时性的问题,或者筹集资金来开展公益活动,成为前期准备中大学生最棘手的问题。

在以往的大学生公益活动中,大学生自掏腰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学生常常自己出钱给学生买教材,在邮寄衣服时自己负担邮费等,但是大学生始终没有太多资金能投入进去,并且自身的资金力量是非常微弱的。在支教等小笔花费中,这也许是可行的方式,但根本上的扶贫并不是买一本书、寄一件衣服就可以解决的,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就一定需要自掏腰包吗?

在对云南苗族村连续两年的扶贫活动中,实践团资金的来源有多种方式,虽然筹集资金的过程很艰辛,但是最后实践团自掏腰包的形式只在自己也作为捐款人时出现且数量极其微小。

2.3 心理认知

通常,大学生进行公益活动的方式有支教、献血、环保等,但这些会给大学生造成一种“公益扶贫很简单”的假象,实则不然,真正的公益不仅应该力所能及,而且更应该高效率利用每一个机会,抓住“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并真心实意地去付出。



在第一年实践的过程中，每天 10 千米的山路成了队员的挑战之一。一个星期之后，一半以上的队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肠胃炎、发烧等。随着队员们的热情日益褪去，尤其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队员的活跃期维持了不到一个星期。在第二年的实践活动中，前期资金筹备、活动策划、和家长孩子联系、孩子安全保障等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断打压着实践队员们继续前行的心态。

3 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的定位

3.1 探索者

3.1.1 大学生具有实地考察可行性

公益扶贫需要对扶贫地做深层次的了解，需要扶贫者真正调查扶贫地的状况，统计和分析数据，研究出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在扶贫过程中对症下药，真正解决当地的困难，做到真正的精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公益组织、政府等扶贫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缺乏扶贫地调研信息，造成了资源不匹配，无法把有效的资源同需要帮助的地方快速进行准确匹配。对比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位，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集体而存在，从横向上来说，学生每年集中的寒暑假使得大学生有机会到扶贫地进行实地考察，利用专业知识，请专业教师进行跟踪指导，记录真实数据并进行分析，可帮助扫除政府和社会扶贫盲区。从纵向上来说，大学生每年都有定期的假期，使得每年的定期调研成为可能。

政府、企业、社会个体由于时间短缺和信息匮乏的原因，不具备深入了解扶贫地的条件。例如，实践团两年前前往的苗族村处于曲靖市、宣威市、磨脚村、磨嘎村的大山交界处，外加交通非常闭塞，很容易被当地政府忽略，因此扶贫力度一直比较小，相关基础设施、道路改善的援助项目也一直处于拖延阶段。而相对闭塞的地理条件，也很容易带来村干部权力过大、无人监督制约的问题，影响了扶贫资金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此时，大学生应该作为探索者，利用假期时间，深入扶贫地进行实地考察。

在扶贫的过程中，大学生担负着深入探索扶贫地的真实状况、实际挖掘深层贫困原因的重大责任，为资源拥有者提供了有效的数据，使得这些资源能真正得到精准投放，避免资源分配不合理等情况，使得公益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切实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详细了解扶贫地的状况是制定扶贫措施的前提，实地考察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避免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通常采用全面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和访谈调查法，贫困农村地区的调查范围较小，大学生可以取得精确的数据和系统的、全面的基本统计资料。实践团通过调查发现，苗族村共有 28 户、131 人、18 个小学生、1 名教师、1 个大学生。通过实地观察法，我们实际了解到村委会到苗族村的距离为 4.8 千米，由于路况差，在出村的 18 千米的道路上大巴车只能以不到 10km/h 的速度行进。考虑到文字在当地的普及程度，在调查的过程中，采用访问问卷调查进行信息采集。此方法需要面对面交流后代填问卷。有效问卷的回复率高，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对于敏感问题或涉及个人隐私、价值判断等方面的问题，当面进行访谈调查获取信息



的难度也比较大。建立良好的感情是获得有效信息的基础，在信息收集过程中，实践团每天都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与村民聊天，对有效信息进行记录，并对碎片化信息进行了整理。终于，在持续的努力下，实践团不仅得到了当地烤烟收购价格为 25~40 元/斤不等、当地雨季在 6~8 月、人均年收入不到 3500 元等信息，也看到了支教 27 年的教师对每月 500 元工资、自行搬运十几公斤教材的无奈。

3.1.2 大学生具备分析思考能力

在公益扶贫中，只有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认识扶贫地矛盾的特殊性，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当地的贫困问题，真正为解决当地贫困做出贡献。在对苗族村进行分析后，我们做了以下分析，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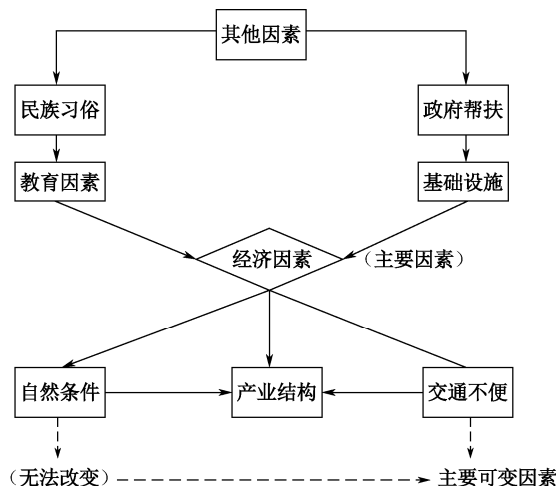


图 1 苗族村致因分析简图

以下为对图 1 的解读。

主要从 4 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基础设施、其他因素。

(1) 从最外层来说，其他因素中，当地民族习俗影响到了教育；政府帮扶政策会影响到该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

(2) 民族习俗和政府帮扶所导致的教育问题和基础设施问题，与经济条件是紧密关联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极为不便，教育落后，村民整体素质不高，影响该村的长远发展。而在 4 个大因素中，最影响该村贫困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经济因素。

(3) 进一步分析经济条件。经济生活中，农村经济来源于农作物，主要分为生产和售卖两个步骤。生产因素主要由该地的自然条件决定，售卖主要受到交通不便和产业结构单一的限制。

(4) 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交通受限是造成该地产业结构单一的重要原因，而自然条件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小村的交通道路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5) 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除了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外，还有教育落后，这是阻碍该村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由此得出，影响该村贫困的直接因素是道路交通不通畅，根本因素是教育落后，所以



实践团第一年在对该村的公益扶贫中主要进行了道路修缮，而在第二年选择进行意识上的帮扶。

3.1.3 国家鼓励大学生公益扶贫

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指出，鼓励大学生到中西部地区，深入基层，到艰苦的地区工作，且各级政府要为高校毕业生创造工作条件，主要是充实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基层单位。国家陆续发布“三支一扶”等大学生公益事业相关鼓励政策，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组织持续关注并立项帮助大学生投身于公益扶贫工作中，团中央也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以志愿者的形式深入农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传播先进文化和科技，调研基层社会现状，更多地为基层群众服务，这也是国家鼓励在校大学生投身公益扶贫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是中国社会的主力军，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深入到贫困农村地区，为基层扶贫做贡献。

实践团在两年的社会实践中也受到了当地县政府、乡镇及村委会的帮助。在第一年的社会实践中，当地民政部、扶贫办向实践团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数据信息，也帮助实践团与村里进行联系和沟通，而村委会的相关干部和官员也为实践团提供了村里人口、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当地电视台也对此次公益活动进行了报道与宣传。在第二年的实践中，村委会在帮助实践团挑选孩子、联系家长、逐步取得家长信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传播者

3.2.1 大学生在公益扶贫中具有创新性

所谓创新，并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而是应该将一些新颖的思想融入到之前的模式和做法中。筹集资金是公益扶贫中无法回避的过程，相比之前覆盖面窄、效果甚微的捐款等方式，一种新型的筹集模式逐渐发展起来。而大学生拥有足够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支撑。

在这个数据大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众筹”作为一种新型筹资方式迅速流行起来，大学生众筹更是备受关注。互联网公益众筹的核心是创意，一个好的创意可以迅速吸引大众的眼球。

在项目成立过程中，与传统的捐赠不同的是，公益众筹更注重公众的参与性与传播性。因此，公益众筹的发起，要在项目的文案策划、回报设置和执行方案中进行创意设计，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在传递主干信息的同时，应该把文案做一定的包装。例如，用优美的文字来传达信息，在网页上对项目详情进行设计，吸引公众的眼球。同时，虽然公益众筹与商业众筹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公益众筹中，应该引入商业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项目回报的设置中。传统的公益活动意味着捐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众筹不仅仅是捐献爱心，也是回馈爱心。在“益心益意，为山区的孩子修一条路”的众筹项目中，针对捐赠数目的不同，设置了不同的回报。捐赠小额款项时，可在公众平台公布捐助者名单。针对金额较大的捐助者，大学生可以选择实质性回馈，如让扶贫地的村民亲手制作感谢卡，让公益也变成有回报的投资。



网络众筹作为一种新型筹集资金的方式，不仅能帮助实践团更好地整合资源，拉动筹款，还能将公益活动宣传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他人关注到了以前从未关注过的领域，成为公益扶贫与部分社会资源的链接方式，而大学生在其中则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

3.2.2 大学生的动员能力强，号召力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战略阵地。大学生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和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利用逐渐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网络中发挥出了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优势，使公益在短时间内得到宣传的最佳效果。

项目申请成功之后，进入前期筹资阶段。大学生是社交网络媒体使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益众筹恰好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在项目筹资初期，发起者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扩大影响力，提高项目的浏览人数，资金主要来源于身边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再次进行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发起者通过自己的人脉进行扩张宣传，善款将会飞速增长，但当达到一定限度时，善款便会减缓甚至停止增长，这意味着自媒体中的资源已经耗尽，必须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在线下也应该对项目进行宣传。不妨采用以下两种宣传方式。

其一，进行募捐。在传统公益扶贫中，募捐是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所得善款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并不能真正改善扶贫地的贫困状况。此时，募捐不应该只作为筹钱的一种手段，而应作为一种宣传方式，目的在于扩大项目的影响力，让更多人投入到需要扶贫的项目之中。

其二，利用官方媒体进行报道宣传。官方媒体能够报道的扶贫项目少之又少，对于大学生扶贫来说，更是机会渺茫。此时大学生应该把眼光放低，不再执着于电视台、报纸等专业报道，应转而面向微博等小范围的报道，提高项目的可传播性。在此次扶贫活动中，实践团联系了当地手机新闻媒体 APP 进行报道，推出不到一星期，阅读量近万，且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表示关心，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实践团给扶贫地带去温暖。也正是因为这次报道，我们才能够联系上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并与其达成协议，为扶贫地多带去一份温暖。

在实践团两年的实践活动中，前期实践团将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加以设计后在众筹网上申报并发布，接着每个实践队员通过自己的宣传平均每人通过众筹的方式筹得资金 1000 元，相关推送阅读量达到 60000 以上。这个过程首先既是对实践活动本身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其次也成为实践队员连接社会资源与公益扶贫的重要手段方法。而在实践进行中，各活动事迹被云南曲靖官方媒体进行了报道宣传，并被学校新闻、官微转发宣传，队员们还在做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前后进行了 8 次网络直播，通过新浪一直播，@相关学校等主流官微，并得到了网易单独直播间，登上了网易直播头条，前后共获 3 万人的观看阅读量。

3.2.3 大学生拥有足够的知识

“治穷先治愚，治愚才是根本”，摆脱贫困需要资金，乡村发展更需要的是知识。大学生拥有各种知识的整合能力，与传统扶贫不同的是，除了传递资金外，也应该注重传播文化知识，促进贫困地发展。之所以有那么多贫困者，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勤劳，从勤劳



辛苦的角度讲，反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的付出远远超出常人所想，致贫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的贫困。

在实践团前往帮扶的磨脚村，贫困落后，与世隔绝，村民不懂得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完全靠天吃饭，并且思想意识落后，不重视教育。据实践团调查，苗族村共有 28 户、131 人、18 个小学生、1 名教师，并且当地孩子从小学开始，辍学率非常高，全村到现在只出现过 1 个大学生，可见当地的教育情况非常糟糕，这既有经济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弱等客观原因，也有村民意识落后、不深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不求长远发展的主观原因，从根本上来看，是村民在主观上造成了当地的教育缺失问题。所以扶贫并不能局限于物质上的扶贫，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抓住贫困最根本的原因，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帮扶，这样的扶贫才是长久的、根本的。

在思想意识方面，大学生支教是最为普遍的知识传播形式，大学生深入贫困地区进行支教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带去知识，带去帮助，但是短期的支教活动存在诸多弊端，大部分支教时间过短，脱离实际，活动流于形式，重策划、轻实施，内容形式单一，而且支教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什么和发挥深刻的作用，所以大学生在基层帮扶的工作上是需要不断地加以创新和改进的，需要多思考应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试图去改变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让当地人都重视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他们心里种下“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种子。

实践团在第二年进行了以“意识觉醒”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期间带孩子们走出大山，激发他们读书的欲望，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帮助村庄实现根本上的脱贫。

实践团前期与村委会、家长、教师联系 60 余次，从村里挑选出 5 个孩子，通过义卖、众筹、外联等方式获得近 3 万元的活动经费，并在咨询了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对活动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制定出了谨慎、严密的“一带一”四阶段活动路线，分别是“梦想照进现实”“榜样明晰目标”“实践带来体悟”“渴望变身动力”，以真正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心灵的改变。

实践期间团队依次到 5 个孩子家中进行深入访谈，为消除孩子们与队员之间的隔阂，实践团组织了一场破冰活动。然后将这 5 个孩子带到北京开始 4 个阶段的主题活动。

第一阶段：“梦想照进现实”。队员通过在天安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馆 3 个地方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心中的“祖国梦”“读书梦”“科技梦”。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带领孩子们参观天安门、中华世纪坛、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馆等地方，希望通过队员的一路参观和讲解，借助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磨脚村的贫穷落后间的巨大反差，激发出孩子们心里强烈的读书欲望和受教育意识。第二阶段：“榜样明晰目标”。通过带孩子们进入北京大学，和优秀学长交流，走进北京大学的课堂，感受中国顶级学府氛围，勉励他们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三阶段：“实践带来体悟”。通过心理游戏活动及登长城，让孩子们认识到有了目标就需要去承担，去奋斗与坚持。第四阶段：“渴望变身动力”。实践团组织了成长对话课，对几天的活动进行了回顾，并通过“人墙悄悄话”“贴纸”等心理游戏强化北京之行的感受，进一步激励他们用功读书，为自己、为目标不懈奋斗。实践结束后队员们将孩子送回到村子并又进行了挨家走访，把活动成果扩大影响力，在村中形成以点带面的改变。



扶贫先扶智。在实践中，实践团察民情，做实事，获得当地村民、村委会和学校教师的一致好评，实践过程也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获得近 3 万网民的持续关注。14 天里实践团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成长的种子，后期也在持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从短期来看，实践团帮助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从长期来看，以教育改变村民的思想，从根本上帮助村庄实现长足发展。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关注贫困地区，让人们走出提起扶贫就想到捐钱的思想误区，让人们认识到改变一个地区贫困现状的最好方法是教育扶贫，思想扶贫。

3.3 助推器

3.3.1 大学生的社会认可度高，可发挥“桥梁”作用

在信任危机严重的今天，大学生褪去了中学生的稚气，也没有步入社会已久的圆滑，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更容易与社会上公益所需资源的拥有者达成协议，为扶贫地带去更多好处。

例如，对于社会上的公益组织，它是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公益活动中的第三方平台，很难准确做到资源匹配合理，不乏存在合适的资金项目找不到贫困需求地的状况，手里的资金不能合理地送到受助方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群体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公益组织和被帮扶者对大学生的认可度都比较高，由此大学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挥“桥梁”作用，就能更好地帮助公益组织快速匹配项目，做好力量与善意的结合。

实践团两年的社会实践中，队员们通过募捐、外联、网络众筹等方式筹集资金，实践过程通过网络全程直播，还通过电视台、报刊、网络新媒体（微信、微博）等进行新闻、事迹宣传，无论在实践过程中的哪一步，队员们都将此次公益活动进行了最广泛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发挥了“桥梁”作用，将社会上的部分资源整合投放到了公益扶贫当中，并试图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除了对贫困地区进行物质上的帮扶外，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帮扶，大学生拓展或者转移了社会上在以前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的组织、公益人士的关注点，为彻底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3.2 大学生本身就是公益代言人

对于社会公益事业而言，大学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公益的内容除了经济的帮扶外，主要还有社会思想上的接纳和人性中的关怀。大学生在利益上的思考更少，也更容易树立一个平等的思想。从心理上接纳，给需要的人一份关怀，给他们平等的尊重，跟他们和善地交流，这都是大学生更适合去做的。只有大学生接纳了，把这种思想传播下去，人们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大学生不可能靠一己之力改变一个村的贫困现状，但怀有公益之心，身边尽是机会，大学生是壮大公益组织的重要力量。整体素质较高、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大学生可以在传播公益理念、实践公益行动方面成为一支奇兵，作为公益扶贫的助推器，大学生将是未来中国公益事业力量的主推力量。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公益

事业虽然并不直接带来利润，但它对企业的潜在促进力非同一般，企业参加公益活动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品牌的曝光率，具有巨大的广告效应。企业参加公益活动的同时也承担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企业追求良好人文环境的价值取向传达给社会大众，从而形成良好的声誉。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参与公益活动不仅能满足企业对差异化竞争战略的追求，同时还能提高企业竞争力，所以参与公益事业无疑是处置公共关系的最佳手段。知名企业家李书福一度热心于公益事业，但是也常感无奈，因为他的扶贫善款往往到了并不贫困的学生手中。为了保证自己的捐款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他不得不绞尽脑汁，亲力亲为，不辞辛劳，千里寻访贫困生。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无疑就是企业公益的代行者与代言人。首先，大学生自身的优势带来的利益冲突少，可以给双方带来更多的机会；其次，在创新模式中，大学生在向企业寻求捐款时可以做到不仅仅是单向式地请求，而是实现合作，利益共赢。

在大学生想深入基层，需要与企业进行谈判时，大学生应该为企业提供一些具体的公益实践方案，掌握贫困地区第一手的资料，并强调公益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企业第一次尝试带来一系列良好效应后，企业也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获得最大的社会效应和内部效应，如此便形成了大学生、企业（公益组织）、被帮扶者三方的良性循环。

3.3.3 在国家鼓励下，与政府合作容易

政府在公益事业中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导作用的，现在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仍然采取政府主办的方式，营利性的市场主体乃至一般的公益事业主体机构做不了、做不好或不愿做的都由政府来主办，特别是涉及与群众基本利益关系密切的重要公益事项，如教育、医疗、保险等。如此，政府扮演了引导公益事业发展的最重要角色，公益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介入会极大地带领更多单位、企业和个人加入。另外，政府还发挥了政治职能，完善了关于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约监督机制，让现实中的公益组织去官僚化，去行政化。

当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存在许多矛盾。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独立的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在组织上不挂靠政府，在资金上不依赖政府，除了与政府部门合作处理社会难题外，更多的还是与政府部门竞争同类型的社会服务。为了推动中国更好地发展，推进社会转型，这种独立性反而成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累赘。政府在扶贫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由于许多事情都需要决策及管理，其精力有限，盲区不断增加，而社会公益组织在立项时，无法精准确定是否为政府盲区，在工作中不断出现与政府扶贫工作的交叉和重叠，此时，非政府组织很容易将自己放在政府的对抗面，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

在大学生做公益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大的项目，靠我们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处于其中，只能够担任助推器的角色，帮助政府关注到扶贫盲点。

实践团在第一年实践中调查了解到路面状况是短期内影响苗族村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云南苗族村，运输速度只能在10千米/时以下，运费比材料费用高出4~5倍，道路的修缮起码需要上百万元的资金。可由于当地经济水平低下，无法完善这样的基础设施。在了解到当地的状况后，为了使那年的农作物能尽快运出，实践团用筹集到的资金垫了一条4.8千米的道路，暂时解决了农作物运输的问题。为了长期解决苗族村的道路交通问题，



实践团迅速向政府寻求帮助，恰逢当地“整乡推进”的项目正在启动，实践团迅速将该村的真实状况展现给政府，使得以前容易被忽视的苗族村在政府整乡推进的过程中聚焦到更多的目光。

相比非政府组织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大学生的扶贫工作只能点式发展，且无法大幅度进行扶贫。此时，大学生更多地起到“桥梁”的作用，将受助地的信息传达给政府，扫除政府盲区，起到辅助作用。

4 结论和建议

首先，社会公益是一个把社会需要帮助的方面展现并解决的过程，大学生投身社会公益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大学生在公益服务中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探索，这利于大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国情、社情、民情，更有利于大学生珍惜眼前的生活，努力地完善自我。

其次，大学生在投身公益扶贫中应该充分运用自身所学，利用专业知识和大学资源进行深入调研，掌握准确的数据并分析该地贫困的现状其原因，努力做到公益扶贫的精准性，针对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提出针对性、建设性建议，并发挥“桥梁”作用，连接、整合社会资源，为扶贫地带去更多的物质上的帮扶或者带去更多生产就业机会与资源。另外，大学生在公益扶贫当中不能只看得到物质、经济上的帮扶，更要看到思想、意识上的帮扶，大学生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努力在教育扶贫方面做出更具创新性、更有效的项目。大学生还应充分利用先进的互联网等技术，在电商、生态等方面提出更有效的建设意见。

大学生公益扶贫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被推上历史的舞台，以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姿态向世人展现了其无穷的发展潜力。这是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见证自我的绝佳机会和最好途径，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感受到了大学生应有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社会个体，大学生享受着先进、丰富的资源，理应担负起“兼济天下”的责任，把推动社会的进步当作自己的使命。作为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未来栋梁，大学生是国家的动力，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精英群体，大学生有责任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 [1] 胡勇. 问题与方法——谈如何使学生正确认识社会[J].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4(2).
- [2] 徐聪聪. 大学生公益众筹模式探索与实践[J]. 中国商论, 2015(19).



就业多元化下听障青少年“人在囧途”？

——基于首都部分地区听障群体就业情况的调查

北京科技大学“摇篮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作者：王珂

指导教师：于林民

【摘要】听障群体尤其是听障青少年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受到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十八大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也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意识指导实践，随着国家各层次制度的日渐完善及颁布的针对听障群体的扶助政策的不断更新，听障人群尤其是听障青少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即便在现有的已不断完善的帮扶政策下，听障人群的就业仍面临很多问题，如工作低等、机械等。为进一步分析，我们采取了大量走访、对点采访、问卷调查等方法。以此为基础，遵循实事求是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听障就业“囧途”的四大障碍，并结合当下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和环境，深刻贯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为解决听障青少年就业“囧途”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系列建设性意见，希望在国家和社会推进帮扶听障人群尤其是听障青少年的过程中尽一份微薄之力。

【关键字】首都 听障 青少年 就业

1 研究内容和目标概述

据最近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约有 2075 万听障人士，是社会构成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关注这一弱势群体，了解其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状况。尤其，就业是民生之本，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好群众的就业问题，就是为人民办实事，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实践。听障人群本就因天生不健全在就业方面面临困难，且听障群体普遍就业呈低龄化，所以就业问题更是听障青少年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形势严峻。我们 12 人的社会实践团以首都部分听障青少年和成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方式展开调研。

社会实践前期，我们通过各方面收集的信息资料，了解听障青少年的基本现状和就业现行条件，分析当下可把握的有利其择业就业的因素。我们了解到近年来，在党和政府涵盖了生活救助、就业倾斜等各方面的关怀下，听障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注，同时我国听障人的受教育率、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率也有所提升。然而我们在中期深入考察中发现，北京市听障群体的就业基本现状是：社会关注度呈现提高趋势但仍较低，福利体系



正在逐渐完善但福利覆盖不够广泛，听障人群就业面相对其他类残疾人较广但实际就业情景并不乐观。采访所得的真实听障民众的就业现状与我们预估的出入，让我们产生诸多疑问。社会关注度较低、福利覆盖不够广泛、就业后劲不足、面临被边缘化等，都是现实棘手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当下听障人群在择业就业方面的问题不容小觑。那么为什么在国家和社会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政策支持后，听障群体的就业状况还是呈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听障群体的就业“囧途”究竟面临怎样的障碍？这些障碍又来源于何处？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列出四大障碍。

那么在当今社会就业多元化趋势下，听障群体将何去何从？纵观上文的调查，我们能深刻体察到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机会，提出有效解决听障人士尤其是听障青少年就业面临的严峻问题的措施及意见即是我们本次实践的目标。在所有信息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系列研究、分析、讨论，提出了3个层级的解决措施，并得出结论，形成了系统的发展战略。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法

调查法分为两个部分，即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

实践前期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已面向大众发放了线上问卷，并根据职业类别做了详细的信息分类和问题规划，保证问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后期，我们以专业软件分析出问卷数据，显示情况。

实践中期，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访谈，走访了南锣鼓巷社区办事处、昌平区残疾人联合会、昌平区康复中心、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交道口社区服务中心、云天听障康复中心等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听障人群相关工作处，采访了近百名相关工作人员和听障人士，并在五道口和中关村等地沿街采访了数十名路人。实地考察中我们采访到的已工作的听障人士提供了深刻的可借鉴意见。

2.2 文献研究法

我们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全面、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问题。前期，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政治书籍文献收集信息资料，了解听障青少年的基本现状和就业现行条件，分析当下可把握的有利其择业就业的因素。后期，我们再依据专业学者的文献，进行一系列研究、分析、讨论，提出了3个层级的解决措施，并得出结论。



3 研究结果

3.1 听障青少年就业现行条件分析

在该部分，我们将从政策、教育、就业 3 个方面详细介绍听障青少年的就业现行条件，为下文讨论如何把握条件解决就业“囧途”作基础。

3.1.1 国家的就业政策倾斜

党和国家在十八大中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的重要性，而在听障人群的就业上进行政策的倾斜，统筹听障人士与健全人的劳动就业机会和水平，凸显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新水平。目前政府关于扶持听障人士就业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推进按比例就业。

第二，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数额。

第三，加大对包括听障人士在内的残疾人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

3.1.2 聋人教育的发展

以北京为例，当前聋人学校已逐步发展成接收自学龄前至高中生各年龄段有听力障碍的学生进行多方面学习，自幼进行康复训练和手语教学，知识类学习与正常人一样。在高中之后，根据成绩学生自主选择继续上大学或技术培训学校。为提高聋生的素养，部分学校开设了篮球、足球、舞蹈、工艺、陶艺、书法、篆刻、机器人等兴趣课程。

聋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是影响听障青少年日后工作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场所。

3.1.3 就业的可行渠道

由国务院 2007 年公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以及近年政府下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条例，我们提取和总结了听障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可行就业渠道，下面列举最主要的四类。

(1) 按比例就业。在这方面北京地区做得较好，《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都应当按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7% 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这也是当前最为广泛和主要的听障群体就业途径。

(2) 集中就业。听障群体集中就业，从而集中提供劳动所需的设备、工具和必要的福利设施，不但保障了听障群体的就业，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能够产生规模效应，节约企业生产成本。

(3) 个体就业、自主创业。对于这些听障群体，政府给予他们社会保险补助，上文也提到国家鼓励并在努力为残疾人清除创业道路上的障碍。

(4) 公益性岗位就业和社区就业。部分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接受听障青少年就业，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和岗位。或通过在社区设立公益性岗位为听障群体提供劳动就业机会，主要工作是办理本居住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



由以上可见，听障群体尤其是听障青少年理论上所面对的可考虑就业途径还是很广泛的。

3.2 听障青少年就业“囧途”障碍分析

虽然听障人士就业率在逐年缓慢提高，但听障青少年在未来就业中仍然面临考验。在调研考察后，我们总结了当前社会听障群体就业面临的最显著的四大障碍。

3.2.1 手语似外语，外界交流隔“鸿沟”

听障群体的沟通交流能力差甚至没有沟通交流能力，这是听障群体就业存在的最大障碍。听障群体使用的是特殊的语言——手语。目前手语在我国的听障群体之外普及率很低，对大众好像是一门冷门外语。由残疾人联合会所获信息可知，目前在北京，精通手语的健全人不过寥寥几百人，大多是聋哑学校的教师；再加上聋哑人的家属，懂手语的人数也不会超过万人。而在美国、德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手语的健全人约占总人口的5%。更有甚者，听障青少年接受手语培训的程度也是从近些年才开始好转的，特殊教育尽管在近年有较快发展，但面临数量众多的须接受教育的听障青少年，仍是杯水车薪。手语的普及不仅与培训机构的稀少有关，也与当下中国还没有推出较为官方的容易入门的手语教材有关。沟通困难，与外界隔着“鸿沟”，是制约听障群体发展的极大障碍。听障群体沟通困难发生情景的分布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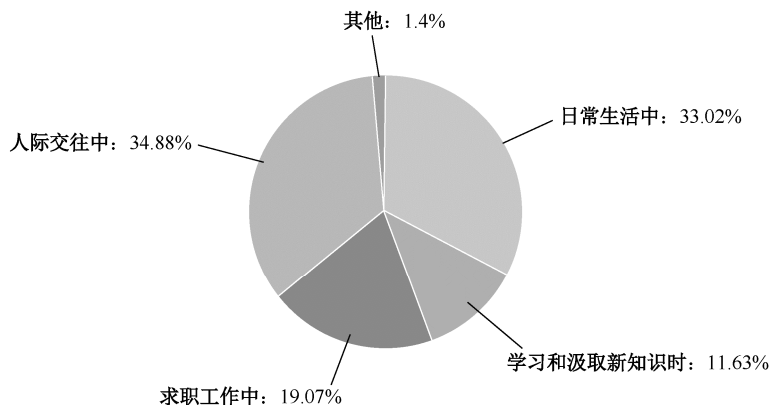


图1 听障群体沟通困难发生情景的分布

3.2.2 教育是短板，文化素质“拉后腿”

以北京为例，聋人学校的普及还是较为广泛的，但是依然问题重重，最突出的就是聋人学校的生源问题。教育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听障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职业技能严重欠缺，职业能力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听障群体即使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所从事的也还是脏、重、苦、累且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如清洁工等。报酬也普遍很低，甚至仅达到当地人均最低收入标准，随时有下岗的风险。听障群体走上社会后参与残疾人联合会组织的短期技能培训，都算不上高精技能，竞争力不足，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愿望。除去聋人学校，社会上很少有针对听障群体的职业

技能培训，即使有也大多是不系统、不专业的。随着社会经济产业的调整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听障群体在工作上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只能远远地被抛在后面，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的危险。

3.2.3 就业不稳定，保障体系“落队伍”

听障群体就业不稳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也是现实反映的情况。由首都部分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来看，数次残疾人招聘会中听障人士和肢体残疾人相比，就业率仅占肢体残疾人的 1%。另外，尽管国家从法律层面立法保证残疾人的就业权利，规定了社会企业应尽的责任义务，但根据我们对北京市各个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的采访和对部分企业单位的调查，许多单位企业宁愿选择缴纳残保金也不愿意接收残疾人就业，或者打起擦边球，只把残疾证挂在单位里，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发放最低工资。另外，随着改革的深入，部分本来实力就弱的福利企业转型失败，纷纷破产、倒闭，大量听障人士失业。此外，在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中，听障人士占的比例普遍最低，各社区不可能都配备手语翻译，街道基层社区理所当然优先安排其他残疾人就业。针对听障群体的就业保障也不够完善，如在居民养老金、医疗保险、福利养老金、护理补贴等方面听障群体比起其他残疾人群体，并未得到很好的保障，无障碍改造或是一些补助金的发放也都尚未惠及他们。所以，听障群体虽然相比肢体残疾人、智力精神残疾人而言劳动能力更强，但在这种严峻的社会大环境面前，他们的就业呼喊显得苍白无力。

3.2.4 偏见仍扎根，社会歧视“放冷箭”

社会对包括听障人士的残疾人的偏见仍根深蒂固，这让听障群体无法勇敢地走到阳光下。根据在康复中心的调查来看，即便是部分接受康复治疗后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交流的青少年，也依然会受到正常学校中同学们的歧视。而据我们对受访成年听障人士的采访结果来看，他们在寻找工作和就业的过程中，普遍受到了社会的冷落，甚至个别聋哑学校在招聘时都标出“不要聋人”。如果连聋哑学校都歧视听障群体，哪里又是他们的容身之所呢？社会在听障人群就业问题上普遍持“听障人士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听障人士能做什么”的观点，听障人士的行为和自身价值皆不被认识到，使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阶层，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大众对听障群体就业意见的分布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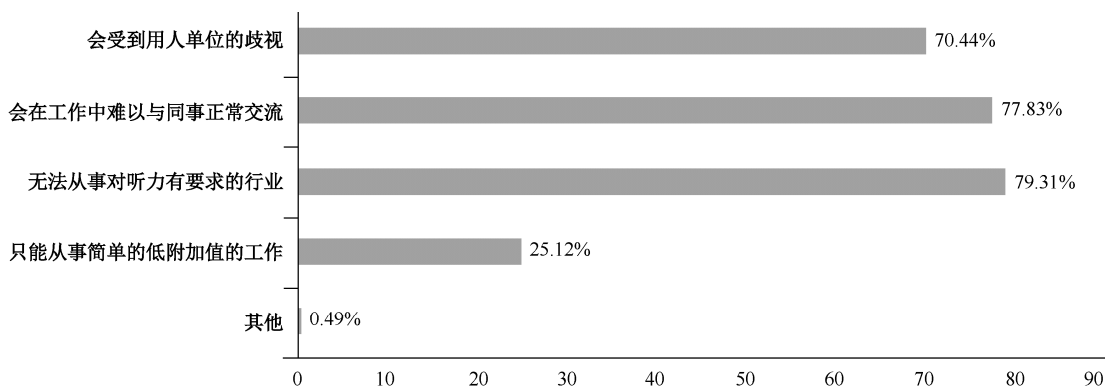


图 2 大众对听障群体就业意见的分布



4 改变“囧途”的措施建议

在对目前听障群体就业有了基本全面的了解后，我们基于已有的文献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图3和图4），从3个方面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初步形成听障青少年未来就业的发展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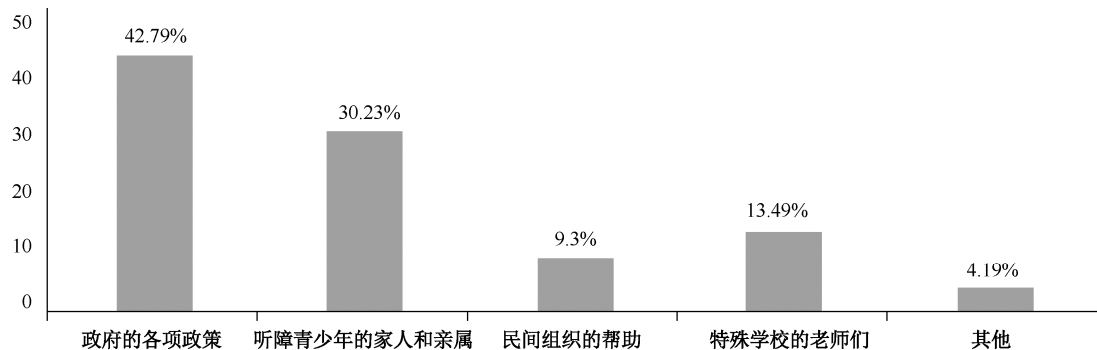


图3 大众认为责任者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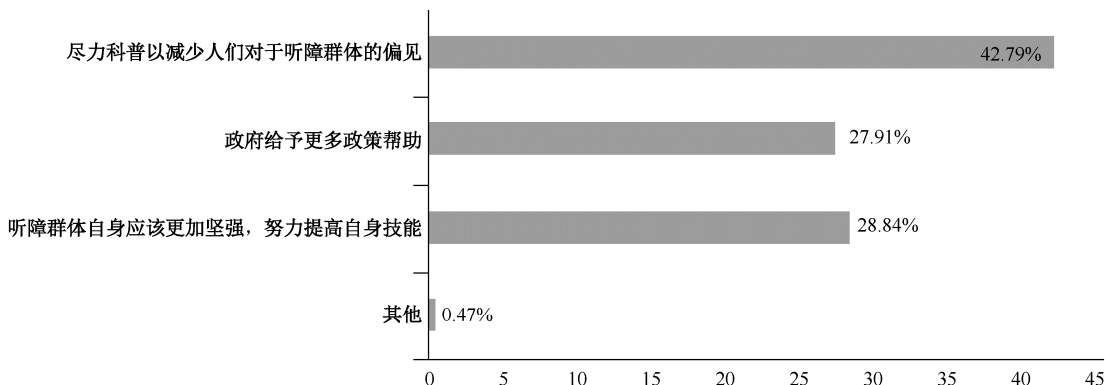


图4 大众认为可解决途径的分布

4.1 个人适应社会转变

4.1.1 提高文化水平，找准职业位置

当前大部分听障群体就业面临学历低、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目前全国有少数大学允许听障考生报考，在这一趋势下，听障青少年一定要注重学术方面的发展，争取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努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专长，善于审时度势，结合社会人才需求，增强就业优势。

4.1.2 加强品格培养，塑造自强精魄

现代经济下，企业更重视员工的个人素质和服务水平，因而听障群体也应该更注意塑造自身在性格性情、为人处事、自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听障青少年要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以优秀的品格为自己的成功之路打下基础。听障青少年应该开放心态，愿意与外界联系，这样在就业方面也会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

4.2 社会发挥支持作用

4.2.1 社会消除歧视，促进两个世界沟通

社会文化的多元使听障人群和健全人群两个世界同样缤纷多彩，不应该相互隔膜。对于听障群体而言，最能让他们感受幸福的并不是得到社会的帮助，而是这个社会对于他们自身状态的接纳，对于他们存在价值的认可。“除了听，聋人能做任何事”。听障人士并不是异类，呼吁大众平等对待包括听障人士在内的残疾人仍是一项艰巨而势在必行的事。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企业和普通大众共同努力，改变社会对听障人士的看法，抛开偏见和歧视，让他们感受到来自有声世界的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更是为听障青少年未来就业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

4.2.2 慈善福利机构凝聚善意，以心换心

随着人们对听障青少年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不断有针对听障青少年的福利机构和基金会产生，他们对听障青少年的援助日益增长。这些可见的帮助让听障青少年们在接受教育、日常交往、未来就业各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可能向健全人看齐，减少他们因为自身存在的缺陷而导致的劣势和心理自卑感，有勇气和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的就业。

4.2.3 招聘单位综合考虑，认可听障人士的能力

一个人在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从来不能因为单一缺陷而被否定。正如前文所说，听障人士自然有其擅长甚至强于常人的方面。用人单位和企业需要认识到合格的接受过教育的听障人士尽管有缺陷，但是仍然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企业招聘残疾人职工并不会影响它的效率和形象，反而能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得到人们的赞赏。用人单位和企业摒弃歧视，让听障人士及其他残疾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文化和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下，其可能性是非常可观的，为听障青少年的就业发展增添一抹亮色。

4.2.4 各地区残疾人联合会牵头，加强组织

以各区残疾人联合会、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为龙头，举办有关听障群体的活动（如举办助残日），带动整个社会来更多地关注听障群体，加强与之沟通和交流，倡导社会、单位及个人都应在关爱、帮扶包括听障人在内的弱势群体上做贡献。另外，残疾人联合会还要平衡对听障人士的补贴和福利给予。根据对残疾人专职委员会的采访，我们获悉听障人士是全五类残疾人中补贴数额最低的，另外，由于助听器等听障人士康复器材的价格昂贵，听障人士的相关扶助活动一直被推后，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仍需各残疾人联合会大力推动。



4.2.5 福利企业积极转型改革，统一双效益

福利企业指集中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特殊经济企业，其福利特征表现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占企业人员总数的一定比例（25%以上），国家对这类企业给予减免税收优惠，所减免的税金全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当前福利企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竞争力不足，最突出的是产权不清、机制不活、效益普遍不佳、生产经营困难等，必须进行转型和改革。一是福利企业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管理模式，法人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彻底实行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则通过制度实施灵活监督。二是福利企业要自觉面向市场，主动寻找市场，以优质服务去占领市场。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福利企业要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福利企业的转型和改革成功与听障青少年的就业前景息息相关，不可忽视。

4.2.6 聋校重视革新职业培训，增强师资力量

聋校要尽可能改变办学模式，完善办学功能。首先，聋校要实行开门办学，增强与社会、市场、厂家的沟通，加强对聋生的就业指导，为学生的职业选择提供有效的咨询指导，在聋校与市场、学生与就业单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聋生能顺利地走向就业，提供服务。其次，聋校要认识到聋人教师的职业潜能，为听障青少年成才提供优秀教师资源。最后，聋校要把听障群体文化和身份认同纳入到教育课程中，帮助聋生了解听障世界，客观地认识自己，为听障群体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树立成长、成才的信念和理想。同时，了解听障群体与健全群体在心理特征、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之间的异同，且在不同的社会交际场合遵守不同的交际规则，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职场规则。

4.3 国家加大投入力度

4.3.1 国家推进听障青少年职业教育扶持和改革进程

针对听障青少年的职业教育应该成为其教育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听障青少年未来要适应激烈竞争的社会，就必须具有更精湛的综合职业技能和更优秀的综合素质，这是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化，更是良好的职业教育的成果。国家应该为听障人士报考师范学院进行政策上的倾斜，促进中国聋人教育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更是培养聋生掌握一技之长，实现残而不废、残而有为、自立自强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开展职业教育为听障青少年走进社会参与劳动和生活创造了条件，使他们由残疾者转化成为真正意义上有经济创造能力和负责任的公民，这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3.2 政府创新就业政策和措施并加强监督

听障青少年未来就业面临新时代考验，在就业多元化下，政府需要进一步创新听障毕业生就业的倾斜政策。当前，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委员会、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通知>精神，实施促进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六项措施的通知》，在用人单位、企业和就业服务机构方面提出了鼓励政策和强制要求。

上文已提及福利企业的发展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作为“干预者”要加强监督。政府对福利企业的管理与扶持不能光靠税收优惠，应体现在多方面、全方位：一是政策扶持，界定某些社会服务项目和行业，如政府公共服务、信息网络服务、公益产品服务等，由福利企业竞争经营；二是调整社会资源，支持福利企业的发展；三是资金支持，福利企业也属于社会保障行业，不能简单地误解为“花钱”，要有资金投入，支持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规模经营，纠正其走上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偏向；四是加强对福利企业申报开办、登记注册、生产效能、用工情况的动态管理，防止企业虚报用工数量、虚开经营发票、侵害残疾人权益等。

5 结语

听障群体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殊群体，同样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是听障青少年立身发展之本，促进听障群体就业有利于听障青少年也能像健全人一样更好地社会化，推动他们走向社会，参与劳动，创造社会价值，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坚持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的体现。促进听障青少年就业能促使他们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实现自身价值，是“平等、参与、共享”精神的真实体现。

为促进听障群体就业，为听障青少年创造一个光明的就业未来，国家、社会和听障青少年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但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国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发展教育科学，使听障青少年沐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下，培养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避免听障群体社会圈形成消极的亚文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是真正的授之以渔。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均提升幸福感，使听障群体更好地融合到社会中去，与全社会共同发展和进步，从而促进社会各群体和谐融合、和睦共处，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 [1] 李淑英. 特殊教育就业掣肘——兼论听障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J]. 中国成人教育, 2015 (23): 139-142.
- [2] 何宁. 浅谈聋人毕业生就业难及相应的对策[J]. 素质教育, 2012.
- [3] 梁土坤, 尚珂. 我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现状研究[D]. 北京物资学院, 2012.
- [4] 韩梅, 袁群, 贾林. 聋人大学生就业力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12(2): 180-181.
- [5] 俞旦. 聋哑人就业中的社会排斥与融合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6] 贾林. 我国聋人大学生就业保障问题研究[D]. 天津理工大学, 2013.
- [7] 许巧仙, 施国庆. 社会融合视角下聋人大学生身份认同及其影响[J]. 社会工作, 2011 (14): 39-43.
- [8] 张雪慧, 韩梅. 我国聋人高等教育支持体系现状及完善[J]. 绥化学院学报, 2013, 33 (4).

第二篇

迸发·青春力量

“青年服务国家”

基层服务事迹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形式，“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方针，大学生深入基层调研、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实践地的人民做出贡献。



从泉水里流淌出来的精灵

“水精灵”饮用水调查帮扶实践团帮助困难地区改善 饮用水情况

【事迹简介】

“水精灵”饮用水调查帮扶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于2016年暑期前往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盐仓镇四堡村开展围绕饮用水的调查帮扶活动。在14天的实践里，实践团走访调查了86户家庭，考察了4处水源，单人徒步累计200余千米，讲解宣传200余人次；同时，实践团捐赠建材并修建储量27吨的蓄水池一座，水池惠及10余户困难家庭；支教伴饮饮水安全宣讲共40学时；为孩子们捐赠爱心水壶100余个。

【事迹材料】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盐仓镇四堡村位于云贵高原北部，当地村民长年以储蓄雨水、山泉水为主要饮用水，水质浑浊，水保存不科学，饮水安全难以保证。北京科技大学的实践团前往该地开展社会实践，积极帮助当地村民喝上安全放心的干净饮用水。实践前期，团队成员多次组织开会并确定行程安排、注意事项等，大量查阅有关书籍、文献和网上资料，利用现代网络众筹平台进行线上筹集资金，汇聚来自各个地方的爱心。

在为期两周的社会实践中，实践团通过问卷发放、实地走访等方式，走访了86户偏远家庭，发放100余份饮水安全宣传单，完成了对当地水样的采取、检测、调查工作，全面细致地了解了当地村民饮水的真实情况。调研发现，当地人能够获取较为干净的水，但是蓄水困难。由于蓄水装置陈旧且简陋，极易滋生细菌和遭受污染，形成极大的安全健康隐患。实践团利用筹集到的善款，购买了钢筋、水泥等建材，帮助问题较为突出的几户人家修葺好了蓄水池，使用上了自来水。最后，实践团通过与村委会的合作向上级政府积极反映当地的实际困难情况，获得当地政府支持，推动政府部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此外，结合当地教育极度匮乏等实际，实践团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支教，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同时教给孩子们关于饮用水安全的知识，增加其对水质安全的了解。实践过程中，队员立足于当地的水源质量和水源改善措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水利建设，科学地综合分析水质水情，积极向政府寻求帮助，为当地的水质改善做出了贡献。实践期间的坚持和踏实是他们不变的信仰，走进基层做实事是实践的出发点，用大学生的知识和热情做实践，对他们而言既是增长才干的磨砺，也是回报社会的契机。



携心行动走进来，把微梦想带出来

“微梦想·心行动”公益行动帮助小人物实现微梦想

【事迹简介】

帮助小人物实现大梦想，为他们的大未来捎去小希望。北京科技大学“微梦想·心行动”二期实践团分为“丹心圆梦”和“京筑微梦”两个实践团队。携心行动走进来，“丹心圆梦”实践团把暖爱带到了辽宁丹东的杨林村，通过公益支教，在多彩课堂探寻孩子们的成长价值，助力青春梦想，与孩子们共同成长；把微梦想带出来，“京筑微梦”实践团把江西太阳村的孩子们接到了北京，通过开展“行走中的支教”的创新体验式教育，希望借助支教实现孩子们来京梦的同时，让孩子们也投身公益活动中，切身感受公益的力量，培养社会责任感，传递社会正能量。

【事迹材料】

北京科技大学的“丹心圆梦”实践团于2016年7月26日到达辽宁丹东省杨林村，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最初设计构想的活动，确定了“求知梦”“才艺梦”“和谐梦”“舞台梦”四类活动主题。在全体队员的努力下，为杨林小学40名学生开设了为时7天、总计达72学时的支教课程，带领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利用在线众筹所得的钱款为学生捐赠了学习用品及图书200余件；开展了美术、舞蹈、英语等8类社团活动，丰富了社团文化；同杨林小学联合举办了“凝心聚力，筑梦乡间”文艺联欢会，邀请杨林、双安、明安、小荒沟、临江五村及丹东市青年联合会一同参与。“丹心圆梦”实践团将孩子们的生机与朝气同村民们的勤劳与朴实相结合，渲染了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丹心圆梦”实践团还对杨林村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了走访，以大学生的角度为杨林村制定了生态水果销售方案。并通过联欢会的成功举办为优质无机农产品建立了宣传媒介，打开了销路。“丹心圆梦”实践团还同当地小学合作共建了实践基地。

“京筑微梦”实践团同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合作，开展了“行走中的支教”活动。整个活动是以“帝都北京”为中心展开的，并分为“韵味古都”“继往开来”“魅力新城”“心灵桥梁”4个主题，从募集宣讲、明星赞助等渠道筹集资金8000元。经过多方努力，10个来自江西的孩子最终在2016年7月27日抵达北京，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京筑微梦”实践团开展支教30课时，行程120千米，足迹遍及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活动场所15处，除大学课堂外，还融合了户外竞技、交流参观、文艺表演等，并且安排了辩论赛、心灵交流分享会、撕名牌、趣味实验课、风筝绘等一系列趣味教学活动，成功帮助孩子们完成了来京梦。另外，“京筑微梦”实践团还成功联系到北京太阳村，组织两地太阳村的孩子们开展了友谊篮球赛、创意绘画展、太阳村农场体验活动、“京赣心连心”文艺汇



演等一系列联谊活动，增进了两地太阳村的友谊，也为太阳村际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活动经验。其活动故事得到了头条网、善达网、都昌新闻网等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京筑微梦”实践团采用“行走中的支教”寓行于教，让孩子们感受首都城市风采的同时也积极融入公益活动，受到了两地太阳村的一致好评。

他们的微梦想，我们的心行动，公益之路漫漫，我们一直在路上。



聆听底层呼唤，用心传递真情

重庆“棒棒军”社会调查实践团联合媒体重拾失落的山城记忆

【事迹简介】

追寻重庆记忆重庆“棒棒军”社会调查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的成员们在通过网络和电视了解这一群体后，决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深入调查，从而进行精准帮扶。通过对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针对他们无固定组织、流动性大、维权意识薄弱、社会福利保障不足等问题，实践团撰写了《致重庆市政府建议书》，主张搭建监管平台，让他们可以准确地将劳动力输出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同时也获得更为合理的劳动报酬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事迹材料】

“棒棒军”活跃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重庆，靠劳力搬运维持生计。但随着物流、快递、配送等行业的迅速兴起，以及重型机械、运输工具的普及，摩托车、汽车时代的全面来临，这群曾经建设重庆的主力军的生存土壤日益贫瘠，人数急剧减少，已经开始走向消失的境地。

实践团到重庆，和棒棒同吃同劳动，了解棒棒的生活现状和困难，多层次、多角度地帮助这个群体。为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个群体，实践团获得了《重庆晚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使“棒棒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棒棒军”而言，实践团里这群大学生的造访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困境和职业现状，但两周的相处甚至是一个清晨的感动，却实实在在地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注，也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最重要的是，实践团从调查出发，撰写了论文《外出务工农民生存现状及社会影响调查研究》，就“外出务工农民生存现状及社会影响”这一主题进行探究，以山城“棒棒军”为蓝本，映射更为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基于论文，实践团撰写了《致重庆市政府建议书》，将实践团对“棒棒军”的转型方案等正式反馈给重庆市政府。希望通过统一监管平台的建立，统一收录“棒棒军”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实施统一管理。由于重庆的地形特点，棒棒在很多地方还是不可替代的，让需要棒棒的客户能够更加方便地找到棒棒，满足市场刚需，这或许能够大大改善棒棒群体的生存现状。



六载同行，浇铸北科苏州情

“禾欣”少儿服务实践团情系苏州，关注未成年人成长

【事迹简介】

“禾欣”少儿服务实践团（以下简称禾欣）连续六年来到苏州工业园区开展禾欣七彩夏令营活动。六载韶光，禾欣累计开展 88 场公益活动，服务儿童 26000 人次，近 1300 户家庭受益，服务地域面积约 60 平方千米，获得拨款、赞助与奖金总计 15 万元，成为苏州当地最受欢迎、最有情怀的暑期夏令营。

【事迹材料】

禾欣成立于 2011 年，致力于为现代城区中的一些未成年人提供成长辅导、心灵疏导和素质拓展等公益服务活动。禾欣于 2013 年在当地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2014 年成功注册“禾欣少儿服务与发展中心”社会组织，推动大学生公益实践行动规范化、标准化、示范化。每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学的大学生都在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禾欣夏令营，以“梦想七色花”为主线，开展公益环保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团队能力培养、安全法律教育、动手实践学习、心理素质锻炼、自然体验活动、才艺特长展示等活动，覆盖“主题教育、文体艺术、社会实践、心理教育”四大板块，引导小朋友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是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禾欣以此为契机，与湖东社工委合作，创新禾欣报名方式，与“新邻里+”社区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相结合，推出志愿积分报名制度。家长通过用社区志愿服务赚取的爱心积分，兑换禾欣夏令营的名额。以湖东社工委为例，禾欣为其辖区内的社区带来了两万余的积分，大大促进了社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推广家庭教育理念。禾欣在创立之初就将一些先进的家庭教育模式融入到活动之中，并与三道教育理念（简称 3M）相结合，不断实践。在夏令营中，黄色活动普及法律安全常识；橙色活动传递健康运动理念，与“为生之道”相适应；紫色活动散播感恩友爱情怀；绿色活动播种公益环保之心；红色活动弘扬爱国精神，分别从对亲友、对社会、对国家 3 个角度诠释“为人之道”；青色活动培养科学创造思维；蓝色活动提升实践动手能力，是“为学之道”的最好体现。

三是助力少年儿童成长。作为一个以少儿服务为基础，以向下一代传递正确价值观为目的的夏令营，孩子们是夏令营的主体，也是活动的直接受益者。禾欣夏令营在前期策划时就承袭了这种观点，从能力提升与思想道德教育两个方向来设计活动环节，不仅要锻炼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也要培育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精神、坚强性格和感恩情怀。

四是创新实践育精英。六载禾欣驻温情，创新实践育精英。禾欣给了大学生一个宝贵的锻炼机会，整个夏令营从策划到实施全部由大学生完成，一个个现实困难磨炼了学生们的意志品质，让大学生变得成熟稳重。半个月中，禾欣的成员陪伴着孩子们成长，同时自己也在成长。他们不断进取，用青春谱写最美的诗章。



“爱在武安” 山东精准扶贫

实践团为当地引资 30 余万元进行产业扶贫

【事迹简介】

“爱在武安”精准扶贫社会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来到了常年处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之中的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武安镇。当地村民以耕种为主要经济来源，实践团用了一年的时间，将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新型经济作物——茶树菇的种植技术教给当地村民，并引进政府资金 30 余万建立了新型茶树菇温室大棚 20 个，制作茶树菇菌包近 10 万个，用产业扶贫的方式让当地村民脱离贫困。

【事迹材料】

实践团走访了当地近 50 户村民，考察了武安镇的地理环境，将新型经济作物——茶树菇引入当地。实践团通过搜集网络视频与邀请专家授课相结合的形式，入棚培训茶树菇种植新技术。由于当地缺乏经济支撑，实践团引进政府资金 30 余万元，建立茶树菇温室大棚 20 个，制作了近 10 万个茶树菇菌包。为节约成本，实践团对温室大棚进行了改进与优化，设计出高利用率的新型温室大棚，直接节约成本近 5000 元。实践期间，团队成员用视频直播的形式记录了与村民一起铺设、搭建遮光塑料布以及对大棚外部彩钢切割和固定的过程，为当地村民留下了可供学习参考的资料。

实践团不仅引进了茶树菇，也为该新型经济作物的销售开拓了多种渠道。实践团协助当地政府建立了农产品产销合作社，以固定价格收购茶树菇，再统一销至当地市场，避免了由于市场供需波动而造成的价格波动给农户带来的损失。为确保销售渠道多元化，实践团不仅在当地各大市场设置了固定销售点，也在淘宝等网络购物平台开设网店。目前，相关网店不仅在当地月销量第一，且依靠成本低、运费低等优势，积极将产出的茶树菇销往省内外。

实践团以“产业扶贫”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相关扶贫活动，使当地人均年收入从 3000 元增长至近 2 万元，实现了村民收入大幅增长，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实践团也通过网易网进行直播，2 小时的直播中获得 5 万观看量，获得当地村民和网友们的一致好评。实践团多次与政府进行合作，在社会上广泛寻求帮助，将政府、社会、学校等各界力量团结起来，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独具特色的扶贫之路。

研发报警器保障妇女和儿童出行安全

索奥智能报警器科技实践团以科技服务社会

【事迹简介】

索奥智能报警器科技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致力于用科技为妇女和儿童的人身安全保护做出一份贡献。他们通过一系列调查走访，利用所学知识，制作完成了一款用于妇女和儿童人身安全保护的科技报警器，以减少不法分子的侵害。为了提高人们对妇女和儿童受侵害问题的关注，以及普及科技安全相关的知识，实践团走进各个小区，将产品推向大众，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的产品中受益，并举办了多场安全宣传活动和签字活动，利用科技产品和宣传活动让更多人关注这一社会热点问题。

【事迹材料】

妇女和儿童在社会中多数情况下属于弱势群体，极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因此，实践团的成员们设计出一款实用性强、便于携带的智能报警装置。此装置将集成 GPS 定位模块、短信发送模块、自动报警模块、通信模块，具有一键求救、蓝牙通信、智能记步等功能，便于妇女和儿童随身佩戴，减少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实践团希望通过媒体对该产品的宣传，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给妇女和儿童带来更多帮助。

实践前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学习了单片机基础知识，熟练掌握并能编写基础代码；安排实践场地并准备实践材料；组织实践人员，安排实践相关事宜并准备开展实践；分析作品预期功能，初步构思作品软硬件设计，初步构思作品外观。

实践团的成员们先后到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南锣鼓巷、陶然亭等附近进行问卷发放，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妇女和儿童受侵害的态度和建议，并开始走访相关部门，如全国妇女联合会、青少年维权中心、派出所等，咨询如何做好安全和权益保护方面的宣传，寻求指导意见。之后，实践团的成员们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产品功能预期，从而对作品进行框架设计、模块程序编写与硬件搭建、作品模块整合，采购作品所需的电子元件，完成设计与制作。然后，实践团的成员们开始进行作品综合调试，最终优化设计。对所有功能都实现的作品进行进一步优化，包括人性化设计、外观美化等。在实践后期，实践团的成员们联系媒体将完成的作品面向相应目标人群进行推广，并通过实际试验获得反馈，用于后续作品维护及进一步开发。实践团所发明设计的智能报警器具有轻便、易携带、低成本等优点，使得产品在没有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成本已经可以为大部分妇女和儿童所接受。经社会调研，实践团发现大多数妇女和儿童很关注安全问题，一旦这款智能报警器投入使用，将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不少便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妇女和儿童出行安全。



文化交流带来别样改变

尼泊尔志愿教学实践团远赴异国做文化使者

【事迹简介】

尼泊尔志愿教学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在尼泊尔国立联合学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支教实践活动。在支教过程中，实践团努力适应当地学生的特点，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积极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课堂内容，同时积极举办知识竞赛等各类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中尼文化交流，努力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推动了尼泊尔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事迹材料】

在尼泊尔，与风景如画、幸福指数高不相称的是破败泥泞的街道，以及地震一年后仍住在救灾帐篷里的人们。但这些都没有降低尼泊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这里也有星罗棋布的学校和不计其数的教育类公益组织。为帮扶尼泊尔教育事业的发展，尼泊尔志愿教学实践团成立，实践在位于首都的国立联合学校展开。在实践团到达之前，该学校从未有过国际志愿者，因此实践团在规划安排、沟通协调方面进行了很多开拓性工作。在了解了学校的需求后，实践团首先从尼泊尔人较薄弱的英语发音教起，由于教授学生的年龄与层次水平多样，团队成员积极研讨、因材施教，通过筹备适合不同年龄学生的讲课内容和方式方法开展具体教学。

教学实践中，实践团一方面努力适应当地学生的特点，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丰富课堂内容：在对发音的矫正中加入对音节的形象化描述（如肢体动作、小口诀等）以帮助记忆，在教学中穿插与英语相关的游戏以增加兴趣等。这些富有新意的教学方式同样也给当地教师的教学方式革新带来了启示。在支教活动中，实践团的成员们经历了从和当地“同事们”仅是点头之交，到结为真正的朋友且频繁交流教学体会，与学生打成一片。实践团参与到当地学校更多的活动里，在举办知识竞赛、期末考试监考等工作中更深入地了解尼泊尔文化。在尼泊尔传统教学方式中，体罚占很大比例，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同时对教育也弊大于利。在该国倡导减少体罚的同时，实践团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介绍新型教学模式，宣扬对个体的关注，提高了学校教师对学生心理状态的重视程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教育者的思维模式。

在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活动结束后，学校负责人针对此次实践活动表达了对实践团的感谢并提出表扬，同时表示要全方位开启学校招纳国际志愿者的计划，引进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实践过程中，实践团在不断完善自身实践方式、不断发现问题及积极解决的过程中，帮助邻国发展，代表国家深入交流，推动尼泊尔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实践和文化交流充分结合，使双方获益匪浅。



两年宣威梦，守望公益行

云南白泥村实践团为村民争取修建价值 10 余万元的生物净水池

【事迹简介】

云南白泥村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连续两年前往省级贫困村云南省宣威市白泥村，开展公益扶贫项目，通过筹集善款为当地构建了一整套水资源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改善了白泥村缺水的现状。同时，实践团还将白泥村与沿海富裕地区相比较，开创了群众动员、外界帮扶、政策支持 3 个方面互动协作发展模式，并在白泥村开展了一系列民生工程，造福于村民。

【事迹材料】

云南省宣威市白泥村，一个位于高海拔山区的贫困小山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3000 元，那里的人们只能凭着一把锄、一柄斧和大山争土地，靠着一挑担、一双脚和老天争水源。这里一年中有 8 个月用水得不到保障，同时饮用水的氟含量严重超标，致使大多数人患上了地方性氟中毒，村民们的生活异常艰辛和窘迫。白泥村是队长浦绍韬的故乡，他说：“可是，那里是我的故乡啊，我一定要回去，为乡亲们做一点事情。”于是他连续两年带队去到那里，向慈善基金会为白泥村小学争取到“爱心厨房”和“蜜儿餐”项目，价值 50 余万元，极大地改善了孩子们的饮食条件；为白泥村小学捐得 1231.2 元善款；构建了一套水资源管理体制，改善了白泥村管理型缺水。

实践团有一个梦想——让小小的力量点燃大大的希望，让公益扶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团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单纯的公益项目支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想起东南沿海很多富裕的村庄，他们的富足不仅仅是因为区位优势、传统的积累，更重要的原因是先进的思想和意识的觉醒。实践团的成员们觉得社会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共享，还要有先进的知识和超前的意识的共享。“往内找动力，往外找帮助”是实践团想出的答案。村子的贫穷和村民有很大关系，让群众行动起来改变现状，这是村子脱贫的关键；外界的帮助、政策的扶持是脱贫的条件。实践团把调查结果及自己的想法同村委会交谈，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认可。

因此，实践团始终把宣传动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两年来实践团步行超过 100 千米，共走访了 210 户村民，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960 份，希望通过宣传唤起村民们对氟中毒的防治意识，让还未患病的孩子远离氟中毒，让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改变现状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许多村民已经建立了氟中毒预防的意识，而他们正将这种“行动起来做改变”的意识从氟中毒延伸到更多的地方，他们真真切切地改变了。这才是小小力量点燃的大大希望！

“意识觉醒应该成为大学生公益扶贫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小处入手，往大处思考，做最实在的事，寻找更大的可能”，这是实践团成员们的思考，让小小的力量点燃大大的希



望，这是实践团成员们的坚守，看到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因为实践团而能有一些改变，这才是队员们价值真正的体现。从公益扶贫新方式到防止贫困“扶起又倒”，这些问题又把实践团成员们的思考和行动提到新的起点。

作为省级贫困村的白泥村，目前由一家国企进行精准扶贫，未来将安装 500 多盏太阳能路灯，开展机耕路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白泥村将被打造为宣威最美乡村！



为自闭症儿童打开一扇窗

“爱之旅，星希望”关爱自闭症儿童实践团关爱自闭症儿童并捐赠价值 1000 余元的物资

【事迹简介】

“爱之旅，星希望”关爱自闭症儿童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通过“一对一”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自闭症儿童的内心世界，通过文艺汇演、捐款捐物，给自闭症儿童送去关爱和温暖的回忆；通过与自闭症儿童深层次地交流沟通和互动参与，全面地了解自闭症儿童的内心活动状况。实践团的成员用自己的心去包裹自闭症儿童的心，以爱的名义陪伴他们成长，必将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

【事迹材料】

实践团在大兴区“我和你”孤独症儿童关爱中心开展了“一对一”志愿服务 14 天，共 210 课时，举办宣讲活动两场、文艺汇演一场，捐赠图书百余册、衣物 20 套、壁纸 15 张、彩笔 10 盒、玩具 15 个，为贫困家庭赠送价值 200 余元的爱心物资，给村民发放宣传册 100 多本。实践团成员“一对一”接触关爱自闭症孩子，帮助他们进行强化训练，初步了解了现阶段自闭症的治疗情况及教育治疗方法，并开展了丰富的帮扶娱乐活动，与自闭症儿童及家长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团于 2015 年 8 月 2 日来到了北京市大兴区“我和你”孤独儿童关爱中心。机构主任对实践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亲切地介绍了机构的情况，在短暂的接触当中，实践团了解到自闭症儿童只是以一种独特方式与人交流，他们并不会因此变得暴力，他们懂得何为幸福，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深爱的。

实践团的成员与孩子们密切接触，体验感受其每天的生活情形；帮助孩子们进行强化训练，维持课堂纪律；与家长们交流，了解孩子们的治疗情况及基本的家庭情况；积极参与关爱中心的卫生打扫、床单清洗、教室整理、墙面绘画等工作；初步了解自闭症儿童与他们脑海里的自闭症患者的不同点，跟随孩子辅助家长也早已成为实践团成员们的“全部”，实践团的成员们仍然跟随孩子们上课，与教师交谈，与孩子们互动。

为了更深入了解自闭症儿童的主要症状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实践团又对机构中的外国志愿者和机构教师进行了一次采访，穆沛宁治疗师让实践团的成员对自闭症这一群体有了新的认识。实践团的成员们和这些孩子更近了，身经百战的实践团的成员们信心满满，“乐”此不疲。

实践团为回报机构热情的指导与亲切的关怀以及各位家长对实践团的支持与理解，将两周以来的所见所思所感融汇成一场文艺表演献给机构人员及各位孩子和家长，给孩子们带去了快乐的回忆。在演出的尾声，实践团给每一个来观看演出的孩子都发放了一本识物的卡片书籍，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康复。



小小的图书馆，大大的梦

来京务工子弟实践团为朱房村务工人员子女完善梦想图书馆

【事迹简介】

小行动也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北京科技大学来京务工子弟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通过完善梦想图书馆，助力关爱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市朱房村，实践团的成员们为这里的孩子们送去完备的学习物资、多彩的兴趣课程、温馨的暑期陪伴以及实现梦想的希望，鼓励他们放飞梦想，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事迹材料】

实践团在朱房村梦想图书馆开展社会实践，为来京务工人员的子女开展了共计 108 课时的支教活动；完善了梦想图书馆：修复图书，并分类重新摆放，培训多位图书管理员；带孩子们参观北京科技大学校史馆。此外，实践团的成员还募集了体育用品、益智类玩具等物资，以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本次实践活动借修复完善梦想图书馆来关爱来京务工人员的子女，放飞孩子们的梦想。

在北京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有着一个城中村——朱房村，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对于这个地方的孩子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放飞梦想的地方。实践团的成员来到这里进行支教活动及实地调查。

实践团观察询问后发现，图书馆里的物质缺乏，空间狭小，资源分配不均，图书摆放凌乱，借书系统不完善，图书捐赠冗余，只有一名图书管理员，当孩子们多的时候，管理会出现问题。针对此现象，实践团的成员部分进行支教，其他人对图书进行修复，将图书分类重新摆放，并培训了多个小图书管理员。实践期间，实践团成员带领孩子们进行户外素质拓展活动；开展了 4 次宣讲课程：军事、梦想、感恩、安全；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实践团还开展了折纸、绘画、手绘文化衫等活动；带领孩子们来到北京科技大学校史馆进行参观……

实践团在最后为朱房村图书馆举办了募捐活动，募集了体育用品、益智类玩具，并为图书馆更换了灯管，完善了装修。实践期间，实践团的成员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充实了孩子的暑假生活，也给孩子带去了陪伴和关爱。

在实践结束后，实践团得到了图书馆馆长、孩子们、家长及图书馆个人志愿者的认可。



从修筑出村土路到疏通意识觉醒的心路

云南心路——益心益意实践团进行磨脚村孩子意识觉醒 扶贫行动

【事迹简介】

云南心路——益心益意实践团连续两年前往贫困山村——云南省曲靖市磨脚村开展精准扶贫行动。两年来，该实践团调查了解了村民贫困的原因，并为改善该村的贫困状态做出了持续努力。2015年，实践团成功助力了当地政府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该实践团在实践过程中调查发现该村存在严重的教育意识问题，这是该村贫困的根本原因。为实现进一步帮扶，2016年，该实践团进行了以“意识觉醒”为主题的社会实践，带孩子们走出大山，以帮助该村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事迹材料】

北京科技大学心路实践团成立于2015年，他们的目的是为改善云南省曲靖市磨脚村的贫困现状做出努力。2015年暑假，心路1.0实践团成功助力当地政府推进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然而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的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成为导致该村贫穷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进一步帮扶，心路2.0实践团于2016年暑假再次前往该村，进行了以“意识觉醒”为主题的社会实践，带孩子们走出大山，以实现自主繁荣富强。

实践前期，团队成员积极投入准备活动，与孩子家长、教师等联系多达60余次，筹得近3万元的善款。在咨询了心理学教师、社会学教师，并对活动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该实践团制定出了谨慎、严密的“一带一”四阶段活动路线，分别是“梦想照进现实”“榜样明晰目标”“实践带来体悟”“渴望变身动力”，真正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心灵的改变。“梦想照进现实”：团队成员通过在天安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馆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心中的祖国梦、读书梦、科技梦；“榜样明晰目标”：通过带孩子们走进北京大学课堂、和优秀学长交流，来勉励他们用知识去改变命运；“实践带来体悟”：通过心理游戏及登长城，让孩子们深刻理解责任与坚持；“渴望变身动力”：成长对话课，进一步激励他们用功读书、努力奋斗、永不放弃的信念！

在实践过程中，团队体察民情，做实事，获得当地村民的一致好评。14天里，孩子们心中已经播下了成长的种子。心路实践团将持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继续朝着实现“一队人带富一个村”的目标走下去，从短期来看，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从长期来看，以教育改变村民的思想，真正实现村庄的长足发展。团队成员们坚信：他们的努力会为一个村庄带来希望，他们的汗水定会托起明天的太阳。



用大学生的光，照亮留守儿童的心窗

育苗云南留守儿童心理关怀实践团的支教新实践

【事迹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育苗云南留守儿童心理关怀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走进留守儿童的世界，通过云南省对泸西县玄天文武校的学生开展特色课堂拓眼界、社工活动拉距离、心理陪护近心理三层次的引导，帮助其树立生活的希望；期间通过与政府协商、线上筹款等方式，尽全力改善该校的物质条件。实践团在 2016 年获得国际大学新媒体校园创作金流苏奖。

【事迹材料】

云南省泸西县玄天文武学校，这里的孩子超过 95%是留守儿童，问题儿童占比高达 85%，他们游走在社会的边缘，是家长和教师眼中不可重塑的孩子。实践团经过前期了解发现：孩子的自尊心较强，性格孤僻，存在严重的交往障碍，缺乏心理疏导，缺乏抗挫性；缺乏亲人陪伴，无法及时表达诉求，孩子具有自卑感和挫败感，缺乏管教，道德意识模糊，价值观错位；生命意识淡薄，曾有过自杀行为；视野狭隘，生活迷茫，缺乏对未来的规划。针对这些情况，实践团确立了活动开展的主要形式：开眼界、拉距离、近心理，上午开展轮换制特色课堂，下午进行社工大型活动，期间“一对一”心理帮扶计划并列实施。

“一对一”心理帮扶计划是实践团最具特色和效果的环节。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自闭少语的孩子，确定了 6 位重点关怀对象，设计了不同的帮扶计划。这几个孩子具有以下问题：家庭贫困、自闭少语、缺乏关爱、好吃懒做、有自杀行为、喜欢异性化的东西。实践团通过在活动中表扬不爱说话的孩子，帮助其找到自信，使其开口说话；通过家访，在物质和家庭沟通两方面对家庭贫困的孩子进行帮助；通过谈心，改变异性化孩子周围歧视的眼光；鼓励孩子们走出大山，追寻梦想。在活动期间，通过每天的跟踪记录，形成了每个孩子的成长记录档案，记录着他们的改变。6 个帮扶对象变化明显，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改变。

实践团除了给孩子们提供心理支持以外，还积极地向当地政府及社会寻求帮助和支持。与文化体育局达成文化体育局整修武校球场、武校外出比赛的协定；实践团联系到了泸西电视台、泸西报社、红河日报，使其对活动进行报道，增强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此外，还在线上、线下筹款 5000 余元，捐赠篮球 4 个、乒乓球拍 10 副、图书 160 余册、文具用品 10 套；为了使孩子们能有长期的发展，实践团还为孩子们联系了《中国梦想秀》栏目组，希望他们能找到生活的希望。



全面助力秦安发展的“有为”之旅

秦安县电商扶贫实践团践行“行知”的力量

【事迹简介】

2016年8月，甘肃省秦安县电商扶贫社会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前往秦安县开展社会实践，帮助当地龙头企业优化了微信平台页面和直接购买功能，完善了网上商城，使其美观而更具吸引力，间接使企业销售额提升530万元。在实践过程中，实践团与农民一同采摘桃子、苹果、花椒，参与了疏花疏果、摘带套袋等直接生产过程，共计采访了70余位农民，实践行程达80余里；实践团两次参与政府座谈会议，协助政府拍摄《舌尖上的秦安》宣传片，提高了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此外，实践团也参与了当地公益组织秦安月十团的“为贫困学子凑盘缠”行动，累计为贫困学子筹得善款200万元。

【事迹材料】

甘肃省秦安县是甘肃省人口最密集的地方，16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聚集着61.64万人口，人均土地面积为0.0025平方千米。虽然当地山地众多，种植经验丰富，种植历史悠久，但资源分配不均严重阻碍了其发展，导致秦安成为有名的贫困县，贫困人口高达3万人，占比5%。由于交通不便和技术落后，水果销售一直以传统渠道为主，电商仅占1%左右。

实践团经过走访和调查后发现：当地农民的劳动工作强度大，种植主要面临疏花疏果、喷洒农药、摘套袋等多项任务，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且当地农民不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部分人不愿意申请，也不知道如何申请。而当地企业也面临着品质难以控制、运输成本高等问题，销售出去的桃子的运输成本要占一半以上。同时，包装昂贵、平台不成熟、缺少技术人员也是其面临的巨大问题。

于是，实践团以孟子居创业团队的经验为基础，为企业优化了微信商城和购买平台，开发销售平台2个；与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团交流经验，深入群众，了解农民疾苦，帮助无销路农民与大企业对接，保证水果的销路，帮助无地农民找到工作，为生活基本需要提供保障；为了进一步为当地的农产品做宣传，实践团自行购买了航拍器等设备，为当地政府拍摄了《舌尖上的秦安》纪录片，帮助企业拍摄宣传片，展现万亩桃园的气派景象，并发布到腾讯视频平台，播放量达10000多，让更多的华夏儿女知晓天水秦安、秦安苹果和蜜桃；实践团也与秦安月十团公益组织联合举办了“为贫困学子凑盘缠”系列主题募捐晚会，同时发起网上好心人捐款等，为100名贫困学子募集了每人1000元的路费。实践结束后，实践团联系了秦安县扶贫办，签订了社会实践基地协议，制订了长期帮扶计划。



以志愿支教服务西部基础教育

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暑期支教团赴韩湾小学义务支教并开展志愿服务

【事迹简介】

2014年7月，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暑期支教团（以下简称支教团）一行人抵达秦安县韩湾小学，进行时长两个星期的暑期实践活动。支教团针对不同年级的同学分别开展了语文、数学、外语、科学、素质拓展等8门课程，共完成100个学时的教学任务，还举办了“趣味运动会”“歌咏比赛”“猜谜比赛”等活动。此外，支教团还开展了“晴暖秦安”志愿服务活动，共帮助农户采摘花椒120余斤，为其减少雇用费用900余元。

【事迹材料】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位于中国西部，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这里的基础教育较为落后，教育资源短缺、教育人才流失、地区经济滞后等现状都制约着秦安县教育的发展。要实现脱贫，教育方面是必要的保障。

支教团在实践前期通过两次试讲活动以及和当地教师进一步交流沟通，调整了教学计划，增加了科学、手工等兴趣课程的比例，内容力求新颖有趣，贴合孩子们的兴趣。对于基础课程则分年级教学，在课本已有内容的基础上，拓展推广，在学好基本内容的同时，引导孩子们充分发挥自身潜能，锻炼孩子们的思维拓展能力。在教学活动中期，支教团特别举办了一系列趣味活动，如“趣味运动会”“歌咏比赛”“猜谜比赛”等，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释放了孩子们的天性。系列活动赢得了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支教扶贫不仅要做到教育上的帮扶，更要从根本了解、贴近孩子们的的生活，让孩子们体会到温暖。因此，支教团积极下乡，开展“晴暖秦安”志愿服务活动。

7、8月份正是花椒成熟的时节，有的农户家庭劳动力不足，又承担不起雇人采花椒的费用，可能错过了采摘花椒的最佳时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支教团决定利用周末时间，到花椒地里帮农户采摘花椒。经过调查了解，有10家农户被确立为帮扶对象，团队共分为5组，在甘肃30余摄氏度的天气里，不辞辛苦地在地里劳作。在整个“晴暖秦安”志愿服务活动期间，支教团共帮助农户采摘花椒120余斤，直接为其减少雇用费用900余元，增加了农户这一年的经济效益，也完成了支教团扶贫的另一个目标。



给你一双“眼睛”

索奥智能拐杖科技发明实践团发明“智能导盲杖”，助力盲人出行

【事迹简介】

2015年8月，索奥智能拐杖科技发明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以科技求索实践，研发出一款适用于盲人群体的智能盲杖。这种智能盲杖在检测到前方障碍物时可自动报警提醒盲人避开，在实用性、方便性等多个方面较市场上的普通盲杖都有了很大提高，切实有效地帮助盲人解决出行难问题，得到了使用者的一致好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实践团深入基层，走进盲人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难题，以大学生的力量唤起政府、社会各界对于盲人群体的更多关注。

【事迹材料】

实践初期，实践团针对盲人群体展开调查，发现盲人群体渴望同常人一样外出，但是在出行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心理疾病。实践团员渴望以实际行动助力社会发展，利用自己所学，为盲人的生活带来便利。通过对盲人使用工具的研究，最终实践团成功发明出一款协助盲人出行的智能拐杖。

这款智能盲杖基于微型计算机系统控制，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实现测距功能，并且加入了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来确保测距精准度。当前方一定距离范围内出现障碍物时，盲杖手柄处通过明显震动来及时给予盲人朋友提醒，并且还可以通过不同震动强度告知障碍物的远近，可在普通盲杖探测距离的基础上有效提高250厘米左右。另外，充分考虑到盲人的需求，盲杖采取了红外感应开关，盲人接触手柄时自动触发启动，否则处于休眠状态，最大限度地延长了续航时间。盲杖采取USB接口供电，保证产品的方便性、实用性。考虑到夜间使用的情况，盲杖还加入LED灯及荧光贴膜，在确保安全性能的同时增强了美观。盲杖底部改为滚动装置，更加符合盲人的使用习惯。

除此之外，实践团还致力于进一步改善盲人群体的生活质量。深入走进盲人的日常生活，以大学生的视角拍摄、记录其真实的生活状态。并利用大学生的力量，借助他人之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等宣传方式进行宣传与呼吁，唤起政府、社会各界对于盲人群体的关注，加大对盲人群体的重视程度，发起各项有利政策。在实践后期，实践团获得中国青年网的专题报道，并且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相关活动。



用“互联网+”促进密云水库“不老农家”生态旅游发展

“青春不老走基层”设计无线网络建设方案节省成本
20余万元

【事迹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以下简称计通学院）低年级学生党支部连续3年走进北京市密云县不老屯镇开展“红色1+1”活动，一方面用通信工程技术改善水库生态旅游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村庄直接节省20余万元的技术设计费；另一方面挖掘不老屯的民俗文化，结合密云水库的优良生态环境，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加强对外宣传，提升村庄的知名度。相较两年前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完成了全村WiFi的修理和升级，完善了游客的用户体验；结合专业特色和村庄的实际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如夏令营、宣讲会等支部共建活动；来村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50%，村民收入也翻番。

【事迹材料】

史庄子村位于密云县不老屯镇密云水库旁，环境秀丽，拥有丰富的旅游和养生资源。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和宣传力度不足，该村的旅游产业一直难以发展。2013年，北京科技大学计通学院本科2012级第二党支部前往史庄子村，与该村党支部对接共建，提出并设计了WiFi全村覆盖的方案；2014年，计通学院本科2013级党支部与史庄子村再度携手，帮助村庄解决了WiFi无法使用的问题。2015年5月，计通学院本科2014级党支部决定再次接过共建的火炬，继续组建“青春不老走基层3.0”实践团，邀请通信系教师和党支部一起帮助该村对WiFi进行修复和升级。创造性地实现了学生、教师、史庄子村3个支部的“红色1+1+1”。

7月，实践团来到史庄子村，定点测试WiFi信号强度。经过不断排查锁定了WiFi信号弱的根源：一个中继站被烧毁，导致信号传递断裂。实践团与当地移动公司磋商，移动公司后台数据部最终解决了动态IP的问题。针对被烧毁的中继站点，实践团请来百里以外的施工队完成了全村WiFi的修理和升级。至此，村内无线信号和网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完善了游客的用户体验。

此外，实践团还结合专业特色和村庄的实际需求，给参加夏令营的小学生开办了“互联网基本常识”宣讲会；逐家拜访了109家农户、51家农家乐，统计了房屋户型、食宿价格和联系方式，制作成《不老农家》宣传册，方便游客联系；结合实际写下了《致不老屯镇史庄子村的一封建议书》，为村子的发展建言献策。



促动“宇宙中心”不再拥堵

五道口交通现状调查实践团协助解决交通信号灯错乱问题

【事迹简介】

五道口作为都市繁华地带，交通拥堵现象极为明显。交通现状与交通信号灯社会调查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以五道口地区的交通问题为调查对象，面向 500 名市民发放问卷，了解到市民对五道口地区的问题焦点为“信号灯等待时间长”“信号灯有时发声不协调和错乱”等。基于此问题，实践团开始对五道口地区的交通信号灯进行实地观测，在成府路口 4 个街角全程记录信号灯的变化频率，采集大量第一手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同向信号灯的“15 秒错乱”和十字路口的“全红灯错乱”两种“错乱”。调查结束，实践团将调查数据、图表和相关建议及时反馈给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宣传科及交通信号灯管理警官。目前五道口损坏的信号灯已经得到了有效修复，关于“错乱”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正在研究推动过程中。

【事迹材料】

交通拥堵是大城市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实践团致力于对该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实践团以五道口地区为调查对象，面向 500 名市民发放问卷并进行问卷回收与数据分析，了解到市民对五道口地区的问题焦点为“信号灯等待时间长”“信号灯有时发声不协调和错乱”等。

实践团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两种交通指示灯“错乱”：一是同向信号灯的“15 秒错乱”，火车来临前，机动车信号灯和行人信号灯会出现“不一致”，即机动车灯为绿灯时同方向行人信号灯为红灯，这种错乱每次会持续 15 秒；二是十字路口的“全红灯错乱”，无火车经过时，成府路、荷清路与财经东路交汇处会出现四面红灯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 9~45 秒不等。这两种“错乱”都会导致行人及非机动车肆意横穿马路，加剧交通拥堵问题。

基于调查中的问题发现，实践团将调查数据、图表及调查结果及时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宣传科及交通信号灯管理警官进行了反馈，并建议进行信号灯修复与故障排查。实践结束后，团队继续进行后期走访，了解到五道口损坏的信号灯已经得到了有效修复，关于“错乱”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正在研究推动过程中。



以孤老牵线模式创新公共养老机制

“爱之桥”实践团赴山西晋中为 10 对孤儿孤老牵线

【事迹简介】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孤儿和孤老这两个群体的数量在增加。他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内心孤独，渴望被关怀。“爱之桥”老孤牵线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用爱心搭起一座桥梁，前往山西晋中市福利院开展老孤牵线志愿者服务。实践期间，实践团通过做义工、做采访等形式了解和熟悉福利院的管理模式，进而展开孤儿和孤老的牵线活动，成功实现 10 对孤老牵线，实践内容得到了榆次时报的关注和报道。

【事迹材料】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多数家庭的子女外出务工，留双老独自在家。同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一对夫妇无法照顾 4 个老人，因此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在养老院度过晚年。除此之外，由于父母意外身亡、离异等，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孤儿院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来自至亲的关怀和爱，养老院的老人们没有子女的陪伴也会空虚孤单。基于此，实践团产生一个设想：在孤儿院和养老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没有父母的孤儿和很少见到儿女的老人联系起来，使孤儿得到关怀，也使老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实践团在晋中福利院把这个设想付诸实践，通过义工劳动、组织两方连线活动、调查研究等方式，为他们建立爱的桥梁，使孤独的心互相温暖。

8 月 2 日，实践团踏上了前往山西的实践之路，在晋中市福利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义工活动。在此期间，实践团对 10 余名孤儿和老人进行了采访，进一步了解了孤儿和老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充实修改了孤老牵线活动的策划方案；同时对福利院院长、孤儿院院长和养老院院长进行了采访，了解这种牵线模式的制度障碍，据此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在为期两周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团共开展了 3 次孤老牵线活动，通过共同游戏、表演节目等形式，使孤儿和老人进一步熟悉，敞开彼此的心扉，最终团队成功为 10 对孤老牵线。

实践团拍摄了以孤老牵线模式为主题的微电影，同时实践活动被当地的榆次时报报道。通过大量的宣传，为孤老牵线模式的进行进一步推广，使更多的相关人群受益。岁月漫漫，希望他们可以彼此关爱，互相陪伴，互相温暖。

“结石病的防与治” 科普宣讲行动

肾结石调查实践团深入老君关村开展结石病科普宣讲

【事迹简介】

肾结石调查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深入国家级贫困农村——贵州老君关村，针对当地结石病高发而医疗卫生条件跟不上的现状，从疾病认知方向着手，展开社会实践活动。实践过程中，实践团对当地饮用水水质进行了检测并结合走访调查，发现了当地结石病高发的病因——长期直接饮用地下水。基于此，实践团组织开展了“结石病防治”宣讲活动，联系医生为当地村民讲解结石病的预防和治疗。同时还联系到黔西县中心医院，为当地村民开展义诊。

【事迹材料】

贵州老君关村是一个结石病高发的村子，但当地人的治疗意识很淡薄，要等到结石痛得不能忍受才会去医治。当地结石病高发的原因，很久以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实践团来到当地以后，四处走访，与村委会村长、政府及长年定居于此的老百姓交谈，与县城医院的内科医生交流看法，并利用当地资源对当地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最终，实践团发现当地结石病高发是由于当地人长期直接饮用地下水，并且有长时间饮用浓茶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深入了解到当地的需求后，实践团联系了县城医院，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在老君关村开展义诊和“结石病防治宣讲”活动，并把范围扩大到整个雨朵镇，为当地居民普及结石病的科学预防治疗等知识。义诊和宣讲活动举办当天，现场人数超过 150 人，气氛热烈。

活动中实践的团成员纠正了当地一些错误的饮食习惯，同时还普及了许多科学、健康、卫生的生活小常识。当讲到肾结石、胆结石的症状和治疗时，大家立刻谈论开，纷纷谈论自己疾病的症状，并且分享了治疗的经验。医生来到现场以后，从专业角度讲解了结石的预防和治疗。义诊结束后，实践团还分发了用之前筹集的几百元钱买的 150 件小礼品。

此外，实践团还与当地农民共同劳作、调查饮用水源，进一步为当地人科普安全用水及如何养成健康习惯的知识，增加其对水质安全的了解。实践团深入基层考察与体验，坚持从根本上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为其减少病痛的折磨，并将这种知识传递下去，为村子日后的发展与传承打好基础。



情系“淮河水”，爱聚“癌症村”

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募集25万元公益基金开展生物净水行动

【事迹简介】

河南省沈丘县是淮河流域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流经地，长年遭受淮河水质污染的困扰，县属村庄大部分因饮水原因出现癌病高发现象。自2007年以来，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连续第7年前往河南省沈丘县，开展关爱帮扶“暖阳”行动。7年来，他们持续跟踪水质污染情况，走访和帮扶基层百姓，并募集到25万元公益基金，在当地10个村庄建设了生物净水站，让3000余户百姓喝上了健康清洁的饮用水。

【事迹材料】

2009年，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与沈丘县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联合发起了“淮河污染区地表饮用水的生物净化行动”，该行动在全国水创意竞赛中一举获得金奖，赢得了25万元的种子基金。该行动依托生物技术，通过培养具有净水特性的生物集群，完成对地表水的自然净化，并得净化后的水北京科技大学环境系实验室中进行了检测，结果证明了净化后水的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随后，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与沈丘县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共同研讨制定了“生物净水行动”的策划案，根据当地村庄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散布点、就近定点供水”的办法建造生物净水装置，每30户共用一组，日产水量超过8吨，实行参与式、自助式的使用和管理，使村民真正喝上干净水。截至2012年，“生物净水行动”已经在沈丘县东孙楼、洼子庄等10个村庄建设了生物净水站，解决了当地3000余户百姓的健康饮水问题，大幅改善了当地“饮水得病，因病返贫，贫病交困”的状态，从而起到“清洁饮水救助”的作用。

2012年，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依托在“挑战杯”“节能减排大赛”等科技实践竞赛中获得的奖金建立了总计5万余元的“暖阳基金”，重点帮扶淮河沿岸村庄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紫娃娃”（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和“穷娃娃”（肿瘤病患者子女），他们年幼时便因为生活环境患病或贫困，失去了原本应该天真美好的童年时光。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依托“暖阳基金”向当地“紫娃娃”和“穷娃娃”实施成长领航行动：一方面开展成长陪伴活动，用爱打开他们封闭的心灵；另一方面开展成长规划课程，引导他们树立目标和梦想，为他们构筑心灵家园和成长乐园。两年来，“暖阳基金”共向当地50余名贫病儿童进行了资助，并与每名资助对象建立了长期帮扶计划。



新媒体技术助力新农村发展，二维码成为农产品种子的“新名片”

“庄户村”实践团为世界种子基地开发网站和二维码

【事迹简介】

2013 年 7 月，“庄户村”实践团第二次前往庄户村实践基地——北京市丰台区庄户村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两年来，“庄户村”实践团与村委党支部合作，帮助庄户村建设排水系统，建立庄户村门户信息网站，为世界种子基地开发了一套包含 3000 多种种子的二维码简介。

【事迹材料】

庄户村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以发展农业与旅游业为主，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于 2014 年举办了世界种子大会。“庄户村”实践团紧紧结合庄户村的实际需求，围绕基层服务帮扶、网络技术助力及世界种子大会相关筹备工作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实践活动。他们探访村里的老党员，调研村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与需求，帮助清理村中心广场，建设村内排水系统；围绕儿童节开展科学小实验、航模表演和科技馆之行等活动；开发庄户村门户网站，编写种子基地中 3000 余种农产品种子的二维码，切实为庄户村的村容建设、科技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012 年，“庄户村”实践团与庄户村村委党支部达成合作意向，在庄户村成立社会实践基地。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课余时间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自学相关技术，为庄户村设计建成了排水系统，使村子在 7·21 特大暴雨灾害中免遭破坏。除此之外，“庄户村”实践团还帮助村委会建立了庄户村门户网站，采用新媒体扩大村庄的宣传与影响力。

2013 年，“庄户村”实践团针对庄户村 2014 年世界种子大会基地的专题改造与丰台区农业局进行合作。“庄户村”实践团在种子基地考察具体情况，多次向基地梅站长请教，同基地工人探讨具体设计方案。最终他们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基地 3000 多种种子设计了二维码简介。从创意构思、方案细化到查阅资料、编写程序，“庄户村”实践团在与丰台区农业局的专业人员沟通后，将正式上线种子二维码简介，与会人员只要用手机轻轻一扫便可获取该种子的全部信息。



以专业知识服务农村发展的“无线网络” 筹建行动

“青春不老走基层”设计无线网络建设方案节省成本
20 万元

【事迹简介】

2013 年暑假，“青春不老走基层”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走进北京市史庄子村开展网络帮扶系列实践活动，先后举办了两场计算机讲座，为村民进行电器义诊共计 20 余件，发送计算机宣传单 50 余张，为村庄设计无线网络建设方案，预计节省建设成本 20 万元。

【事迹材料】

史庄子村位于北京市密云县不老屯镇深处山区，该村坐落在不老湖畔，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民俗旅游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史庄子村在网络宣传、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尚不完善，村内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网络覆盖来满足村民生活和广大游客的需要。

实践团充分考虑到史庄子村农户住地分散、村庄分布狭长的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对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建议史庄子村建设无线网络，并结合村子的实际情况为其设计建设无线网络的具体方案。

实践团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对当地的地理条件、线路分布等涉及无线覆盖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发现史庄子村村庄分布呈狭长形，住户沿公路排列长达 2 千米，这与其他多数村庄的自然情况不尽相同。实践团的成员通过上网查阅无线覆盖相关资料、咨询专业任课教师，了解到可以采用以基站为中心发射信号的方式为村庄实现无线网络覆盖。经过多次与相关专业人士的咨询与沟通，从询价、估价、预算 3 个环节入手，反复推敲，不断细化内容，订正修改，最终形成了一份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无线网络覆盖方案。实践团的成员积极帮助史庄子村联系了联通公司，在密云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史庄子村的无线网络正在建设之中，该方案预计节省成本 20 万元。



携手公益组织，筑梦留守儿童

“康县之歌”实践团捐助秧田小学价值 1 万多元的故事盒

【事迹简介】

2014 年，“康县之歌”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与“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取得联系，与多家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上学路上”官方微信平台收集了一万条互动留言，筹集了一万多元善款，并将所筹得的善款全部用于购买 MP3 故事盒，共计 103 个。同时还邀请著名主持人欧阳夏丹录制精美故事，完成了故事盒的制作。暑假期间，实践团前往实践地康县秧田小学，将 103 个 MP3 故事盒带给学校的留守儿童，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支教活动，同时对故事盒的实际效益问题也进行了实际调研，将相关调研的数据和结果及时反馈给了“上学路上”公益组织。

【事迹材料】

在前期准备的过程，实践团与“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双方在多次沟通后一起与多家企业进行沟通，达成了每在“上学路上”官方微信平台上募集到一条留言，企业就捐助 1 元钱的协议，所有捐款将用来购买 MP3 故事盒，并和相应的厂家协商后每个 MP3 以 100 元的优惠价购买。利用“上学路上”公益组织的社会效应和大学的社会角色，实践团主动与欧阳夏丹等著名主持人取得联系并邀请他们录制励志成长故事，还在学校和社会上发起了为留守儿童志愿录制成长故事的倡议，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实践团在甘肃联系到了一个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作为帮扶对象，全校共有 103 位学生，要使每一位学生得到一个故事盒，共需募集一万多条留言。实践团的成员起初在校园内进行募集，从开始的一天 100 多条到后来留言数成指数增长，同时实践团还成功举办了两场大型的外场宣传活动。在期末考试临近阶段，大家坚持在课余时间内继续开展募集活动，终于在暑假前期成功募集到一万多条留言。而同时进行的故事盒子录制工作也顺利完成。

暑假期间，实践团带着 103 个 MP3 故事盒来到康县秧田小学，在开展支教活动之余，对 MP3 的实际效益也做了充分的调研，针对“上学路上”以往“即送即走”的一次性帮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意见。同时，实践团还为当地学生组织了一场绘画比赛，优秀作品用于画展与义卖，将所得善款筹集汇总，用于购买更多的故事盒子，为更多的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帮助。



志愿解庄，与农同乐的志愿服务行动

“心系群众，助扶农村”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大同县解庄

【事迹简介】

2014年8月，“心系群众，助扶农村”志愿服务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一行八人来到山西省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开展为期14天的志愿服务活动。期间，相继完成走访老党员、开办计算机知识讲堂、素质拓展活动、“情系解庄，你我同乐”歌舞联欢会、农业知识下大棚、黄花市场调研、建立解庄小学网站和建立黄花种植基地微信平台等一系列活动。

【事迹材料】

实践前期，实践团团长与解庄村小学校长取得联系并深入了解村里的情况，确立实践团的活动目标。

实践期间，实践团开展了走访老党员活动，深入了解基层老党员的心声，畅聊村中几十年的变化。在解庄小学校长提出希望实践团改善村民计算机知识匮乏的情况后，实践团制作讲稿并举办了两次计算机知识讲堂，为村民详细讲解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日常上网操作，普及了互联网知识，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计算机基础操作能力。实践团在村中招募了16名儿童，开展了两次素质拓展活动，进行了一系列互动体验游戏和科学实验，开展了手绘T恤设计活动。并自费为孩子们精心准备文具礼物，丰富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为了丰富广大村民的文化生活，实践团准备了一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歌舞联欢会，并得到当地乡韵艺术团的大力支持，联欢会的表演除了实践团的成员及艺术团的成员精心准备的节目外，还有实践团的成员前期带领孩子们排练的舞蹈，以及T恤展和村民自愿报名的节目。表演当天虽值阴雨天气，但全村村民仍冒雨赶来观看，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当地电视台对此次联欢会进行了详细报道，得到了解庄村全体村民的一致好评。同时，实践团在了解了解庄村基础教育及黄花种植基地缺乏网络建设的实际情况后，为解庄小学制作了学校门户网站，为黄花种植基地建立了官方微信平台，推送黄花收购的相关信息，并对黄花市场进行了充分调研，总结成黄花市场调研报告，为当地村民销售黄花提供了完善的市场信息，方便村民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切实提升了当地村民的实际收益。



关爱麻风病人，为麻风病正名的“微尘”行动

“贝壳微尘”关爱麻风行实践团深入麻风村还原麻风病的真实面目

【事迹简介】

2014年7月，“贝壳微尘”关爱麻风行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前往湖南省汝城县乌泥洞村（麻风村）深入走访调查，实践团印制了2000多份传单在全校范围内宣传该活动，通过QQ、微信、人人、微博等多种宣传渠道，还原了麻风病的真实面目。同时还为麻风村的村民募捐衣物重达1吨，筹集书籍约800本，通过义卖筹集了2061元的爱心资金。为扩大宣传，实践团在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了一次以“贝壳微尘，关爱麻风，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外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麻风病。实践团还深入大山深处的麻风村，给那里的人们带去来自北京，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温暖。

【事迹材料】

谈及麻风病，许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担心自己被传染上这个“绝症”。这一现象的根源就是社会群体对麻风病的“无知”，也正是这份“无知”使得麻风病人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且麻风病一直得不到彻底控制。而实践团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种宣传来改变人们错误的传统认知，使更多人能够正视麻风病人，使更多麻风病人得到认同与尊重。

实践团的成员通过走访村民，与村里的多户老人建立了彼此信任的伙伴关系，并为他们送去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学子的关怀与温暖。他们为村民发放在学校募捐到的生活用品，为当地的老人们送去了蚊帐、凉席的生活用品，为当地的儿童送去了英语词典、笔记本、画笔、书籍、象棋等各类学习用品。除此之外，实践团在实际走访过程中还了解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大量的生活必备品，实践团用先前筹集来的爱心资金为村民购买了洗洁精、洗衣液等卫生用品，更是为村民们带去了多种在山中难以得到的新鲜水果。由于村民大多年岁已高，多数村民身体患有残疾，不方便打扫卫生，实践团的成员还帮助村民做家务，帮助高龄村民减轻家务工作的压力。

实践团在返回北京后，积极与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取得联系，并制作了在全国巡回宣讲活动的宣传视频，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麻风病，为麻风病患者得到社会认同与更好地治疗作出积极的努力与贡献。



寻访长征精神，砥砺青年前行

北京科技大学的青年用行动传承精神内涵

【事迹简介】

2016年夏天，80余名北京科技大学的青年组成团队，前往长征沿线各地展开长征精神的寻访、宣传，以及长征故事的搜集整理、红军老兵的采访、革命老区志愿服务等行动，在火热的夏天将他们的足迹留在了长征路上。

【事迹材料】

2016年正值长征胜利80周年，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招募了80名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分为8支长征精神寻访分团，分别前往遵义、瑞金、于都、阿坝、固原、会宁、西吉、延安等地开展实践，深入长征老区，寻访、弘扬、传承长征精神，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思想方针，赋予长征精神新鲜血液与力量，完成当代青年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实践团组建之初，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开展了长征精神的学习活动，让实践团的成员们了解长征，认识长征精神的内涵。随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多次召开筹备会议，确定各实践团实践的地点和内容，并积极与当地的相关部门联系，寻找长征老红军。

2016年7月23日开始，各实践团陆续前往实践地开展实践活动。带着重走长征路，寻找长征足迹，寻访长征精神的使命，实践团走进当地红军长征纪念馆、吊唁长征英雄烈士陵园，翻越红军翻过的高山，走过红军渡过的索桥。虽然行程长，路途艰险，困难重重，但实践团团结一致，共克难关，不仅战胜了诸多困难，还完成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成果——录制致敬老兵的视频、支教山区小学、采访百岁红军、发放调查问卷、组织进行快闪、绘画长征纪念画轴。实践团的工作获得北京电视台的报道以及当地报纸的头条刊登，实践团亲身感受、灵魂升华，把长征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有些故事，亲身听方知其壮烈；有些人，亲眼见方知其伟大；有些知识，唯有实践才能长久铭记。实践团用脚步丈量历程，通过各种方式体悟、思索、传承长征精神。

寻访长征精神的社会实践只是实践团一小部分人的学习，下一步，实践团要展示出实践团的学习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长征精神，让长征精神在当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弘扬和发展长征精神是当代青年的责任，这些用鲜血铸就的精神丰碑是青年进步、国家富强的力量源泉，实践团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它们传承下去！

宣讲“降农药危害”的环保科普行动

“圆生态村梦”实践团赴四省市开展环保科普巡回宣讲

【事迹简介】

“圆生态村梦”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在四省多地农村基层开展环保科普宣讲，惠及 2000 余基层百姓。学生结合本专业知识自行设计宣传材料，用群众易于理解的方式向群众传授科普知识，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事迹材料】

2013 年 7~9 月，“降农药危害·圆生态村梦”巡回宣讲团先后奔赴河南、安徽、内蒙古、北京等地进行“降农药危害”巡回宣讲活动，共举办科普宣讲 8 场次，覆盖基层百姓 2000 余人，累计发放宣传单 1255 份，食品安全手册 100 册，环保手册 100 本，宣传挂图 2 张，用实际行动呼吁当地农民改变了当地滥用农药的现状，从根源上减少农药危害，并为居民提供了科学清洗蔬菜瓜果的方法。

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成为解决问题的利剑，但农药在改善农作物的同时也给人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农药降低了人们的健康指标，影响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实践团结合自己的化学专业知识，利用暑假的时间在实践地开展宣讲活动，宣传科普知识，大大提高了当地居民的农药危害意识。

在实践过程中，实践团的成员拜访了农业局，了解了当地的农药使用情况，又辗转到田田间实地考察，帮助农民拔草、喷洒农药，并对在此过程中发现的村民的不合理做法给予了适当建议，并合理回收废弃的农药袋，给当地居民讲解农药袋的处理方法。在体验了一系列农业劳动后，实践团的成员根据村民劳作的实际情况在村里系统开展了 8 场宣讲，分发宣传资料，主要围绕农药对人体、环境的危害，如何降低农药危害（从科学使用农药方面讲解），以及农药中毒后如何急救等内容。实践团还进行了现场洗蔬菜瓜果的教学，针对每一类产品提出不同的清洗方案。



公益创业新形式帮扶无业妇女再就业

“益心益意”——外来无业妇女帮扶实践团助外来无业妇女获得收入来源

【事迹简介】

“益心益意”——外来无业妇女帮扶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以外来无业妇女为帮扶对象，通过创新运营思路，构建新渠道帮助妇女再就业。在帮扶行动中，实践团利用新媒体、电商等手段，充分利用妇女掌握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实现独立生存。

【事迹材料】

2014年7月，实践团的12名同学进行了为期15天的社会实践。实践团运用“回收—再加工—营销”的运营思路，在学校和社区回收旧衣物，并将募捐到的旧衣服免费交给外来无业妇女们，让她们将旧衣服进行再加工，改造成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再由实践团帮助他们搭建销售渠道进行售卖。为此，实践团建立了“益心益意”微博账号和微店。

实践团运用“回收—再加工—营销”的运营思路，将昌平区东沙各庄确定为合作群体。实践团将高校学生作为回收旧衣物的对象，通过在各高校宣传，使许多人愿意捐出自己不需要的衣物。为了提高活动的公信力，实践团制订了严格的反馈计划。在回收衣物时，他们就给衣服进行编号，并在每次接受捐赠时表示感谢，确保爱心得到回应。关于改造环节，实践团决定借鉴同心互惠的成熟经验，同心互惠是一个发展旧衣改造比较有规模的公益组织。同时，实践团还联系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专业的同学为改造提供产品设计方案。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后，项目运行得尤为顺利，2014年5月，实践团的微博账号正式建立；2014年7月，人人公共主页正式建立。2014年8月，实践团的微店正式成立。截至目前，经过微公益官方微博的转发，实践团的“益心益意”微博粉丝量超过5000。实践团同时共制作了7种样品，80件产品，共成功60件销售产品。

3个月来，实践团通过他们的行动改变了旧衣的利用方式，帮助拥有一技之长却无法使自己得到收入的无业妇女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收入来源，成功使她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关爱帮扶留守人群的“晨夕共护”行动

“晨夕共护”实践团为老河村留守人群捐赠价值 8000 元的物资

【事迹简介】

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代表的留守人群的生活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晨夕共护”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前往四川省贫困农村，用各具特色的行动帮助当地留守人群，为他们带去真实的改变，受到村民们的欢迎和喜爱。

【事迹材料】

2014 年 8 月，“晨夕共护”实践团来到老河村开展关爱留守人群一系列活动。期间，实践团举办了安全、健康知识讲座；免费为 106 位老人拍个人照和 31 户家庭拍全家福；开展了捐赠活动，为贫困留守人群送上价值 8000 元的物资。

老河村位于四川省简阳市云龙镇东南方，全村面积 1.7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1599 亩，现辖 8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1339 人，其中贫困人口 365 人，占总人口的 27.2%。作为四川省的重点扶贫村，村民生活水平低下，常住人口大部分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建设均相对落后。

实践团的活动共分为七部分。一是开展支教活动。为留守儿童进行暑期作业辅导、素质拓展。举为英语课堂和创新课堂，开阔孩子们的视野，激发其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二是整理村中的图书馆。实践团通过走访村民、问卷、广播、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该书屋，为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做调查研究并提供意见，并写成论文发送给资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三是开展义诊。实践团联系当地医院为留守老人免费体检，提出可靠的科学建议，并制作健康卡作为他们今后生活饮食方面的参考。四是举办安全、健康知识讲座。实践团通过相关知识讲座，为老人普及相关知识，为咨询详情的老人整理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食物调理法 10 多份。五是开展寄家书、寄照片活动。实践团在村里进行走访，用了 3 天时间，走遍全村 8 个队，免费为 106 位老人拍个人照和 31 户家庭拍全家福。六是开展捐赠活动。实践团在 2014 年 8 月 7 日在慈善总会的资助下开展了捐赠活动，共为老河村贫困留守老人、儿童送上毛巾被、大米、学习用品等价值 8000 元的物资。此外，实践团还联系简阳市共青团，为村民借来投影仪播放电影，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深入农村普及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

山西“知愿解心”实践团开展覆盖 1200 余人的初中生心理知识宣讲

【事迹简介】

山西“知愿解心”实践团（以下简称实践团）前往基层农村，为当地初中生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实践团针对不同类型的初中生设计了不同方案，覆盖了 1200 余人。

【事迹材料】

在 2014 年 7 月 4~10 日的 7 天时间里，实践团在建昌县举办了 3 场宣讲会，总覆盖人数在 1200 人以上，宣讲以初中生心理健康为主题，宣讲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科学充实，在当地取得了相当不俗的反响。

基于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实践团开展了这次跨专业的实践，通过详细科学的调查，对现状拥有较准确的判断，决定开展宣讲以达到帮助社会上广大初中生健康成长的目的。实践地点是一座经济欠发达的小县城，其中初中生成分较复杂，有的身处单亲家庭，有的深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更有大量留守学生，可以认为该地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代表着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城镇或农村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3 场宣讲会于 3 个不同的地点开展，经实地调查，实践团选择了初中生相对较多，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宣讲内容基于对实践前期问卷调查与采访调查的结果考虑，有条理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结合实践团成员自己的认识与成长的经历修改使之更符合实际，以引起这批时代不同的初中生的共鸣，准确、真实而又有说服力地描述初中生心理的特点，并尝试解释与克服初中生的一些常见心理问题。此外，为增加宣讲会的附加价值与合理性，宣讲还为现场听众讲述了普遍适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和一些有效的减压方法，使到场的家长能更好地理解与疏导初中生的心理。实践团还通过收集专业资料、咨询专家，仔细筛选编辑了一本简单实用的初中生心理健康知识小册，内容主要包括心理基本知识、初中生常见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基本方法，共印制 300 份，在宣讲现场发放，以期延长宣讲的影响，并对当地群众的心理教育有更专业的指导。整个宣讲过程得到了当地一名中学校长的全力支持，还受到了当地两家媒体的报道，在当地掀起了一场对心理知识的思考与关注的潮流。

第三篇

体悟·时代脉搏

媒体眼中的

北京科技大学的社会实践

媒体报道对于大学生社会事件的作用可以初步概括为 3 个方面：一是营造氛围，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二是利于成果分享和经验传播，广泛受益于学生群体；三是激励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本部分汇总 2013~2016 年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媒体报道精品，涵盖社会调查、公益服务、科技发明三大板块。



大学生重走长征路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2016 年 10 月 13 日北京出版集团联合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牢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长征长征》新书发布会暨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总结”活动。

80 年来，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2016 年 7 月，在北京科技大学拉开序幕，北京科技大学组织了 8 支大学生捐书信使队伍重走长征路，为长征路线上急需图书的小学捐去了北京出版集团下属出版单位出版的最新少儿类图书 3 万余册。

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王维才说，北京科技大学是一所具有优良社会实践传统的名校，其中“大学生社会实践”曾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大学生重走长征路”就是发扬长征精神的重要实践活动。大学生们通过重走长征路，重温了历史，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也理解了长征精神，历练了心灵，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见证了长征沿途的新变化。而《长征长征》的出版则为再现红军光辉历程、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长征长征》由《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长征长征西路军西征纪实》三部组成，将红军长征的记录具体细化到每一天，对于国共双方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红军艰苦异常的征战生活都有鲜活地呈现。本书作者陈虎认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红军指战员们在长征途中对革命理想事业无比忠诚、坚定的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即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

原载：《人民日报》，2016-10-20



京港青年伙伴，携手探索北京



京港两地高校学生循着北京地图探索知名文化景区

“携手同成长，共筑中国梦”2016京港青年伙伴训练营，于7月24日晚在北京科技大学落下帷幕。170余名京港青年学生在京完成为期一周的学习交流活动。

该活动由北京团市委、北京科技大学、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共同举办，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两地青年参加了此次训练营。训练营有效融合了京港青年的国情教育认知、综合素质拓展、团队精神培育等多方面的需求，开展了青年领导力课程、创业计划训练等培训项目。港方领队、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委王柏荣说，我从香港来内地工作3年，见证了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香港年轻人如不亲身参与这一进程，将错失巨大机遇。

今年刚从香港大学毕业的邝慧婷参加完此次活动说，北京平台大、机会多，希望有机会来内地发展，做好京港两地的桥梁。北京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赵金丹说，在团队建设中感觉到香港的同学们思维活跃，富有创新意识，值得内地同学学习。

据悉，今年共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10余所高校参与承办京港青年伙伴交流营，陆续在暑期开展短期访学、商业实习、文化交流等社会实践活动。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26



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开展关爱帮扶“暖阳”行动

2013年7月1~13日,北京科技大学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连续第7年来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高发地区——河南省沈丘县,开展了关爱帮扶“暖阳”行动。两周中,13名大学生组织了监测水质污染、走访基层百姓、帮扶贫病儿童、对话政府部门等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据介绍,河南省沈丘县是淮河流域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流经地,长年遭受淮河水质污染的困扰,县属村庄大部分因饮水原因出现癌病高发现象。北京科技大学保卫淮河“爱之村”实践团自2007年以来坚持于每年暑期开展关爱帮扶“暖阳”行动,持续跟踪淮河主河道和村民饮用水的水质情况,走访受水污染严重村庄的百姓的生活状况,依托大学生科技实践奖学金建立“暖阳基金”帮扶贫病儿童,希望用大学生的爱心行动为受到水污染影响的百姓送去关怀和温暖。

实践行动中,大学生们先后走访了黄孟营、东孙楼、洼子庄、大吴庄、大王楼等10余个村庄,认真调研了村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情况,详细了解了村中百姓的生活状况,同时将调研到的基层信息第一时间发布到团队的微博主页上。活动中,同学们重点关注到一部分患病和贫困居民,主动与他们开展沟通交流,热心地为他们出谋划策,努力帮助他们早日摆脱困境。此外,大学生们还前往沙颍河闸口观察水质情况,调研莲花味精厂的污水处理状况,联系当地环保和水利部门开展“与政府对话”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还特别注意到淮河沿岸村庄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紫娃娃”(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和“穷娃娃”(肿瘤病患者子女),他们年幼时便因为生活环境患病或贫困,失去了原本应该天真美好的童年时光。于是,大学生们决定对这样一群弱势儿童实施成长领航行动:一方面主动与他们沟通交流,打开他们幼小的心灵;另一方面开展学业辅导和成长陪伴活动,帮助他们树立目标和梦想,为他们构筑心灵家园和成长乐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践团用过去几年参加“挑战杯”“节能减排大赛”等科技实践竞赛中获得的奖学金建立了“暖阳基金”,为淮河流域的弱势儿童们购买、募集了包括书包、文具和图书在内的爱心大礼包,价值近2000元,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帮助小朋友们在成长的路上更加阳光、快乐。

据了解,在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国家级精品课程的保障下,“爱之村”实践团连续7年前往淮河流域开展社会调查和爱心帮扶“暖阳”行动,调查报告曾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竞赛一等奖、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等。未来一个阶段,北京科技大学的学子将继续“关注淮河水污染,关爱沈丘癌症村”,持续跟踪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民生状况,用实际行动服务基层、回馈社会。

原载:新华网,2013-07-17



北京 18 名大学生重庆拜师棒棒

2016 年 8 月 2 日，中午，热，在渝中区朝天门大正商厦里一场特别的谢师宴正在举行。这场约 200 人参加的宴会，其中有 18 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其余都是重庆棒棒，也是他们的老师。

北京科技大学大一的学生曹煜说：“和重庆棒棒相处半个月的时间里，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血汗钱的含义。这个暑假我们上了一门最有意义的课，在场的所有棒棒都是我们的人生导师！”



大学生体验棒棒生活

曹煜第一次知道棒棒这个职业，是通过央视的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和《劳动与梦想》，重庆棒棒冉光辉在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暑期实践时，他就萌生了来重庆体验棒棒生活的想法。

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曹煜一个，很快他就与北京科技大学的其他 17 名同学一拍即合，给学校报完选题，凑集旅费后，7 月 24 日一支 18 人的团队就上路了。

大热天一上午只挣到 2 元

8 月 1 日凌晨 5 点，天还没亮，天气预报说重庆当天最高 39℃，曹煜和他的小伙伴们带着一腔热血出门了。他们来到朝天门码头，找到了出现在央视节目《了不起的挑战》和《劳动与梦想》里的棒棒——冉光辉。

曹煜一行人跟着冉师傅来到朝天门商圈，在车水马龙的路口停下来揽生意。曹煜杵着棒棒，呆望着过路的行人和车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直没有等到人叫“棒棒”。

太阳越升越高，天气也热起来，冉师傅卷起上衣扇风降热。曹煜发现他身上贴着很多膏药，右边胳膊上还有一块很大的淤青，背上伤痕累累。发现曹煜在看他，冉师傅赶紧把衣服放下来，还特地扯了扯右胳膊的袖口，好像害怕别人看见他的伤口。中午 11 点多，曹煜才开张，还是别的棒棒搬不动了，才叫的他，近 100 斤重的木板直接压在了曹煜的肩上。曹煜瞬间觉得自己矮了，头也抬不起了，最后他得到了 2 元。晚上 9 点收工，曹煜已经被太阳晒蔫了，皮肤一下子黑了好多，因为劳累，手臂的青筋暴起。

半月挣 400 元

昨天，他们算了一笔账：11 个男生、7 个女生来重庆体验棒棒生活，男生两三人结伴轮流当棒棒，女生主要负责整理资料，这半个月下来挣了约 400 元钱。



8月2日谢师宴的费用，是北京科技大学这18名大学生在网上众筹来的1100元，不足部分是他们自掏腰包补上的。他们包下了大正商厦里3楼和5楼棒棒们经常去的两家餐馆，并印了186份餐券发给附近的棒棒，让他们免费去吃面。

大学生的五点收获

再隔两天，曹煜等18名大学生就要离开重庆了，他们总结了从重庆棒棒身上得到的收获。

收获1 棒棒与家人的幸福观：两根冰棒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1509班的朱羲乐：棒棒和家人们的幸福观很简单，两根冰棒就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心满意足，而我们还在为父母没有满足我们的无理要求而给他们脸色，相比之下我们活得太贪心、不懂事。

收获2 不能用爸妈挣来的钱请人吃饭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学院1503班的柳朝阳：我们举办免费吃面活动，有棒棒问我们是不是用爸妈的钱请的，他告诉我们不能用爸妈辛苦挣来的钱请吃饭，不然他们这顿面吃得心里不舒坦。

收获3 棒棒信守承诺：送货不迟到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1512班的胡有衡：对工作负责是我对这个群体最深的感受，送货不迟到，信守承诺。相较而言，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考上大学后就松懈下来，总有各种理由逃课，还自以为能忽悠过老师和家长。

收获4 真正体会到血汗钱来之不易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付祎磊：棒棒很少在外面吃饭，因为外面的饭大多偏贵。而我自己常常会订很多种外卖，不好吃就往垃圾桶里一扔。这次真正体会到血汗钱的来之不易，以后绝对改正。

收获5 书上学的远不如亲身体会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周赞：我们在书本上通过文字学到的东西，远不如在亲身体验之后所闻所感来得有触动。围着小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吃饭，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我们这群在优越的环境中的孩子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原载：《重庆晚报》，2016-08-04



北京科技大学学子与大山里孩子的 “心路”之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要想让村子实现脱贫，最根本的是要让村民们明白意识的觉醒，获得精神的财富。孩子是七八点钟初升的太阳，观念的革新在孩子身上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孩子的觉醒，将会带来一家人，一代人，一个村子，一个地区的觉醒。孩子们是村子未来的希望，只有让孩子们知道知识改变命运，才能以点带面，实现彻底地扶贫与脱贫。以此作为出发点，2016年7月，北京科技大学心路——云南“益心益意”实践团在咨询了多位心理学和社会学教师，并对活动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制定出了谨慎、严密的“一带一”四阶段活动路线。实践团来到云南山区里的磨脚村，用团队自行筹集的资金陪同5个孩子走出大山来到北京，通过“梦想照进现实”“榜样明晰目标”“实践带来体悟”“渴望变身动力”，帮助孩子们看到山外面的世界，开启一段“心路”之旅。

经过33小时的火车后再坐大巴，实践团的成员们终于到达了磨脚村，实践团的成员们拿着行李和带给孩子们的礼物下了车。为了尽早了解当地状况，实践团的成员们开始了对村民的一一走访。



实践团的成员们走访当地村民

实践团的成员们连夜走访着孩子们的家，与孩子们及家长们一同交流，想更好地了解孩子们的情况。他们认真地听着并记录孩子的情况，以便针对孩子对实践方案做出相应的修改。

为了解孩子们的教育情况，实践团的成员们采访了在村子里坚持支教了27年的张老师，由于磨脚村的落后，各个年级的孩子们只能在一个简易的教室中一起上课，受教育条件十分困难。

了解完孩子们的情况后，实践团的成员们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了破冰活动。第二日清晨，他们和孩子们一同爬到山上，孩子们教实践团的成员们采蘑菇，从未接触到最基层的实践团的成员们体验到了大山里的艰苦与乐趣。

在带孩子们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实践团的成员们和孩子们聊着未来，孩子们用笔写下自己的梦想卡。两天后，火车即将到达北京，第一次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孩子们望着窗外，眼神里充满渴望。

此次活动的其中一行是参观各个大学，5个孩子带着崇敬之情留下了合影。为了拉近孩子们梦想与现实中学大学的距离，去往每一所大学，实践团的成员都请该所学校的大学生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学课堂，感受大学的内涵。

几天后，北京的实践活动结束了，把孩子们送到家时，实践团的成员和孩子们都依依不舍。孩子们和实践团的成员拥抱告别，他们并不是孩子们的老师，而是孩子们的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孩子们在纸条上写道：“哥哥姐姐，相信我，在北京等我！”我想，这是最美的约定。



实践团的成员与孩子们惜别

送孩子们回到村子，在村子的最后一天，实践团即将告别，在雨中相拥再见。太多的不舍却只能说再见。孩子们，实践团会等你，会一直关注着你们！

原载：中国青年网，2016-10-12

暑期社会实践拒绝“老三样”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子调研推动导盲犬畅行

2014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程玉亮发起了“关爱盲人出行，导盲犬畅行助推”社会实践团，并在当年成为金牌团队，根据实践内容拍摄的微电影《导盲犬的告白》，还获得了全国首届微电影大赛校园组“十佳影片奖”“北科大社会实践精品成果奖”等奖项。

程玉亮介绍，他2011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同年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部队中，无意间看到了导盲犬珍妮的故事，触动很大，加上国内导盲犬自由出行受限，便立志回学校后开展相关调研。

程玉亮说，导盲犬与缉毒犬、搜救犬、警犬等同属于工种，被形象地称为盲人的“第二双眼睛”。但是，我国导盲犬的数量十分稀少，盲人携带导盲犬的使用率仅为十万分之一。“从数据上看，中国目前约有1731万视力残疾人士，但全国导盲犬的总数只有七八十只。导盲犬的自由出行本应受到社会的支持与帮助，然而由于公共场合的限制以及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盲犬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频频受阻。”

“更让人悲伤的是，即便是目前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使用率也非常低。因为许多场合不能去，所以即便给视障人士配备了导盲犬，可能也很少出行，慢慢地导盲犬也就废了。”程玉亮说。

2014年暑假，为了了解导盲犬的现状，程玉亮团队的10名同学一起到我国内地唯一一家专业性导盲犬培训机构——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进行了调研走访和深度体验。“当时最震撼的就是，我国的导盲犬数量竟然这么少。”程玉亮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配合培训基地针对导盲犬公益组织建立、立法可行性以及社会关注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调研走访之前，程玉亮还组织大家为明星导盲犬珍妮庆祝了6岁生日。在活动中，程玉亮说，导盲犬就是盲人的眼睛，需要社会一同去关爱、去倡导，再通过大学生群体辐射到身边人，将来走入工作岗位也能顺利地接纳导盲犬，为盲人携带导盲犬的无障碍同行而努力。



程玉亮他们的努力和呼吁没有白费。在 2014 年表决通过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中规定，2015 年 5 月 1 日起，视力残障者将可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

“虽然在北京导盲犬自由出行没有受到太多障碍，但是在其他省份还是限制很多。并且，在北京，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乘坐公交车也还是会被拒绝，继续推动导盲犬公益事业很有必要。”程玉亮介绍，未来，他们希望发起我国内地第一个导盲犬公益组织，倡导在更多公共场所允许导盲犬通行，将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2015 年 9 月，他们还将继续进行导盲犬的宣传活动，争取让更多人认可导盲犬。

原载：《京华时报》，2015-08-18



大学生组团下乡，寻找失落的山西古建



在正殿之上加盖顶棚来遮雨的失修古建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了从唐代到清代完整建筑体系的省份，早期木结构建筑存量占全国总量的 75% 以上。据文物部门统计，山西现存古建达 2.8 万处。一处古建往往不止一座单体建筑，通常还包括配殿、朵殿、戏台等配套建筑。因此，山西无愧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称号。然而，相当数量的古建已年久失修，令人担忧，亟待更完善的保护。

从 2015 年 8 月 4 日起，由山西学子组成的北京科技大学“寻找失落的山西古建”社会实践团从山西各地出发会合，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期望通过探访山西古建，了解其保护情况，对古建保护尽微薄之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实践团先后奔赴忻州市五台县和长治市长子县，共探访了 19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 12 处，省级 1 处，县级 6 处）。此外，实践团还对教授、学者、游客、古建周边村民、技术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等进行了多次采访；开设“古建课堂”，与当地孩子们亲切互动，和他们一起手绘古建、寄情未来；在线上开展问卷调查，掌握大众对于古建的相关看法；及时更新微博分享动态，在有限的字数里展现成果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在所探访的古建中，有的已经基本翻新，如长子县天王寺，有的正在修缮当中，如长子县布村玉皇庙，而相当数量的古建则破败不堪、荒草遍地，仅仅在正殿之上加盖顶棚用来遮雨。在长子县团城村的唐王李世民庙中，据村里几位老人讲，庙里的壁画本来保护很完好，但在今年春节期间失窃，至今下落不明。

在长子县法兴寺，实践团遇到一位正在上高二的李同学。他是理科生，却对古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听说实践团在山西探访古建，便表达了自己对于古建的看法。他认为古建筑的长久保护难免会以目前的损失为一定代价，而在这一过程中，国民保护古建的意识会逐



步地全面提升。此外，他并不赞同全面翻新，认为这不是合理的保护模式，而是强加在古建身上的现代印记。

在探访中，实践团了解到，政府对于古建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长子县文物局的李局长提到，从中央到地方，对文物古建保护的财政投入正在逐渐上升。对于国保、省保单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比较规范有序，会邀请具有甲级以上资质的单位编制修缮方案，之后上报省市文物主管部门评审批复；批复之后，方案将进入项目库储备起来，从而下拨经费开展修缮工作。修缮过程中，有大量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相关专家的监督指导，确保全过程的规范和严谨。对于坍塌破败的古建，大多数也已经做过方案，上报国家进入项目库，将逐步安排修缮。“我们的工作也许微不足道，但我们做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实践团的一名成员说，“相信我们的奔走可以提高周围人的古建保护意识，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古建保护中来。”古建之于建筑，正如老者之于人群，老者不应因为年迈而被人遗忘，而应受到更多的尊重和扶持；同样，古建也应受到全社会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更何况古建承载了多少代人炽热淳朴的情结，其意义早已远非古建本身，而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思想感情的载体，乃至心灵信仰的归宿。

原载：《山西晚报》，2015-09-09



我的中国梦，我的蓝天梦！——中国生态城市绿色经济“双赢模式”社会实践之厦门

2013年7月29日，北京科技大学的中国生态城市绿色经济“双赢模式”厦门分队实践团前往厦门进行社会实践。该实践团队旨在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探索厦门市生态经济产业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势所在，以此来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促进中国城市的生态经济双赢发展，实现中国人的蓝天梦想。

访机关 整体把握经济政策

为了了解厦门生态经济在具体行业的体现，实践的团成先后采访了厦门市旅游局的苏处长、厦门市海洋渔业局科技与海洋经济发展处的池处长、渔业处的郑处长。

作为一个岛屿城市，海洋渔业自然是厦门市的传统行业，所以了解海洋渔业在实现生态经济方面的具体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池处长通过鲎试剂、氨基葡萄糖、藻类产油、苗种提供4个具体的项目向实践团的成员介绍了海洋高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4个项目都是运用科技的力量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目标。

走基层 深入体验渔民生活

2013年7月31日，实践团的成员在浯屿岛对岛上的渔民进行采访。码头上、渔船上到处都活跃着他们年轻的身影。在交谈中，一位本地渔民告诉他们：外来捕鱼者的数量几乎是当地渔民的7倍，实践团队成员感到非常不解：为什么当地村民放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不用却让给别人享用？

对于为什么浯屿外地捕鱼者多于当地渔民这一问题，郑处长解释说，浯屿岛是一处大型的海产品集散基地，水产资源丰富，交易量大，当地渔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外来捕鱼者不断加入，这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观企业 精确了解市场竞争

在苏处长的引荐下，实践团的成员参观了厦门市鲎试剂试验场有限公司和厦门市蓝湾科技有限公司。鲎试剂是从海洋生物鲎的蓝色血液中提取的能检验热源的高科技试剂，具有高效、精确等特点，因此被广泛运用于药品、食品检验等领域。蓝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提取虾壳、蟹壳等壳类生物甲壳中的氨基葡萄糖制成氨基糖产品用于关节炎的治疗，实现了废弃资源的有效利用，体现了环保、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两家企业作为生态经济的典型代表，很好地诠释了厦门生态经济的发展现状。

察市民 时刻感受中国人的蓝天梦

作为这座城市的主人，厦门市居民对城市生态经济建设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无论是街头采访还是调查问卷，实践团的成员得到的都是厦门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赞美，从日常见闻中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作为厦门人的自豪。他们理应如此，因为他们是距离蓝天梦最近的人。

原载：中工网，2013-08-19

让导盲犬拉近盲人与世界的距离



实践团与导盲犬

我行我述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我国台湾视障歌手萧煌奇的一首《你是我的眼》，如今成为走红的名曲。有人说，这首歌是献给他的母亲的；也有人说，这是献给他的爱人的。但是，对于所有导盲犬的主人来说，这句歌词大概可以道出他们对于导盲犬的所有感情。这是贺嘉祺在参加了暑假的社会实践之后感悟出来的。

认识导盲犬 从惊讶到感动

贺嘉祺第一次见到导盲犬的时候，吓了一跳，以为见到了一只“假狗”：“那只狗特别安静，从来不叫，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只假狗一样。”后来接触多了，贺嘉祺才知道，经过严格训练之后，只要戴上颈圈，穿上导盲鞍，导盲犬就知道自己进入了工作状态，而进入工作状态的导盲犬会对路人的干扰不予理睬，对于主人的命令绝对服从，并且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上厕所。只有卸下导盲鞍之后，导盲犬才会从工作状态中松弛下来。

此后的十几天里，参与实践的几位大学生在与不同家庭导盲犬的相处当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导盲犬这双“眼睛”的伶俐。贺嘉祺说，坐公交车时，主人跟司机打声招呼，导盲犬就会自动找到老弱病残专座，头顶一下，自己钻到座位下面安顿好，连尾巴也不露出来；如果人坐满了，导盲犬就横过来，头朝司机卧下，主人手扶栏杆站立。不论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主人都会告诉导盲犬在哪一站的下一站下车，导盲犬“听懂”后，会在目的地之前一站站立起来，提醒主人马上到站，“导盲犬特别聪明，甚至还能判断出地铁是哪个方向开门。”贺嘉祺甚至开始相信，他们是能听懂人类语言的。

实践团在上海认识了一位名叫黄鸣的盲人，她说的一段话准确地归纳了导盲犬对于盲人群体的重要性：“盲人什么都要靠别人，求人的日子不好过，明眼人是按他们自己的意愿



让我们做事，而导盲犬会完全服从我们的意愿做事，让我们更加自由。所以相对于家里的明眼人，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手交给导盲犬。”

对于主人来说，导盲犬不仅仅是他们的眼睛，还是他们生活中密切的伴侣和儿女。马宸宇曾经被这样友爱的一幕感动地湿了眼眶：一对盲人夫妇，男人牵着狗，女人的手搭在男人肩上，两人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没有丝毫我想象中的小心翼翼，三者之间彼此的依赖和信任，让我的心头一震，觉得特别美好。”

网上拉赞助 微博竟被屏蔽

贺嘉祺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学读大二了。在这个暑假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会跟盲人群体有什么交集。的确，大高个儿，学校篮球队的运动员——美好的未来在他的眼前才刚刚展开。生活在他的眼里，是那么新鲜，那么光彩夺目。即使偶尔有抱怨和牢骚，但依然掩盖不了他所坚信的生活本身的五彩斑斓。走在路上，看到盲人，他顶多是投过去几束好奇的目光而已。

然而暑期在上海一家犬业基地的社会实践活动，让贺嘉祺和他的队员们不仅认识了导盲犬，也更近地走入了盲人的世界。对于这个群体，他们开始有了越来越特殊的亲切感。

社会实践活动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精品课程。因此，在大一的时候，贺嘉祺和同学院的马宸宇以及其他几名小伙伴们就已经为暑期社会实践做什么而发愁了。

“我们是学经济的，一开始想要做微小企业的发展调研，但是在做方案的时候发现，由于受到自己专业知识的限制，这个专题很难做深入。”马宸宇回忆道。

就在大家都为主题受阻而发愁的时候，一个队员看到了陈燕的故事。陈燕是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音师，她曾多次携带导盲犬乘坐地铁时被拒。这个故事引起了队员们的关注，“大家好像确实很少在北京的地铁、公交上看到过导盲犬，所以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确定了主题之后，队员们开始了前期的策划和准备。其中最让贺嘉祺和小伙伴们苦不堪言的是拉赞助。“一开始，我们想利用学生会的资源，跟合作的商家联系，但是商家对于导盲犬这个领域不是很感兴趣，一般都直接拒绝了。”

无奈之下，队员们开始“广撒网”。贺嘉祺说，最夸张的时候，他们几天之内在微博上给所有能认得出名号的老板和企业发了几百封私信，“最后我们的微博都被屏蔽了。”私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就在贺嘉祺他们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当当网、大佳网来了回音，一家答应出钱，一家答应出书提供给学生进行义卖。“看到两家回复的时候，我们真的都要哭了。

做推广使者 照亮盲人的生活

然而，在实践团的成员调研的过程中，贺嘉祺他们了解到，导盲犬目前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并不高。

“尤其是老人，很多老人认为，狗就是狗，怎么可能会知道什么时候咬人。有位盲人告诉我们，以前她邻居有个老奶奶，一见到导盲犬就打110报警。”

像调音师陈燕一样，盲人带导盲犬乘坐交通工具被拒也是常有的事。“有位李先生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坐公交，有位老奶奶怕狗，坚持不让导盲犬上车，后来还在车上突然大哭以示抗议。”

对此，已是“犬通”的马宸宇解释道，实际上，导盲犬的培育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通常是几代以内没有伤人记录，“对于任何人来说，导盲犬都是绝对温和和安全的。盲人的



生活已经那么不容易了，特别不应该剥夺导盲犬带给他们的便利。”

让实践团的成员们感受最深刻的其实是一场无障碍电影。“之前，我也从没想过，盲人怎么还能看电影呢？然而体验之后，我的感觉是，这电影是真‘不好看’。”贺嘉祺说，观看无障碍电影的时候，有人在电影台词之间做着旁白。他留心观察了身边盲人的表情，一个个努力侧着耳朵，满脸的认真。“说实话，那时候我的滋味挺不好受的，我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旁白的声音、台词的声音，其实会极大地分散人的注意力。这一点让我觉得，盲人们在感受生活的美好方面，付出了比普通人更多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应该剥夺他们可以享有的这点便利。”

贺嘉祺说，未来他们想把导盲犬的项目继续传承下去，推动社会“与导盲犬同行”的认知度，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拥有导盲犬。“培育一只导盲犬的成本特别高，至少需要20万元人民币，养一只导盲犬的花销也特别大。但是如果社会认知提高了，有更多的企业和组织参与到导盲犬的培养和捐赠上来，盲人的生活肯定会得到更大的改善。”

原载：光明网、《北京晚报》，2014-09-18



被援助学子带领 6 名同学回家乡支教 传递爱心

2014 年 7 月 27 日早 6 时许,经过了 19 小时的火车硬座和两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刘海月等 7 名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募捐的书籍终于顺利到达偏远的通化县大安镇砬门里村。“我能顺利地上大学,全靠社会好心人士的援助,假期支教,给了我回报社会的机会。”刘海月高兴地说。

19 岁的刘海月毕业于通化市的一所高中,2013 年高考以理科成绩 608 分的成绩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刘海月的父亲因头部受伤,导致右侧身体不听使唤,还患有癫痫病,属于二级残疾;母亲因先天性小儿麻痹,行动不便,这几年又患上了糖尿病,天天吃药维持,属于三级残疾。“我们一家三口就靠政府每月发放的 760 元低保维持生活。”刘海月说,2013 年她考上大学后,家里实在没有能力供她上大学,是社会上的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她圆了大学梦。“前不久,当我通过报纸得知通化县大安镇砬门里村的情况后,便产生了假期来支教的想法,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用我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爱心不断传递下去。”刘海月说。

砬门里村地处偏僻,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年均温 4.2℃,霜期长,农作物生长缓慢,村民靠种地所得收入相当微薄。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限和生产力的落后,孤寡贫困老人较多,孩子们也几乎没有课外书籍,更没有机会参加假期活动或课程辅导。村里的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假期孩子基本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刘海月说,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立即与砬门里村的大学生村官高航和通化爱心志愿者协会进行了交流,并迅速组织同学,利用暑假帮助这群贫困山区的孩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 7 名支教学生分别来自上海、北京、河北、甘肃等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知识。“我家人对我支教相当支持,父母在读书时代没有做过的事,现在由我来做,觉得很有意义。”来自上海的支教大学生周子骞说,他是第一次来通化,他会带领孩子们做一些科学实验。来自甘肃的王永亮告诉记者,他和刘海月并不认识,是在学生会听说要去偏远的通化支教的消息的。“当时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但我觉得来砬门里村支教更有意义。”王永亮说。

通化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成员王军航告诉记者,得知他们 2013 年捐助的大学生刘海月要在暑假回家乡支教的消息后,他们也积极组织志愿者为山村孩子捐助了 100 多本课外书和笔等学习用品。“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让爱心不断传递。”王军航说。

“欢迎你们的到来。”刘海月等大学生刚进村,早已等候在村口的村书记杨茂有就赶紧迎了上来,短短的一句话却流露出他对支教大学生的期盼。安置好住宿后,杨书记和大学生村官高航便带领支教大学生参观了学校。高航介绍说,村里的 36 个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他希望大学生们能在教学过程中,用心爱护学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支教大学生也纷纷



表示，在支教服务过程中，会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学校管理，用心教书，爱护孩子。

3 名支教的女大学生刚进妇女主任贾梅的家，就听孩子喊：“新老师来了！”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平时假期基本就是在家玩，村里来了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感到非常新奇。“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考入名牌大学。”旁边的 10 岁男孩孟祥颀说，他家在水洞村，听说来了大学生支教，妈妈就带他来了。“我数学考得不好，来补数学。”孟祥颀说。

刘海月告诉记者，此次支教活动为期 15 天，在这 15 天里他们将组织孩子们开展文化艺术教育、素质拓展、功课辅导等活动；在村子期间为孩子们建成读书角，保证之后孩子们仍有书可读；与孩子们聊天交流，进行心理方面的开导并进行正确的引导；开展安全教育；到孤寡老人家中走访慰问，陪他们聊天，帮他们打扫卫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关心，为他们带去欢乐。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让砬门里村的孩子们收获知识，同时让社会意识到有这样一群人需要关注，并给他们带去更多的温暖。“我也相信我们能为砬门里村的孩子带来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刘海月高兴地说。

原载：新文化网，2014-07-29



暑期实践大学生掀起丝路热



实践团来到西安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使海内外人士对长安充满了向往；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使西安这座千年古都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影响力和魅力大增，2014年暑假期间就有不少外地大学生来到西安，探究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选择西安

“这座城市吸引我前来”

刘哲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大一学生，也是“访三秦，走新道”陕西省“一带一路”大型走访调研实践团的一名成员。该实践团由10位不同专业的同学组成，其中8名大一同学、两名大二同学。

“我是自愿报名来西安的，她太吸引我了！”该实践团的成员和刘哲一样，都是经过综合考虑以后选择西安的。她说，之所以选择来西安实践调研，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从西安的地理位置和国家战略定位考虑。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建设丝绸之路新起点，其具有的基础以及所实行的各种政策使得西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所以，西安对“一带一路”的发展与推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其次，从调研可行性方面考虑。经过前期准备，西安市委、市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响应相当之快，许多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西安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更是汇聚了许多专家学者，通过访谈专家学者，对于实践调研具有很大的帮助。另外，结合调研提纲，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准备从文化、经济、基础建设、能源设施等多个方面进行调研。他们认为，西安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迅速发展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困难重重

外地大学生却收获丰富

在实地调研过程当中，刘哲和同学们遇到了很多此前没有想到的困难和问题，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刚来到西安，我们兵分几路，开展了实践调查，联系相关单位。到西安的那几天，正好赶上最热的时候，有时气温高达 40℃ 左右，但是，我们丝毫没有要在宾馆里‘避暑’的意思，而是走访社区、发放问卷、上门联系。”她告诉记者，因为提前没有预约，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被保安拦在门外，电话联系时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挂断……“相关单位踢皮球，我们就挨个去走访。我们始终记得临走时指导教师说的——‘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大家都没有气馁，相互鼓励安慰，有关部门工作很忙，没有预约进不去都可以理解。”她说，他们一家一家地找，虽然不断碰壁，但依然没有放弃。有一次，一位成员因为天气炎热中暑，就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又和大家一起去找寻、联系。最后通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联系上了陕西省翻译协会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并且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当访谈结束后，我们激动的心情真的是无以言表。这算是我们很多同学第一次真实地接触社会，也许过程不尽如人意，但是我相信对大家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她高兴地说。

另外，发放问卷的过程也让他们十分难忘。因为他们设计的问卷只有一面 A4 纸，本来以为发放、收集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没想到用了 8 个小时才发放完 100 张问卷。刘哲说，他们在路上调查行人，很多时候追着别人二三十米解释，但人家还是径直走掉；很多时候他们被认为是推销或者发传单，还没有说明来意就被拒绝。但是，他们依然相互鼓励，分享寻找路人的经验——行色匆忙的不要找、站在阅读栏里读报纸的大爷大妈对“一带一路”肯定有一定的了解认识、行人填问卷的时候为她（他）打伞、注意说明来意的礼貌用语等。刘哲说：“实践过程中同样难忘的，还有西安人民的热情、智慧与善良。接待我们的长安大学社区居委会书记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让我们受益匪浅，陕西省翻译协会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经济发展现状侃侃而谈，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了中西部商品交易中心、西北现代医药物流中心、‘长安号’出发点和通关服务中心……这些都使我们大开眼界、收获良多，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安的了解、理解。”

原载：《西安日报》，2014-08-26



大学生研发智能盲杖：遇障可震动报警



大学生研发智能盲杖

视力缺失，盲人的生活受到种种限制，本是便利盲人出行的盲道被停靠的车辆、杂物等占据，成为“死路”。近日，北京科技大学的12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走访、调查发现盲人出行“难”。大学生们基于这一调查发现，发挥专业优势，研发出了一套能够为盲人出行提供便利的智能盲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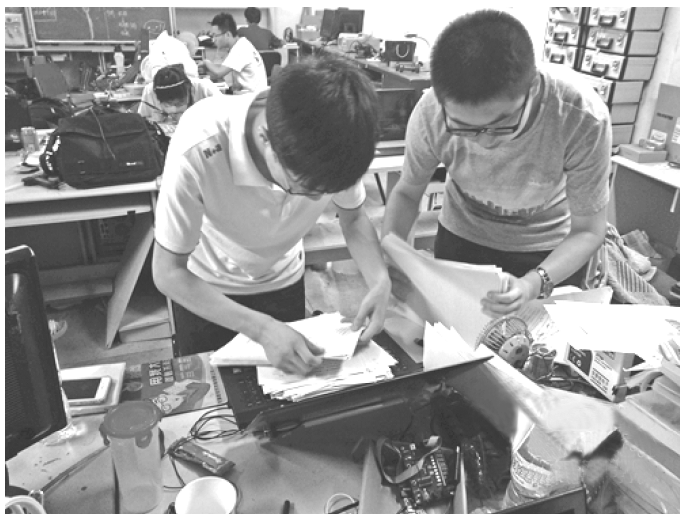
该智能盲杖可以通过超声波测距，手柄震动进行报警，及时提醒盲人前方有障碍物。同时，采用闲置时自动睡眠的模式，减少盲人更换电池装置所带来的不便。目前，该智能盲杖正在申请专利。

盲人出行难让大学生坚定研发智能盲杖的念头

出于对盲人群体生活的关注，2014年8月初，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索奥科技发明实践团展开了对于盲人群体的调查。这群大学生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参加“心目影院”的志愿服务活动，走访盲人按摩店，亲身感受盲人生活的艰辛。

调查过程中，九成以上的盲人表示由于视力原因，平时很少出门，几乎全部的盲人不会选择走盲道。而在调查中，大学生们发现，本是便利盲人出行的盲道被各种车辆、杂物占据，成为“死路”。

考虑到社会上盲人出行会有很多困难，在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大学生们最终决定自主研发一款能帮助、便利盲人出行的工具。



团队成员在实验室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正式研发从8月1日开始，8月12日结束，但是在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准备。”团队负责人胡鹏飞告诉记者。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地下室，团队经过12天的研发、测试，最终成功发明出一款协助盲人出行的智能拐杖。

据胡鹏飞介绍，这款智能盲杖可以通过超声波测距，手柄震动进行报警，及时提醒盲人前方有障碍物。同时，考虑到盲人更换电池不便，盲杖配合大容量蓄电池，并且采用了闲置时自动睡眠的模式以及红外感应开关，手持时自动开启盲杖功能，闲置时自动关闭可以达到较长待机时间。除此之外，盲杖还添加了“Watchdog”功能，进行程序的自我监控，保证了盲杖的正常使用，避免程序崩溃或死机。



团队成员走上街头服务盲人，调查盲人出行难



和胡鹏飞一样，团队大多数是大一学生，所学专业是智能科学技术或自动化。“由于所学专业技术有限，需要摸索、自学来做出智能盲杖，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做得特别完美。”胡鹏飞对已经研发完成的智能盲杖不够完美显得有点遗憾。

直到研发测试结束，团队 12 人才松了口气。胡鹏飞坦言，研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大家都是连夜工作。他告诉记者，在软件程序和硬件调试的融合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肯钻研的同学们只能花费大量时间努力解决。缺少规范化设计，团队便请工业设计等专业的同学和教师当“外援”。虽然学校有资金支持，但还是有点“紧张”，购买元器件等都会将网店和实体店的价格进行对比，在保证的质量同时买最便宜的。

准备申请专利，继续完善产品

目前，该智能盲杖准备申请发明专利，同时也将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市场初步探索调研。“因为该发明侧重技术功能的实现，外观要求并不高，但后期还是会继续加强美观设计。投入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现在主要考虑市场的一些需求，产品完善才会开展具体的市场工作。”

据了解，由于该智能盲杖内部设有多处电路，无法折叠，在产品后期完善中，将进行升级，实现可折叠。另外也会对超声波探测角度进行升级，实现使用者可调。

原载：中国青年网，2014-08-15

追寻中国梦，聆听最真实的声音—— 一群大学生走进我市 16 所学校，访谈 60 多位乡村教师



大学生走进南阳乡村学校

核心提示：乡路弯弯，雷阵雨后还有些泥泞。2013 年 7 月 1~10 日，一群年轻的“90 后”大学生行走在南阳乡村学校之间，一路上青春洋溢，激情飞扬。他们，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大一学生，于盛夏里相约南阳，穿行乡里，一起探寻“乡村教师的中国梦”。

微电影《粉笔印》

“几乎每一位平凡乡村教师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安徽芜湖籍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陆静说，他们拍摄的微电影《粉笔印》记录了一位乡村老教师平凡的一天，以及他永不丢失的那一份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对孩子们深沉的爱。

74 岁的王国林老人，是宛城区茶庵乡狮子庄小学的义务音乐教师。从 1966 年他第一次从教，到 1982 年在民办教师整顿中离开教师岗位，至今已时隔 30 多年。“是对孩子们的爱，让王爷爷又站在了讲台上。”陆静说。2013 年春季学期，王国林送孙子上小学，时常看到一些到校早的孩子们在校门口打闹，很危险。关注孩子成长的他就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教他们唱歌。校长知道后，把他请回了学校，给孩子们教音乐。就这样，本应在家颐养天年的他又执起了心爱的教鞭。

在微电影中，王国林老人早早到校给每个教室洒水，为孩子们送清凉；他提前在小黑板上抄写乐谱，备好课；课堂上，他一遍遍耐心地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在拍摄中，老人那微微颤动的手，备课时专注的神情和他面对孩子时和煦的笑容，不止一次



感动着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们。

同一个乡村教育梦

从南阳市第二十三中学、第三十一中学到宛城区金华乡杜坡小学、茶庵乡狮子庄小学，到南召县皇后乡皇后小学……短短 10 天时间，11 名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的足迹遍布 16 所乡村中小学，访谈了 60 多位乡村教师。

“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我们听到了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感受到了最淳朴真挚的人情，看到了艰苦教学条件下高尚的灵魂。无论是清贫乐观的张凤梅老师、热爱生活的王菊老师，还是追逐梦想的高林老师、无私奉献的王国林老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让我们感动。”在访谈中，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被这些乡村教师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所感染，被他们热爱教育的奉献精神所打动。

“尽管年纪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几乎做着同一个梦，在他们的梦里，很少有自己，更多的是乡村教育。”南阳籍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陈可馨说。给乡村孩子和乡村教育更多些关注，让乡村和城市没什么两样，这是他们共同的梦想。也许，好的教育就是未来的希望。就像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说，每一个农村孩子都很聪明，像这乡村田野里的小花，总有一天会盛开绽放。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了，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却忘不了这位教师说话时眼底的光亮。“回校后，我们会呼吁社会给予乡村教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鼓舞大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志愿投身并长期扎根于教育事业，为乡村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原载：《南阳晚报》，2013-07-16



北京科技大学燃烧的心火关爱抗战老兵 社会实践活动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心中所谓的爱国精神还只是关于抵制日货之类行为的话，那么如今我更相信爱国是一种信仰，一种从老一辈英雄们代代相传下来的光荣传统。”同样在 2015 年暑期参加抗战老兵寻访活动的北京科技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的学生吕明鹏认为，作为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如今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像抗战老兵那样持枪保卫国家，但爱国并不遥远、并不虚无。听到国歌，看到升国旗，放下手中的工作，立正行注目礼，是爱国；看到比赛过后地上丢弃的小国旗，捡起来，也是爱国。

“在这些细微的行动里面，自有一种爱国的信仰贯穿其中。”吕明鹏说。

原载：《人民日报》，2015-10-20



走进无人机科技实践团登上央视 《越战越勇》



走进无人机科技实践团在录制《越战越勇》栏目

2016年暑期，来自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的走近无人机科技实践团凭借着高超的航模飞行技巧荣登 CCTV3《越战越勇》栏目暑期特别节目。节目中出色的航模展示和才艺展示，彰显了理工科学生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也向全国观众展示了北京科技大学学子的风采。

走近无人机科技实践团怀揣着航空航天的梦想，一直在积极学习尖端的无人机知识，攻克技术难题，在航模竞赛方面屡获殊荣，曾多次获得电动滑翔机、模型火箭竞赛的国家及省级奖项。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回报学校，连续两个月制作了“北科全景图”，现与校团委合作成立“北京科技大学小博士新媒体全景VR与航拍工作室”，还将创造更多属于北京科技大学的精彩画面。

在竞赛和创作模型之外，该实践团还不忘将无人机这个高科技的项目推广向大众。该实践团通过建立微博、公众号实时推送实践过程、收获、无人机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无人机；制作创意微电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无人机的魅力。该实践团还对中小学生进行无人机教学并向其捐献航空模型，将自己的蓝天梦传承给更多的孩子。

心怀大地，志在蓝天，希望走进无人机科技实践团的航天梦知行合一无止境，止于至善飞更高。

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08-07

山村孩子们的思念



实践团来到长春堡屯

2015年9月8日傍晚，辉南县辉发城镇长春堡屯的小学生金鑫写完作业后，便拿出自己心爱的玩具——小鸭子到院子里玩。听着玩具发出的呱呱叫声，小金鑫悄悄地哭了。这玩具是卫玲蔚老师送的，老师们走半个多月了，快到教师节了，他想老师们了。

其实不只金鑫想，长春堡屯的56名孩子都想老师们了——北京科技大学吉林通化繁星支教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的9名大学生。

2015年8月4日，北京科技大学的9名大学生和辉发城镇长春堡屯签订了3年支教计划，在寒暑假里，负责村里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假期教育。他们分别来自河北、山西、安徽、湖南、江苏等省，这次专门带来了课外读物300本、玩具66件、跳绳100根、篮球运动器材16件，全部捐给了长春堡屯的孩子们。上午，他们教孩子英语、数学；下午，他们教孩子空手道、画画、唱歌。曹盛浩老师还为孩子们带来了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引导孩子们赏析。

村里的56名孩子中有20名是留守儿童。金鑫今年11岁，父母在韩国打工，和奶奶一起生活。这个暑假，他天天和9名大学生一起学习，有大哥哥、大姐姐妹们的督促，金鑫进步很快，作业完成得最好。

暑假结束了，送老师回校那天，来了35名孩子，他们舍不得老师走，抱着老师哭起来。村民们也为这9名大学生的举动点“赞”。

原载：《吉林日报》、新华网，2015-09-10



“小禾欣”走进中建三局工地感受万丈高楼平地起



“小禾欣”走进中建三局

2015年8月4~6日，由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工委携手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五届“禾欣夏令营”活动，走进了中建三局苏州国金中心工地。据悉，335名“小禾欣”在32名从首都“飞”来的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共同感受了摩天大楼的神奇魅力。

作为品牌青少年活动，本次夏令营以“点亮缤纷夏日 共创七彩未来”为主题。在愉快的3天假日中，“小禾欣”们参加了“培训小小建筑师”活动，听中建三局苏州国金中心工地的负责人讲解“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全过程，并观看了超高层项目危险源辨别动画片。而在工地建成的苏州第一个综合性安全体验馆，大家不顾炎炎烈日，争先恐后地实地体验平衡木、坠物打击、高空坠落等设施，“小禾欣”们在此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据了解，苏州国金中心项目地处风景秀丽的金鸡湖畔，总建筑面积为36.7万平方米，由T1、T2、T3三座塔楼及地下车库和相连的3个地铁出入口组成，其中T1塔楼地下4层、地上98层，高达450米，建成后 will 和南京的紫峰大厦并列成为江苏第一高楼。

原载：人民网，2015-08-07

大学生拍微电影讲科技下乡



大学生在拍摄微电影

暑假期间，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们来到延庆县井庄镇果树园村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帮着小村建网站、给民俗户做团购、义务修电脑。有感于期间的经历，他们拍摄了一部微电影，以一名大学生村官为主角，讲述工作中被村民误解、锲而不舍、最终得到认可的故事。

暑假前，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第一党支部的学生们就开始为暑期实践做准备，他们选择了“科技下乡”这一主题。去哪儿下乡？外婆家在果树园村的魏梦雨同学说，去我外婆家吧，那里的发展特别需要科技。经过前期准备，暑假期间，一行8人来到了果树园村。

果树园村紧邻名扬京郊的柳沟村，柳沟村以火盆锅·豆腐宴起家，民俗旅游红红火火，果树园村也紧随其后，发展乡村旅游，并推出了牛肚宴。可因为位置相对偏僻，宣传不够，民俗户不够红火。摸清了情况，同学们决定先帮村里建网站，宣传果树园；又帮着民俗户和团购网站联系，组织团购活动。平日里，同学们还帮着村民修电脑。

可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也有一些误解。“团购让我们打折，我们不就吃亏了吗？”“参加团购了可没人来怎么办？”……至此，同学们才体会到在农村工作的不易，拍摄微电影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就选大学生村官这一身份。”团队负责人商奕介绍，电影名叫《梦网青村》，讲述的是主人公大学毕业后选择当大学生村官，遭到家里反对，但她仍然来到村里，没想到遇到种种困难，但她不放弃一直努力，中间还得到家人的暗中帮助，最终得到村民认可。这个女主角，就由魏梦雨饰演。



“我们觉得科技下乡特别有必要，但做起来困难确实很多，希望通过我们的微电影，让更多人关注科技下乡，参与到科技下乡中来，给农民实实在在的帮助。”商奕说。这部微电影目前正在进行后期制作，时长5~8分钟，将在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交流平台上首播，并在优酷网等网站上展播。

原载：《北京日报》，2013-08-16

城市生存联合实践团



实践团的成员在接受采访

暑假到了,大学生的暑期生活应该如何来度过会更有意义呢?北京科技大学的10名学生的做法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接受生存考验。

最近,山东省乳山市迎来了10名大学生,他们是来开展城市生存暑期实践活动的。王晓辉是乳山本地人,也是这次北京科技大学城市生存实践团的团长。学校放假之后,他带着他的10人团队来到乳山,开启了他们为期15天的城市生存之旅。来乳山的15天里,他们每人只留有包括食宿、交通费在内的100元启动资金。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要找到工作。由于只有15天的短期实践,他们只能找到网吧收银、帮人招生之类的工作。然而即使这类简单的工作,他们也会有波折。

(北京科技大学王晓辉)从来没有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会跟老板打交道,所以可能不会说话呀,或者说说话技巧不好啊,就是容易造成一定的麻烦。有的人在这期间被老板辞掉了。

实践团的成员凡星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人招生。然而,工作第一天他就弄丢了50元的启动资金。

(北京科技大学凡星)想法就是估计活不过第三天,然后估计需要非常努力地赚钱才能使自己存活下来,不过我现在在这里很不错,也招到了不少学生。

目前10名大学生在乳山已经实践了8天,在这8天里,他们都找到了临时性的工作,虽然都是几经波折,但这个小团队的成员乐在其中。每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汇总各自的成果,也把自己的亲身感悟和大家共同分享。

原载: 山东电视台, 2013-07-19